

40年国是反思丛书

山雨欲来风满楼

——60年代前期的“大批判”

- 戴知贤
- 河南人民出版社



40年国是反思丛书

山雨欲来风满楼

——60年代前期的“大批判”

- 戴知贤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21

山雨欲来风满楼

60年代前期的“大批判”

戴智贤

责任编辑 汪琼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乡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 8.5印张 165千字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0870—26870册

ISBN7—215—00866—5 / Z·40

定价: 3.60元

前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现在已经40年了。

40年前，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40年来，我们不仅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功，不仅在生产关系方面实现了根本转变，而且在生产力方面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民在各方面获得了伟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但是，历史的道路从来不是笔直笔直的。40年来，我们既有凯歌行进的时期，也有积重难返的岁月，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遭受过令人痛心的严重挫折。中国40年历史舞台上急剧而令人眩目的变化，为整个人类历史所少见。这是一份值得认真总结和继承的非常难得的宝贵财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站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的高度，认真反思40年的历史，充分发掘这一宝贵财富的效能，必将对我

国现代化进程作出有益的贡献。《40年国是反思丛书》即为此而尽力。

本丛书将着意展现共和国40年历史的真实面貌，承认某些历史事实是痛苦的。但唯其痛苦，才能使我们民族久已麻痹的那部分神经不再麻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会牵扯到众多的死人和活人，但我们的目的不是在于判明某些人的英明和某些人的愚蠢，或者某些人的高尚和某些人的卑鄙，而着眼于我们所应汲取的历史经验教训。

本丛书对新中国历史的反思是从今天的现实出发的。在古老的罗马神话中，门神雅努斯的脑袋前后各有一副面孔，可以同时看着两个不同的方向，一面明察过去以汲取历史教训；一面展望未来予人以美好的憧憬。唯独无暇顾及最有意义的现在。结果，雅努斯未能庇护一度强大昌盛的罗马帝国，留下的只是断壁残垣，丛书立足于今天，反思既往，“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从揭示历史的真谛中探寻今天改革的道路和通向理想未来的途径。

当我们反思40年历史的时候，特别当我们带着沉痛的心情审视那些“荒唐岁月”或“荒唐事件”的时候，我们的耳畔经常响起中外哲人的“箴言”：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

“就一切可能来看，我们正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

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恩格斯）

由此，我们不敢以轻率的态度而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我们不敢以戏谑的态度而以郑重的态度对待人们的历史过错，我们对一切创造历史而非戏弄历史的人们抱有深深的敬意。我们的丛书是献给一切在新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过或正在扮演正剧或悲剧的角色的人们的。

《40年国是反思丛书》编委会

小 引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62年至1966年的国内形势，作了这样的结论：

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本书打算对当时思想文化方面“过火的政治批判”，作一些历史的回顾，看一看这条“导火线”是怎样形成和怎样引爆的。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多方面原因。分析“文革”发生的原因，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只想说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中国发生的这场大动乱之所以称为“文化大革命”，就因为它的“导火线”是从文化思想问题上引发的。这场大动乱使我们的国家、民

族和人民遭受极大苦难，我们子子孙孙要永远记住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所以，研究一下这场大动乱的“导火线”，不是没有意义的。

1958年“大跃进”失误，我国国民经济陷于困境。从1961年起，党中央决定调整国民经济，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加上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迅速取得明显效果，到1962年底，工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在此基础上，又经过三年的调整，到1966年，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国民经济在比较协调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正如党的历史决议所指出的，这一时期，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

在1962年8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他认为国际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国内的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正在向着我们进行猖狂进攻。他作出这个估计，有当时现实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一向十分警惕帝国主义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帝国主义的政治决策者们确实把改变社会主义中国使之成为资本主义附庸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的和平演变上。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阶级斗争，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苏联大国沙文主义

对中国施加压力，更加深了他这种思想认识。联系到国内，由于“大跃进”失误造成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投机倒把、封建迷信等活动活跃起来；党内党外群众对中央领导决策失误有所不满和责难；又由于在调整工作中，党中央部分领导人曾采取某些比较灵活的政策和措施——如企业自负盈亏、农村开放集市贸易、个别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等，即对旧的经济模式和经济制度进行某些改革，一方面为了“应急”——战胜眼前经济困难，一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摸索新路子。毛泽东把这些现象都看成是阶级斗争，从而作出了不正确的估计：认为阶级斗争十分严重，要全党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十中全会以后，从1963年起，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和大部分精力抓阶级斗争。在国际上继续进行“反修”斗争，在国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他认为“四清”运动，就是挖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挖资本主义的根子，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对于文化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的状况，毛泽东的估计更为严重。他认为许多共产党员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而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有些文艺刊物尽是牛鬼蛇神；中央文艺团体至今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教育大权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阴过来，阳过去，阴魂未散。总之，被推翻的资产阶级“企图用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所以无产阶级“必须迎头

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①。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出于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目的，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但是他把许多并不属于阶级斗争的现象都认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过分夸大了阶级斗争，对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我们研究60年代前期的“大批判”，正是要从历史的曲折中吸取教训。

^①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

目 录

| | |
|----------------------|----|
| 小引 | 1 |
| 一 骤雨初歇 | 1 |
| 文化思想领域的“左”旋风 | 1 |
| 文化政策的调整 | 8 |
| 反对“五子登科” | 14 |
| 尊重艺术规律 | 22 |
| 摘掉“白专”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 | 28 |
| 短暂的复苏 | 38 |
| 二 红色信号 | 43 |
| 毛泽东的告诫 | 43 |
| 阶级斗争的可怕图景 | 49 |
| “大写十三年” | 55 |
| “两个批示” | 63 |
| 康生、江青的出台 | 69 |
| 三 艺苑奇冤 | 75 |
| 诬陷小说《刘志丹》 | 75 |
| 《李慧娘》和鬼魂戏 | 79 |
| 田汉和《谢瑶环》 | 87 |

| | | |
|----------|------------------------|-----|
| | 《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及其他····· | 95 |
| | “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 | 105 |
| | 风摧棒打，百花寥落····· | 115 |
| 四 | 哲学“罪案” ····· | 121 |
| | 杨献珍怒斥主观唯心论····· | 121 |
| | “合二而一”的由来····· | 129 |
| | 康生玩弄阴谋····· | 135 |
| | “思想罪犯”知多少？····· | 140 |
| | 冯定的两本书····· | 146 |
| 五 | 经史何辜？ ····· | 153 |
| | 刚直不阿的经济学家——孙冶方····· | 153 |
| | 是非是怎样被颠倒的？····· | 157 |
| | 戚本禹的发迹····· | 163 |
| | 两次“史学革命”····· | 171 |
| | 翦伯赞被置于死地····· | 178 |
| 六 | “教育革命” ····· | 191 |
| | 两个“基本估计”····· | 191 |
| | “读书越多就越蠢”····· | 196 |
| | “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 | 203 |
| | 两种教育制度····· | 207 |
| 七 | “文革”前奏 ····· | 218 |
| | 批判《海瑞罢官》，陷害吴晗····· | 218 |
| | 撒网“捕鱼”和攻击“要害”····· | 225 |
| | “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炮制····· | 231 |

| | |
|-------------------|-----|
| “文革”启幕的紧锣密鼓..... | 238 |
| 结束语——泛论“大批判”..... | 246 |

一 骤雨初歇

文化思想领域的“左”旋风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这个教训没有得到正确的总结，反而被宣称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反右以后，党内“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1958年，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左”倾思潮进一步泛滥。当时，毛泽东号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这个口号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左”倾情绪支配下，所谓“破除迷信”，实际上是宣传对专家、名家、行家的不尊重，轻视文化科学知识，轻视知识分子。当时流行这样一些说法：“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不要怕资产阶级教授”，“对科学家也不要迷信，对其科学要半信半疑”；“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等等。破除迷信变成了不相信科学。所谓“解放思想”，实际上就是不顾客观条件的主观幻想。报刊上批判“条件论”，一味强调主观能动性，无视客观法则的制约，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思想上有钢就有钢，思想上有粮就有粮”等主观唯心主义的荒唐口号。

“大跃进”年代有所谓“插红旗，拔白旗”的“红专辩论”，把一些对“大跃进”持保留态度、在学术上持不同见解的专家、教授当作“白旗”从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拔”出来。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定》说，要彻底批判“条件论”，要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所谓“彻底批判”、“统统拔掉”，实际上是封住科学家的嘴，使那些坚持实事求是态度的人不敢再发言。1962年3月，陈毅在“广州会议”上讲话，批判了1958年的这种错误做法，他说：

“特别是大炼钢铁，大办水利中间，有很多做法是违反科学的。一亩地，硬说可以产一万斤水稻，他们（指科学家——引者）早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违反科学的，但是不敢讲。他们说‘一讲就说我们保守，就说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好不讲’。现在事实证明一亩地搞一万斤水稻、几千斤麦子是靠不住的。早知如此，悔不当初听听这些科学家的话，也许我们少走弯路。”^①

对“大跃进”的浪潮反映最灵敏的是文学艺术，其中又以所谓“新民歌”风靡一时。当时有个口号叫“人人作诗，

^① 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

人人画画”，全国城乡出现了“诗画满墙”的情景。那些诗和画都是极度夸张的，什么“稻粒赛玉米，黄豆象地瓜，花生象山芋，山芋赶南瓜”；什么“深耕细作产量高，一颗玉米穿云霄；顺着梯子爬上去，半月才到玉米腰”；什么“树皮变棉花，稻草纺成纱；不用一亩田，造棉百万担”等等。这些诗歌数量之多，无法统计。1958年5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文化艺术事业》中说：“试看那气吞河岳，壮志凌云的亿万首民歌，有哪个象牙之塔里的‘专家’们能写出的呢？”郭沫若、周扬经过精选主编出版了一本《红旗歌谣》，可谓“新民歌选粹”。1958年9、10月以后的一个时期，有的地方大搞所谓赛诗会，摆赛诗擂台，进行浮夸比赛。许多诗歌互相模仿，一味堆砌豪言壮语，歌颂当时并不存在、甚至将来也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人间天堂”。当时把新民歌称为“革命浪漫主义”的典范。实际上是以幻想代替现实，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表现。它是“大跃进”的产物，又反过来为“大跃进”火上浇油。

由于“大跃进”形势的促使和大规模群众文艺运动的影响，1958年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讨论文学工作跃进计划，要专业作家们多写、快写，“跃进，大跃进”，“放文艺卫星”，迫使作家制定无法实现的创作计划，提出过高的创作指标，不适当地强调集体创作，强调配合中心任务（名为“反映现实生活”），强迫作家去写他们不熟悉的东西。于是出现了一批歌颂“大跃进”的公式化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

1958年还开展了对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大批判。《文艺报》第1期在《致读者》中，把“开展文艺思想大辩论，着重批判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想”列为文艺战线的中心任务。这是1957年批判“右派”思想的继续，即把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毒草的文艺理论和作品继续进行“深入批判”。接着，《文艺报》第2期开辟了“再批判”专栏，批判丁玲、王实味、艾青、萧军、罗峰等人40年代在延安写的几篇杂文和小说。经过毛泽东修改的《文艺报》编者按语，说这些人“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搞“再批判”的目的，一方面为这几位被打成“右派”的作家找出“思想反动”的历史根子；另一方面，借当年在延安因为“暴露黑暗”受到批判的历史，来说明今天那些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的作家和作品被当作敌人和毒草来批判是理所当然的。

不仅在文艺界，在哲学、经济、历史、新闻、法学、美学等方面，也开展了对“修正主义思想”——即那些被划为“右派”人物的言论——的继续批判。

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党中央为纠正“共产风”问题作了许多努力。经济建设方面纠正“左”的错误，文化领域也对“左”的偏向提出批评。历史学家翦伯赞在《新建设》杂志1959年第3期上发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在《红旗》杂志第10期上发表《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他指出“科学大跃进”以来，史学界有一种主张，

“认为为了打破王朝体系，连王朝的称号和王朝本身的历史也要从中国通史中削减或删去”。例如有些高等学校的历史教学中，讲秦始皇筑长城、汉武帝治黄河、隋炀帝修运河的时候，既不提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的名字，甚至也不讲秦王朝、汉王朝、隋王朝，而用公元(前)多少多少年、几十万或几百万劳动人民代替这些王朝和皇帝的名字。不承认个别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一定作用。有些高等学校为了“厚今薄古”，大量压缩古代史的份量，或者先教现代史，再教近代史，最后才教古代史，完全违反历史发展的顺序和规律。翦伯赞严厉批评了这种“走极端，走偏锋”不科学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在课堂上，批评一些人在“大跃进”中冲昏了头脑，鼓吹“无条件”论。杨献珍说，“有人说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那只有孙悟空，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他批评一些人对待“厚今薄古”的片面性，“‘薄古’，薄到不能读《资本论》，‘厚今’，厚到要学小孩子的哲学。”还有什么哲学诗歌、哲学快板、哲学相声这类稀奇古怪的事。他指出在现实生活中违反唯物辩证法的事到处都是：密植，越密越好；人人写诗，要“超过杜甫”，刮“速成风”；好听假话，不让人讲真话，等等。

文艺界的领导人和创作人员，指出“大跃进”运动中创作上的不良倾向，茅盾把这种倾向概括为3个方面：题材范围狭窄，对革命浪漫主义的误解，和对于为生产服务、

为中心工作服务的片面看法^①。有的文艺家指出，文艺创作搞群众运动，是违反艺术规律的，这种作法是“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重政治，不要艺术”；有的作家认为，由于缺乏艺术民主，“创作人员的精神负担太沉重”，由于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许多作品概念化、公式化。总之，文艺工作者对“大跃进”中的偏差表示不满，要求加以纠正。

1959年5月3日，周恩来邀请参加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部分文艺界的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在中南海紫光阁开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讲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他讲了十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如：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心情舒畅；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既要思想性，又要艺术性；既要浪漫主义，又要现实主义；既要学习马列主义，又要和实际相结合；既要敢想、敢说、敢做，又要科学的分析和根据；既要独特风格，又要能兼容并包等等。讲话贯串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精神。讲话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全面论述，委婉地批评了“大跃进”以来文化艺术工作中“左”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倾向。与会的文化界人士非常赞赏周恩来的讲话，分别向本单位作了传达，并准备认真贯彻执行。

但是，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批判了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集团”，认为全党和全国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是“左”而是“右”，于是从1959年冬到1961年上半年，开展了“反

^① 茅盾：《创作问题漫谈》，《文艺报》1959年第5期。

右倾”运动，一大批在“大跃进”中和在1959年上半年纠“左”过程中讲真话、讲实话、批评浮夸风的同志，遭到了批判。说“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惧怕和反对社会主义事业飞速前进的一种反映，就是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在革命队伍和党内的反映。”^①认为反右倾斗争就思想意识上来说，“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②；“世界观的斗争是当前思想斗争中最突出的问题。”^③；文化思想界是“反右倾”运动的一个重要战场。

文艺界又一次开展了对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即把一些正确的文艺观点和优秀的文艺作品当作“修正主义”加以讨伐。例如批判李何林的所谓“艺术即政治”的观点，批判巴人（王任叔）的“人性论”观点。还批判了张庚的戏曲理论、郭小川的诗、刘真的小说等等。在《戏剧报》、《剧本》上公开点名批判的就有十几个剧本和十几位有影响的作家。周恩来1959年5月3日的讲话，也被打入了冷宫。

在历史学界，批判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尚钺。尚钺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自成一家之言，他的魏晋封建说和近代资

① 《红旗》杂志1959年第18期选摘《虚与实》杂志的文章《右倾机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② 陈伯达：《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红旗》1959年第22期。

③ 施向东：《为什么世界观的斗争是当前思想斗争中最突出的问题》《红旗》1959年第23期。

本主义萌芽于明清之际等史学观点，被说成是“修正主义观点”遭到批判。后来有一个时期，他甚至被剥夺了讲授历史和发表意见的权利。

在社会学方面，批判了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1957年以前，我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引起了一批社会学专家（如马寅初、吴景超、费孝通、陈达等）的关注和忧虑。他们积极主张控制人口的增长。1957年，这一批人口学家几乎全被戴上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接着开展了对他们的人口学理论的大批判。他们被剥夺了答辩和申诉的权利，只有马寅初还坚持他的《新人口论》，于是以他为主要目标进行了持续3年的批判，直到1960年他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退出政治和学术舞台才渐趋平息。从此，“人口论”问题成了“禁区”。马寅初的远见卓识被否定，代之以“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社会主义社会永远不会产生失业现象，永远不会感到劳动力过剩”，“我们依靠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依靠六亿人口的伟大力量，喝令高山低头，河水让路，使土地交出更多的粮食”等荒谬理论。结果造成了“错批一人，多生三亿”的严重后果。

此外，还把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遗传学、优生学等现代科学，也当做资产阶级伪科学予以批判和否定。

文化政策的调整

“大跃进”的失误破坏了生产力，国民经济衰退，人民

生活遇到极大困难。“反右派”、“反右倾”、“批修”，接二连三，伤害了不少人，文化科学界广大知识分子感到思想压抑，心情不舒畅。1961年，党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面调整国民经济，同时对其它各方面的工作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其中包括对党的文化政策的调整。

1961年下半年和1962年上半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中央负责人发表讲话，总结经验教训，批评“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

1961年6月初至7月初，文艺工作座谈会和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同时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称为“新侨会议”）。6月19日，周恩来到会讲话，他讲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文艺规律等7个问题。这个讲话针对当时文艺界的“左”倾错误，系统而又具体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对于排除极“左”思潮干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大胆创作，有着重大意义。

1962年3月，国家科委在广州召开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与此同时，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也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两个会议都称为“广州会议”）。“广州会议”是科技界和文艺界最先贯彻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和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对几年来党的工作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作了一次比较集中的清理。大会要

求代表们畅所欲言，打消一切顾虑，保证实行“三不主义”。毛泽东号召发扬民主，上下通气，“开出气会”。他在会上集中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主张让人讲话。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失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决定，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补课”等运动中批判和处理完全错了的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都要进行甄别平反。这次会议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状况有所改善。

“广州会议”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召开的。为了开好戏剧界的会议，文化部和剧协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了几个调查组分赴各大区的一些省市，对戏剧创作情况和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文艺界、戏剧界存在不少问题：“有的作者在运动中受到过火的批判与斗争，有的艺术问题被当作政治问题，人民内部问题被当作敌我问题处理，有的领导人不按艺术规律办事，瞎指挥，有的批评粗暴简单，乱扣帽子，乱打棍子，还有关于创作人员的政治待遇、学习与创作条件等问题。这些都是当时繁荣戏剧创作、推动文艺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①。

在“广州会议”之前，1962年2月17日，周恩来召集一百多位剧作家在中南海紫光阁开座谈会，这是“广州会议”的预备会（称为“紫光阁会议”）。周恩来和陈毅在会上讲

^① 赵寻：《牢记周总理教导发扬“广州会议”精神》，《文艺报》1979年第1期。

话。周恩来说，“1959年5月3日，我在紫光阁讲了一次话，谈了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十个问题。今天讲话，情况与那次有点变化了。”“今天情况有好转。讲对了可以同意，讲的不对可以批评”。这里所说“今天的情况”，就是指“七千人大会”召开以后，党内民主生活出现新气象。他讲了六个问题：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二，党如何领导戏剧电影工作；三，时代精神；四，典型人物；五，关于写人民内部矛盾；六，生活真实、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个讲话同“新侨会议”的讲话一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同样是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刻阐述。

3月2日，周恩来在科学家会议和戏剧家会议同时举行的“广州会议”的开幕式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从这个报告看，周恩来召开“广州会议”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纠正文艺工作和戏剧创作中的“左”的错误，更主要的是要从全局上调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便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陈毅受周恩来的委托，在3月5日和6日分别在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讲了话。他旁征博引，谈笑风生，情趣洋溢。他由衷地关怀和爱护科学家和艺术家，严厉责备了几年来文化艺术工作中出现的粗暴干涉、瞎指挥等“霸王”作风。

在调整经济、文化政策期间，党中央领导人还分别主持制定了许多带有法规性质的“条例”。其中属于文化方面的，有《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

案)》(1961年6月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同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简称“科学十四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1年9月中共中央原则批准),简称“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1962年4月),简称“文艺八条”。此外,还有“剧院(团)工作十条”、“电影工作三十二条”等。这些条例和规定是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干部和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经验教训。它们虽然并不完善,但在当时是切实可行的,对于纠正“左”的偏差起了积极作用。

例如《科学十四条》规定,科研机构的基本任务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调整研究机构,使研究工作相对稳定;研究计划力求把国家需要同科学工作者的专长结合起来,使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见解得到适当反映;坚决保证科研工作时间,每周平均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鼓励各种学派和不同学术见解自由探讨、自由辩论、自由竞赛,对学术问题不戴帽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服务;科学工作者钻研业务和努力工作的特性,正是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提高的表现,必须爱护和鼓励;研究机构的思想政治工作力戒形式主义;研究机构的领导干部,除了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党的方针政策,还要逐步掌握科学工作的规律,由外行变成内行;对于学术工作,应该组织科学工作者进行民主讨论,作出决定,党组织不要包办代替。这些条例都是针对“大跃进”以

来科学工作中出现的偏差而制定的，它对团结广大科技人员，改进研究机构的工作秩序，提高科研水平，加快出人才出成果，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高教六十条”针对当时学校教学质量下降，忽视知识分子作用以及劳动过多等主要问题，规定了高等教育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双百”方针；做好总务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等。

《文艺八条》是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织联合拟定的。它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检查了几年来文艺工作中存在的简单粗暴和干涉过多等问题，对如何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培养人才，奖励优秀创作，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等问题，作了原则的规定。这些规定的主要精神是发扬艺术民主，贯彻“双百”方针，强调对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团结和使用。鉴于建国十年来的历史教训，《文艺八条》特别规定在进行清除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时必须划清的几种界限：

第一，必须严格划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线。第二，在人民内部，又必须正确划分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之间的界线，不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世界观问题和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不许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世界观问题、学术问题和艺术问

题，也不应该把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随便引伸为世界
问题^①。

这一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非常深刻的，它对于发扬艺术民主有
重大意义。

反对“五子登科”^②

1958年，文化思想界的恶劣倾向之一，就是缺乏民主空
气，“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搞“一言堂”。1961年
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座谈会上的
讲话》开头的“引言”，就尖锐地批评这种不民主的风
气。他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
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
有好多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
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③。

1962年，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
会”上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应该是人人都是心情舒畅，
人人都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人人都能够把他的这一点

① 《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者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引自《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

② “五子登科”，原来是封建时代某人五个儿子都考取了功名，被誉为“五子登科”，这里是指50年代后期流行的一种不正确的批评方式，动不动就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五个“子”一起上。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3页。

才力、智慧，全部贡献出来。有了问题，能够“面折廷责”。他说，现在“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危险得很啊！”^①“文艺八条”也指出，近年来，某些文化艺术部门、文艺工作单位和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没有正确理解和认真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一些文学创作和艺术活动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批评、限制和不适当的干涉，妨碍了生动活泼的艺术创造和学术上自由探讨。有些干部处理文艺问题，既不尊重群众意见，又不同作家、艺术家商量，独断专行，自以为是，损害了文艺工作。^②

这种破坏“双百”方针的粗暴干涉，集中表现为所谓“五子登科”。周恩来在1961年6月的讲话中批评说：

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首先是有个框子，非要人家这样说这样做不可，不合的就不行。有了一个主观的框子就据以去抓辫子，一切从他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形而上学出发，也不经过调查，他主观上以为“右倾”，就断定是“右倾”。……先是抓辫子，抓住辫子就从思想上政治上给戴帽子，从组织上打棍子。……还有挖根子。一是联系历史。不论讲了几句什么话，都要联系历史检查，这叫人怎么办呢？二是联系

① 《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

② 《文艺研究》1979年第1期。

家庭，挖出身的根子……①

周恩来的这段话，把“几年来”“反右”运动中种种错误做法概括无遗。为了避免片面性和不留把柄，他讲得很委婉，很全面，但批评的锋芒所向，是很明显的。他说：“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框子，”我们要讲的是改造整个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框子。把这个大框子变成了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则是错误的。“我们也不一般地反对抓辫子”，但我们主张抓那种“白发三千丈”的政治上反动的大辫子。帽子也是要戴的，只是不可乱戴。而“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追根子，联系历史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今天的表现；联系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也是可以的，但主要应该看本人”。至于“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了②。

这个讲话是对几年来“左”倾错误痛下针砭。当时聆听讲话的文艺工作者和电影创作者无不感到十分亲切。接着1962年2月，“广州会议”前夕，他在紫光阁对戏剧工作者讲话，又一次开门见山，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说1958年打破了旧的迷信，又产生了新的迷信，“这几年树立了许多新的偶像，新的迷信，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框子”。不懂艺术的领导干涉过多，“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还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5—327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7—328页。

要给人家戴帽子；右倾，保守。”“新的迷信把我们的思想束缚起来了，于是作家们不敢写了，帽子很多，写的很少，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所以他本着“七千人大会”倡导的“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精神，号召剧作家们“破除新的迷信，再一次解放思想”^①。

当时确有许多框子和帽子，压得人们不敢说话，文艺家不敢创作。例如不能写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写社会的阴暗面，不能写干部的缺点、错误，不能写历史题材，因为历史题材不能表现时代精神等等。

南京部队话剧团一位同志写了一个剧本，反映部队进入大城市后有个别基层干部（排长）受资产阶级思想的“香风”影响，变了，要和在农村的妻子离婚，经过大家帮助后改正了错误。这样一个剧本，有些领导就认为是毒草，说是描写了部队的“黑暗面”，他们质问说，“难道我们人民军队的排长会这样吗？”这个剧本被禁止演出。

周恩来听了汇报说，“难道我们的部队干部都是铁打的，没有思想感情吗？连个排长都不许有缺点？难怪作家叫苦。”他说，这个剧“如果到北京来演，我首先去看。”^②

有些传统戏曲，因为写了丈夫“喜新厌旧”，遗弃患难与共的妻子，例如《秦香莲》，有人以为骂陈世美是影射一

^① 《周恩来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106—107页。

^② 张镇，《难忘的“广州会议”》，《文艺研究》1978年第8期。

些共产党干部进了城当了官同农村的妻子离婚，因此被禁演。周恩来说，《秦香莲》也不能演，“真是岂有此理！批判陈世美杀妻灭子，他的行为是很恶毒的，为何不能演？这与离婚再娶有什么关系？”^①

有一部电影《洞箫横吹》，批评了一个参加过游击战争的干部和一个县委书记。前者把持一个合作社，倒卖粮食，接受上边的拖拉机和贷款，而不允许周围的群众办合作社，后者借口搞试点，不允许群众办合作社。有一个复员回来的志愿军，跟他爱人一起搞合作社，上级不批准，他们就搞“黑社”，抵制县委的领导。县委就斗争他，开除他的党籍。他写信告到北京，毛主席知道了，派了一个副省长去处理，肯定志愿军办“黑社”是正确的，撤了县委书记的职，倒卖粮食的干部也受到了处分。这部电影就因为批评了党的农村干部和县委书记，被扣上“右派电影”的帽子，禁止放映，作者海默也受到了处分。陈毅在“广州会议”上为这部电影及其作者平反，他说：

这个电影为什么不可以写？县委书记为什么不可以批评？这一点批评都不容许？这个县委书记的“老虎屁股”就摸不得呀！……我说这个电影正打中要害。我们目前的农村，就有电影所表现的这种情况，被少数人把持。应该批评，这个批评还轻了。不批评就没有希望。老游击战争的干部为什么批评不得？你老游击，你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4页。

做坏事，盗卖粮食，为什么批评不得？他搞粮食投机，为什么批评不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你老游击就可以犯法呀？你县委书记就可以有这么大的权啦？……

（《洞箫横吹》可以公开放映，它）告诉老百姓，象这样的县委书记，你们是可以反对的，……《洞箫横吹》是一个自我批评的电影，为什么害怕这个自我批评，甚至使作者受到处分？①

可以不可以写人民内部的矛盾？周恩来说，“大敌当前，应当写敌我矛盾”。但是，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避开它，就不可能写出丰富多彩的剧本。有人主张，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就不要写得太尖锐，至多是“小矛小盾，有矛无盾，有矛盾无冲突”。周恩来说，“这些条条怎么能成立？有矛无盾，还有什么戏？那就无的放矢，放空炮。这就把自己束缚了。”所以，他主张“要敢于写人民内部矛盾，肯定正面的东西，批评错误的东西。要写伟大的成绩，但错的东西也要批判。肯定正面人物，批判反面人物。”他还具体地提出，“可以写一点讽刺剧、喜剧、悲剧”。“讽刺，在相声中可以运用。《买猴》讽刺官僚主义，可以演。为什么不演了？”②

有人认为演历史剧不能表现时代精神。周恩来说：“演现代剧可以表现时代精神，演历史剧也可以表现时代精神”。所谓“时代精神”，是反映历史上那个时代的事实和

① 《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

② 《周恩来论文艺》第118页。

人们的思想。要求文学作品反映时代精神，不是把党的政策、决议塞到一个戏里。“毛主席说，戏剧都象开会那样，那还要戏干什么？”“不能把时代精神完全解释为党的政策，党的决议”^①。

“人性论”也是一个框子，是一根打人的大棍子。1958年以来，不少文艺理论家以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罪名挨了严厉批判。周恩来批评文艺界一些人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使文艺作家“有顾虑”，“有一种压力”，不敢大胆进行创作。他以小说和根据小说改编的《达吉和她的父亲》为例，说明“人性论”之类的框子、棍子对文艺创作的危害。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写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达吉要领回女儿，情节很动人，却被批评为宣扬“人性论”。电影改编时，导演就有了框子，周恩来说：

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但没有流下来。为什么没有流下来呢？因为导演的手法使你想哭而哭不出来，把你的感情限制住了。例如女儿要离开彝族老汉时，我们激动得要哭，而银幕上的人却别转身子，用手蒙住脸，不让观众看到她在流泪。思想上束缚到这种程度，我们要哭了，他却不让我们哭出来，无产阶级感情也不是这样的嘛！听说导演提心吊胆……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

^① 《周恩来论文艺》112—113页。

敢让他们哭。”^①

哭，就是“人性论”吗？周恩来说，能不能哭，要看是什么时候。“在接近胜利的时候，同志牺牲了，情感就很难控制。王若飞等同志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全党大哭。我们当时在重庆跟国民党开旧政协，在敌人面前我们面不改色，但一回到红岩，便泣不成声了”^②。

“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一个框子把什么都框住了”，“一来就‘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改变，这种局面不打破，哪里还谈得上文学艺术的繁荣！所以周恩来说，“现在要求把这种风气反过来”，“只有把那种坏的、不好的偏向去掉，正风才能建立起来”^③。他号召作家、艺术家们打消顾虑，要敢于表现各种形态的丰富多彩的人类感情。

发扬艺术民主，造成民主风气，关键在于领导。不让人讲话，民主就成了一句空话。周恩来说，“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要从我们几个人改起。”他以身作则，声明他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④，他的讲话“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击”^⑤。1961、1962年由周恩来领导召开的几次文艺座谈会都开得非常生动活泼，代表们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他们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心情舒畅。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6页。

② 《周恩来论文艺》第116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8页。

④⑤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3、348页。

尊重艺术规律

1958年以来，文艺界“左”倾错误的另一种表现，就是违反艺术规律。

“大跃进”期间，一方面在“拔白旗”、“反右倾”等名目下，对一些作家、作品进行粗暴的批判；另一方面出现了严重的瞎指挥，什么文艺统统要“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什么文艺创作必须实行“三结合”——“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什么必须“定人、定题、定时”，保证完成任务等等。文艺界出现了种种强迫命令的怪现象，硬性摊派写作任务，硬性摊派写作数字，硬性规定写作框框。在群众文化工作中，不管你有没有文化专长，不管你是否爱好文艺，统统要从事文艺创作和表演活动，提出什么“人人写诗”，“人人画画”等口号。电影界刮浮夸风，“放卫星”，追数字，甚至出现了各厂在数字上你追我赶打擂台，支部书记手拿秒表在摄影棚里“督战”，限几分钟拍好一个镜头的荒唐事^①。忽视艺术规律，违反艺术规律的错误做法，严重挫伤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影响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1959年5月，周恩来在紫光阁对文艺界代表讲的“两条腿走路的问题”，主要就是讲要按艺术规律办事。他委婉地批评了“大跃进”以来文化艺术界违反艺术规律的现象。例

^① 参见张骏祥：《澄清是非，解放思想》，《电影艺术》1979年第2期。

如，任务指标订得太高，“层层加码”，搞得“过分紧张”，“单纯要求思想性，不讲艺术性”；“地方戏的特点也没有了，使人看了很难过”，作品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不够，“尤其浪漫主义更差一些”，总之，只强调了一面，犯了片面性，“变成一条腿，而一条腿走路，难免就要摔跤。”^①他的1961年6月和1962年2月的两次讲话，在要求艺术民主的同时，着重论述了尊重艺术规律问题。

周恩来指出，“文艺同工农业生产一样，有它的客观的发展规律”，^②“文艺的特点是通过形象思维反映生活”。“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表现出来，无论是音乐语言，还是绘画语言，都要通过形象、典型来表现，没有了形象，文艺本身就不存在，本身没有了，还谈什么为政治服务呢？”^③通过典型化的艺术形象反映生活是艺术的根本特征，也是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根本规律。根据这个根本规律，周恩来批评了当时出现的只着重思想而忽视艺术的“以政治代替文化”的现象，他说概念化的“标语口号不是文艺”。

“文艺是精神生产，它是头脑的产物，更带复杂性”。^④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可以适用于精神生产。但是精神生产有许多特殊的规律，不应当把适用于物质生产的一些做法硬搬到精神生产中来。例如，“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

^① 《周恩来论文艺》第69—71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0页。

^{③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6、340页。

量的”，精神粮食不能以数量作标准，“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①。所以他说：

“写东西不能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去催，搞得太紧张了，精神产品生产不好”^②。文艺创作不能赶任务，“搞指标、订计划、保证任务、一催再催，这对于精神生产者是苦恼的事”^③。任务太重，催得太紧，光追求数量，必然粗制滥造。他说，“几年来，文艺作品在数量方面搞得很多，质量不高。文艺的队伍搞得很大，水平不高”^④。他说，1958年提倡大拍艺术性记录片，就是一个错误。“我们提出1958年拍80部，结果下面就搞出了103部，其中就有粗制滥造、浪费劳动力、占用材料的”^⑤。

周恩来说：好作品的生产，可以是偶然得之，但是这种偶然得之是建筑在长期的生活和修养基础之上的^⑥。他又说：“成功的作品不是人人都能创造出来的，也不是天天都有的。”所以，“人人做诗，人人画画”，每县出一个郭沫若，这种口号是不对的^⑦。

文艺是一种个体的精神劳动，它贵在劳动者（作家、艺术家）个人的独创性。所以，一方面，作家要发挥创作个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9页。

② 《周恩来论文艺》第69—70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9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0页。

⑤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9页。

⑥ 《周恩来论文艺》第70页。

⑦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1页。

性，要有各自的独特风格；另一方面，领导文艺工作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容许作家有个人的创作自由，尊重作家的独创性，不要随便指手划脚，用行政命令进行粗暴干涉。陈毅在“广州会议”上讲话，也主张文学创作，以作家个人的努力为主，做党的工作和行政工作的同志，对科学家的内部事务，对作家的创作，不要干涉太多。他还讲了一个可笑的故事：有人奉命写了一个作品，这个说要加大跃进，作家便加大跃进；那个说要加大办钢铁，又加大办钢铁；这个说要加大办水利，又搞了大办水利，结果一加，这个作品根本就取消了。他说幸亏这个作品取消了，没有拿出来演。拿出来演，一定是新中国“最高”的水平^①。

形式的多样性，也是文艺的一个特点，是艺术的一种规律。作为精神产品的文艺，它和物质产品不同。物质产品，特别是工业产品要求严格的统一化和规格化。但文艺创作的规格化（模式化、雷同化）则是作家失败的标志。工业生产可以成万次地重复生产着标准划一的产品，文艺创作却是永远也不能重复的，也是不能模仿的，它只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个”。所以周恩来说，“精神生产是不能划一化地要求的”。他以写诗为例，说，“陈毅同志喜欢写诗，写得很快，是多产作家，是捷才。毛主席则不同，他要孕育得很成熟才写出来，写得较少，而气魄雄伟、诗意盎然。……我们不能要求毛主席一天写一首诗，也不必干涉陈毅同志，

^① 《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

叫他少写。”^①文艺典型要多种多样，不能用一种样式“框起来”。当时却有一种框框，“比如写一个党委书记，只能这样写，不能那样写，要他代表所有的党委书记”；“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典型，别的典型不能出现，反面人物也只有一个典型。”周恩来说，这是一种新的迷信，新的教条，他认为“各种人物都可以写，正面的反面的，大的小的，可以有各种典型”^②一个作品里，人物是多类型的，描写是多方面的。有人提出要创作“高标准”的英雄人物，周恩来批评说，怎么会有那样的英雄人物？各人性格不同，怎么能有固定的标准呢？怎么能要求党委书记、革命干部、机会主义者，都是一个类型的？文艺寓教育于娱乐之中，形式要多样化。“朱德同志说，我打了一辈子仗，想看点不打仗的片子。如果天天让人家看打仗的片子，人家就不爱看。”^③

题材的广泛性也是艺术作品的特点之一。社会生活的丰富多采，作家的生活经历、思想爱好千差万别，所以他们选择的题材也各不相同。对作品题材的限制是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文艺报》1961年第3期发表专论《题材问题》，提出要彻底破除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进一步扩大题材范围，强调“作家艺术家在选择题材上，完全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周恩来说，“至于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决不能强迫命令和干涉过多”。他举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9页

② 《周恩来论文艺》第106、115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7—338页。

例说，上海的同志反映，有几个作家对党委领导工作根本不熟悉，而硬要他们去写党委领导，结果天天给他们讲党委挂帅如何重要，他们还是写不出来，“不如让他写写别的，发挥所长”可以“各显其长，百花齐放”^①。陈毅也批评了1958年以来那种限制题材，干涉太多的做法。他也认为写剧本、写小说，最好是让作家去写成熟或比较成熟的东西。“那个不成熟的，不要写”。作者自己都没有把握，何必强迫他们去写。他还批评了那个“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完全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荒唐口号。他说，领导出思想，作家就没有思想啦？

群众出生活，作家就没有生活？领导就没有生活啦？作家出技巧，作家就仅仅是一个技巧问题呀？不晓得哪里吹来这么一股歪风^②！

谈到艺术规律，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作家、艺术家要加强基本功的训练。周恩来说，光有思想方面的修养还不够，要有艺术修养。“只懂政治，不精通业务，写出来的东西势必是标语口号，不能感人”。“要精通业务，没有基本训练是不行的。”^③他说作家、艺术家“要重视经验和才能，要重视技巧”。可是“大跃进”以来，“不敢谈经验和才能，不敢谈技巧，有人一谈技巧，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思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8页。

② 《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1—342页。

想，这显然是错误的。”^①

“任何艺术不掌握规律，不进行基本训练，不掌握技术，是不行的”。要进行基本训练，就要有时间。但现在文艺团体演出任务太重，例如话剧团一年要演365场，弄得大家很累，没有时间钻研艺术，因此，质量上不去，人家就不爱看^②。

总之，各种事物都有它的客观规律，艺术也一样。违反了艺术规律，就会损害文艺事业。“大跃进”以来“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是一个深刻教训。所以周恩来号召作家艺术家们认真研究艺术规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他“希望在这次会后，大家都来研究规律，但也不要又搞出许多框框来”^③。

摘掉“白专”和“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的帽子

1957年反右派，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在文化思想界首当其冲的是广大知识分子。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中国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从此，“资产阶级知识分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2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7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8页。

子”的帽子就压在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头上。同年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50多万人，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同年10月，毛泽东在第13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现在地主名声臭了，富农说话没有什么人听，买办资产阶级也臭了，现在能够和我们较量的就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说，现在“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哪一样都缺不了他。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办报纸要有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搞建设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在知识分子有500万人，资本家有70万人，加在一起，约有600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3000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①这就把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相提并论，而且把他们的家属也囊括进去了。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我国还存在着两个劳动阶级和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两个劳动阶级是工人和农民。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这就把“资产阶级右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划入了“剥削阶级”，成了革命对象。这个提法被1958年党的八届四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所接受。因此，在“大跃进”、“反右倾”的年代，大肆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理所当然的了。不少专家被戴上“白专”的帽子，专家们不敢言“专”。有些科学家对开会、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4页。

政治运动占用时间过多有意见，或者对领导的浮夸风有意见，也被认为是“政治上的危险分子”，是“反党”。至于文艺、教育、社会科学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受到批判的为数更多。所以，1961年开始调整文化政策的内容之一，就是纠正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

1959年5月，周恩来在《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中，就表示了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深切关怀，他一再强调，精神生产不要搞得太紧张，订任务要留有余地，要注意艺术家工资、待遇、物质福利，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要适当，不要一般化，“年老多病的可以不劳动”，“芭蕾舞演员由于参加不适当的体力劳动而不能跳芭蕾舞，这也是个损失”。“要注意保护演员、作家的身体健康。作家、画家在生病时，演员嗓子不好或女演员来例假的时候，有权利不接受演唱、写作任务。”文化部“要负责保护文艺工作者的健康，可以发通知，下命令”，改变当前劳动锻炼过重情况^①。

1961年6月，在聂荣臻主持下，制定了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科学宪法”的“科学十四条”。6月20日，聂荣臻向党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请示报告》讲了7方面的问题，其中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作了非常详尽、非常精辟的论述。聂荣臻批评了

^① 参见《周恩来论文艺》第71—72页。

1958年以来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偏差。例如，有些单位把科学工作者划分为“红专”与“白专”，非红即白，给一些政治上属于中间派（有一部分甚至是左派），业务上比较钻研的人戴上“白专”帽子，打击了一些应该团结的人，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聂荣臻指出，“红，首先和主要的，是指的人们的政治立场。对党外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红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做到这两条，也就是达到现在左派的标准，就应该认为已经达到红的初步要求了。”他认为：

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考察科学工作者的政治觉悟，必须看到他们钻研科学的积极性。

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求他们专，是天经地义的。

如果对专家不要求专，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今天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专得不是太深，而是太浅。尤其是有杰出成就的著名科学家更是太少了。我们国家是需要很多知名科学家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专的积极性是必须保护的，必须鼓励的。

当前有一种偏向，而且是严重的偏向，就是有不少同志把红和专看成是互相排斥的，似乎专就一定妨碍红。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在科学工作上有抱负、积极搞研究工作，即使是大是大非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少参加了几次会，少贴了几张大字报，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认为是搞个人主义，就是走“白专道路”。这

样，红，既没有指出正确的方向，专的积极性却受到打击。

因此，聂荣臻说，“白专”这个提法是不确切的。这个提法容易使人误解，好象专和白是必然联在一起的，只要专就容易变白。所以他建议，“以后不要把白专做为批判用语”。

聂荣臻还指出，在日常工作中，对工作人员进行左、中、右的政治排队，是不妥当的。况且这种排队“不以重大的政治动向为根据，而以某些人在某些个别问题上一时的表现为根据，甚至以某些人随意说出的几句不恰当的话为根据，任意地轻率地进行这项极为严肃的工作”。这种做法引起了许多人的误解和疑虑。他建议，今后在日常工作中，“不要在全体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排队”。

关于“双百”方针，《请示报告》指出：

要正确划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具体工作问题之间的界线。对于学术问题和具体工作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不要随便当作思想问题来批判，更不要把思想问题引申为政治问题来斗争。不要用开群众批判大会、贴大字报等方式来处理学术问题。

……不要给自然科学技术的不同学派和不同主张贴上什么“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

聂荣臻还对“双百”方针作了许多政策性的说明。他批评不少单位，往往把选择研究课题、确定计划指标、研究方法和评价科研成果等问题上的争论，“随便提到科学工作两条道

路斗争的高度，轻率地给人家戴上坚持资产阶级科学道路的帽子，使得许多科学工作者不敢讲不同意见”。

1961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科学十四条”和聂荣臻的“请示报告”。参加会议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等中央领导人，完全支持“请示报告”的正确意见，肯定“科学十四条”是个好文件，可以试行^①。

7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认为聂荣臻的《请示报告》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各高等学校、大中厂矿、医院、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单位的党委，都应当认真地讨论，结合自己的情况，参照执行”。党中央的批示还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对知识分子批判错了的要纠正错误，戴错了帽子的要摘掉帽子，“一定要使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畅所欲言”。“在学术工作中，一定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②。

上述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无疑是完全正确的，是

① 《光明日报》记者董克恭等：《聂荣臻同志和知识分子》，1982年10月4日《光明日报》。

② 聂荣臻的《请示报告》和中共中央批示见《北京工作》1961年第409期。

对1958年以来对待知识分子种种错误做法的纠正。

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现在‘白专道路’这个口号很流行”，“聂荣臻同志一定要我再讲讲这个问题”。他举了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

什么叫做“白”呢？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①。

这是对1958年以来用政治大帽子压人的“左”倾错误的一针见血的批评，是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的有力支持。

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首先亲切地慰问科学家和剧作家们，充分肯定他们的工作成绩。他说：

这几年，特别是近两年，从事科学工作和戏剧创作的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42页。

同志很勤劳，很辛苦。虽然生活供应差，工作条件受到限制，甚至精神上也有些不愉快，但在科学工作、戏剧创作方面仍然取得了显著成绩，值得庆贺。我特别要向你们致敬。

今天能有机会和全国高级的优秀的有成就的科学家、戏剧写作者聚在一起谈一谈，对我个人来说是很高兴的事……①。

短短的几句话，说得两百多位代表热泪盈眶。因为多年来一直处于受批判的地位，心情压抑，从来没有听到党中央领导人对知识分子说出如此感人肺腑的知情话、贴心话。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竟称他们是“高级的”、“优秀的”、“有成就”的专家，还要特别向他们致敬，怎能不使这批知识分子由衷地激动呢！

周恩来历史地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他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他们大多数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的卖国贼、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②。热爱祖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当国家遭遇困难的时候，“大家工作努力，生活上克服困难，甚至遇到心情不怎么舒畅的事情还能克制自己”③。所以，“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④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3页。

②③④ 《周恩来选集》第355、362、358页。

阶级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同非劳动者的联盟”。无产阶级同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则是“劳动阶层”内部的联盟，这两种联盟是有区别的。他还讲到改进党的领导和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需要解决好的一系列具体问题。

陈毅在“广州会议”的讲话中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历次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些党员干部大整知识分子的错误做法，他热情地肯定知识分子十二年来思想上的进步和他们在建设国家中的重要作用。

他指出党领导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些地方搞得太过火，生硬地强迫人家改造思想，“打击面太大，得罪的人太多，伤了人家的心”，“搞得很多人感情很痛苦”。他对科学家们说：

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十二年的改造，十二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

他说，“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我们国家的科学家不是多了，是太少了”，“科学家、知识分子是很难得的”。所以要大力扶持和帮助科学家，给他们创造条件，专心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至于我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们中的大多数，基本上跟着共产党的方向是一致的。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就

“为科学、为民主、为民族、为反对反动统治，在进行他们的工作的”那么，十二年以后，他们又有了新的进步，为什么“我们这些人还拿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他们作鉴定？这不符合实际，伤人太甚嘛！”

他说，对于亚非拉的资产阶级我们尚且争取他们作同盟军，连资本家还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也没有一棍子打死。

“那么今天一个科学家，一个作家带那么一点旧的东西，就要整得一塌糊涂”。他质问那些整人的党员干部：“什么人给你那样大的权？今天打击这个，明天打击那个？今天轻易做这个的结论，明天做那个的结论？……”。

他引用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刘邦“倒屣出迎”长者和项羽自刎乌江的故事，说我们今天对这些科学家、老作家、新作家，也要礼贤下士；如果我们的干部“对待自己的同志，对待群众采取专断的、独裁的、不民主的报复打击的态度，他们就是在当霸王。霸王总有一天要逼死乌江，演一出《霸王别姬》的！”^①

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如此大声疾呼“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如此尊重科学家、艺术家崇高的社会地位；如此为知识分子仗义执言，为知识分子所受委屈鸣不平；如此尖锐批评党领导的思想改造运动的缺点错误；如此毫不留情地指责一些党员干部对待知识分子的粗暴态度，是空前未有的。“广州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就是周恩来、

^① 以上所引陈毅的言论，均见他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上的讲话，载《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

陈毅、聂荣臻代表党中央为大多数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是对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基本状况所作的正确估计。“广州会议”精神的传达，在文化知识界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它的政治影响远远超出了科学界和文艺界的范围。

短暂的复苏

文化调整工作，除了上述召开会议、中央负责人发表重要讲话，制定各种条例之外，还为一些受过错误批判的作品和作家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平反，恢复名誉。例如，1962年3月“广州会议”对《洞箫横吹》、《同甘共苦》、《布谷鸟又叫了》等几个受过批判的话剧，作了新的肯定的评价。同时，一批在“大跃进”中产生的反映浮夸风、共产风的作品被停止发行。如同年8月，文化部发出通知，停止发行一批影片，它们是：“北影”的《柳湖新颂》、《春暖花开》、《十三陵水库畅想曲》，“上影”的《你追我赶》、《钢花遍地开》、《斗诗亭》等24部，“长影”的《新的一课》《快马加鞭》等8部，“西影”的《天山歌声》，“珠影”的《一江两岸大竞赛》、《接班人》，“上海美影”的《打麻雀》、《赶英国》、《广丰收》等8部。

由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直接领导，党和政府的关怀、重视和文化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文化战线的调整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左”的错误受到初步批判，知识分子的积

极性被调动起来，科学技术界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气象，文艺创作有了新的繁荣。

1961年9月，文化部发出《关于加强戏曲、曲艺传统剧目的挖掘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文化部门组织力量，有计划地进行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工作，呼吁努力“抢救遗产”。

同年10月，文化部和“舞协”联合举行双人舞表演会及座谈会。表演会演出了《春江花月夜》、《弓舞》、《长鼓舞》、《摘葡萄》、《蛇舞》等20多个题材多样的舞蹈节目。1962年10月6日至26日，北京举行舞剧会演，8个歌舞单位1200多位舞蹈工作者联合演出59个节目，如总政歌舞团的舞剧《蝶恋花——游仙》，战友歌舞团的舞剧《雁翎队》，中央歌舞团的抒情舞蹈《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北京舞蹈学校的大型芭蕾舞剧《海侠》等。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70多个单位的舞蹈工作者来京观摩，并举行座谈，盛况空前。

1961年12月11日，文化部和“剧协”举办“周信芳演剧生活六十年纪念”，周信芳演出了《海瑞上疏》、《义责王魁》、《四进士》等剧目，并摄制影片《周信芳舞台艺术》。

12月21日，中国“美协”举办“1931—1949年中国革命木刻展览会”，作品500多幅，包括左联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154个作者的作品，并召开了座谈会。次年5月，中国“美协”和文化部又举办“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展出1942至1962年20年间专业和业余美术工作者创作的2024

件作品。

12月23日至次年1月26日，袁雪芬率领上海越剧团，赴香港演出《西厢记》、《红楼梦》、《金山战鼓》等剧目，轰动全香港。

1962年12月中下旬，中国“音协”举行独唱、独奏音乐座谈会，全国20多个省、市的作曲家、歌唱家和音乐评论家参加了会议。

文学艺术的创作开始复苏，尤其是以近现代革命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更为兴旺，1961至1963年摄制的故事片《暴风骤雨》、《达吉和她的父亲》、《五十一号兵站》、《风雪大别山》、《北大荒人》、《北国江南》、《李双双》、《东进序曲》、《甲午风云》、《怒潮》、《红日》和戏曲片《三打白骨精》、舞剧《小刀会》、歌剧《洪湖赤卫队》等以及话剧《杜鹃山》、《兵临城下》、京剧《谢瑶环》、《海瑞罢官》、昆曲《李慧娘》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品。此外，还出现了《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针砭时弊、深受群众喜爱的散文、杂文。

1961年12月，《大众电影》举办第一届“百花奖”，1962年4月揭晓，《红色娘子军》获最佳电影故事片奖；《革命家庭》编剧夏衍和水华获最佳电影编剧奖；《红色娘子军》导演谢晋获最佳电影导演奖，扮演吴琼花的祝希娟获最佳女演员奖；在《红旗谱》中扮演朱老忠的崔嵬获最佳男演员奖。

社会科学和文艺理论方面，也出现新的活泼空气。

整个文化思想战线有了新的转机。

1962年4月“广州会议”之后，著名戏剧作家田汉作七律一首赞颂“广州会议”的盛况和对文化艺术前景的展望：

一时春满越王台，
水暖山温聚俊才。
书记翩翩攻药石，
将军侃侃发惊雷。
马多暗哑缘风厉，
花不齐开待鼓催。
指日乾坤红紫遍，
情深莫忘岭头梅。

在“广州会议”之前，周恩来对戏剧作家们讲话时，曾兴奋地预言：

现在经济形势已开始好转，但是还会有一个时期的困难，可能对作家在物质上的照顾还会有些不够的地方，但从政治条件上看，会出现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政治上出现了新局面，文艺上也一定会出现新局面。……希望你们到广州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下。

从1959到1960年，反右派、反右倾、批资、批修，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思想批判运动，或如暴风骤雨，或如连绵阴雨，文化知识界有一种压抑情绪。1961年、1962年的调整

① 引自《田汉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8页。诗中的“书记”、“将军”指陶铸和陈毅。田等在讲话中引龚自珍的诗句“万马齐喑究可哀”，指出今日戏剧创作还不够旺盛。

以及揭露和批评“左”的错误，人们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期待着“新局面”的到来，盼望着“乾坤红紫遍”的一天。

但是，好景不长。原来这只是骤雨初歇的短暂片刻。不久便酝酿着更大的暴风雨。这一时期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和制定的各种条例，还没有贯彻执行、甚至还没有公开发表，便被打入了冷宫，许多正确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大批优秀作品、作家，遭到了批判和否定。

二 红色信号

毛泽东的告诫

“大跃进”的失误，大伤了国力、民力。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调整方针，到1962年，国内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三年困难的紧张局面有所缓解。但是，如何评价大跃进的得失，如何认识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如何评价为解决几亿农民的温饱问题而采取的“三自一包”等措施，如何认识困难时期城乡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如何估计调整工作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当前仍然存在的困难局面，等等，在这一系列问题上，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其他中央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明显地表露出来。

1962年2月“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1958年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但他显然不同意许多党员干部（包括刘少奇等）对“大跃进”的指责。“七千人大会”后，他离开北京到外地去考察。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主持中央工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作出了进一步克服困难、争取形势好转的重要决策。1962年8月6日，党中央在北戴河召

集工作会议；接着，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北戴河会议是为中央全会作准备的。两个会开了近两个月时间。两个会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农业问题、商业问题、工业问题、计划问题等有关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而毛泽东在两次会议上多次讲话，主要讲的是阶级斗争问题。

在北戴河会议上，他讲阶级、形势、矛盾。他提出问题：社会主义还有没有阶级？还有没有矛盾和斗争？国内形势是光明还是黑暗？在十中全会上，他说，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不断产生资产阶级，被推翻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甚至要复辟的。要“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要提高警惕，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国家还有可能走向反面”。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大会就讲”，“使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十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认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把1957年开始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观点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

毛泽东根据什么作出上述的政治结论？他在1962年前后究竟看到了哪些阶级斗争的事实？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十中全会上说，国际上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存在，所以阶级问题没有解决。他

说，1960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压我们。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共同舰队，1959年9月中印边境冲突，赫鲁晓夫支持尼赫鲁攻我们。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会议，81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阶级斗争。

对于国内情况，毛泽东说，有人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两极分化。党内有那么一部分人，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他说，党员的成份，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

的确，在1962年左右，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帝国主义敌视我们，对我国实行封锁。国内因“大跃进”刮“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农村管理体制的混乱和经济困难，导致一些地区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的激化。台湾蒋介石集团也利用我们的暂时困难叫嚷“反攻大陆”。

这些事实固然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但是我们看到，毛泽东在两个会上批评得最尖锐、最严厉的是他认为党内存在的所谓“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所谓“黑暗风”，主要是指1962年上半年刘少奇等在京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对当时严重的经济形势所作的实

事求是的估计以及为此而制定的进一步“退够”的决策。

所谓“单干风”，就是在调整期间，一些地区的农民和干部，为了抵制“五风”和平均主义，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解决温饱问题，自发地实行和推广包工包产到作业组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所谓“翻案风”，就是在政治方面，为1958年以来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同志甄别平反，以及彭德怀在1962年6月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八万言的长信，对自己历史的申诉。

毛泽东认为这三股风是反对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他说，1960年以来，有些同志“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这些同志认为“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于是就提出任务，搞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分单干，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这种“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搞单干就是对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信心，思想动摇，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其实，毛泽东所指责的“三风”，正是从1960年底开始的到1962年已经取得相当进展的调整工作。他对“三风”的严厉批评，反映了围绕着调整工作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之间存在的深刻分歧。国民经济的调整，是迫于严峻的经济困难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但调整工作不久便越出经济领域而扩展到政治、文化等领域。调整的实践产生了一种客观效应，就是直接冲击了几年来各个方面许多“左”的政策和措施。有一位党史研究工作者对此作了颇有见地的分析，他说：

调整是全面的，也是深刻的。虽然整个调整都是在保

卫“三面红旗”的口号下进行的。但实质上，它在许多方面是对1958年以来——实际上也包括1955年以来——各种“左”的错误部分的、程度不等的否定。例如大幅度削减指标是对总路线灵魂“高速度”的否定；最终确立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否定；甄别平反是对1958年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否定；调整文艺科技和知识分子政策、重申“双百”方针，是对大跃进以来这些领域中“左”的错误的否定；注重运用经济规律、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是对大跃进以来唯意识论的否定；《工业七十条》等重要条例的制订、实施，是对大跃进以来乱批规章制度、靠“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的否定，等等^①。

这一见解是相当深刻的。调整固然是对1958年以来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中各种比例关系和管理体制的调整，但它同时，已经接触到了对1960年以前旧的来自苏联僵化模式的改革。例如，对工厂企业的关、停、并、转，实际上是一次工业的大改组，工业内部结构的大调整。商业和农业、手工业方面也采取了许多较为灵活的政策，例如，要求大力恢复和发展自负盈亏的合作商店；恢复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发展农村集市贸易，允许社员饲养大牲畜；允许个体手工业者独立劳动，自产自销，收入归个人支配等。部分农村试行包工包产到作业组和家庭承包的生产责任制。这些就是毛泽东所批评的所

^① 郑读：《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再认识》，载《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240页。

谓“单干风”。实际上，所谓“三风”正是调整逐步深化的表现。

调整工作是从一些具体问题入手，进而对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的一定程度的否定。但是，在当时，“三面红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绝对不容触动的。这样，贯彻调整方针同高举“三面红旗”在实际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调整、改革，搞活，突破了“左”的框框，触动了“三面红旗”，对此，毛泽东不能容忍。他认为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实事求是地承认和估计困难状况，被认为是讲“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在农村推行“三自一包”，被认为是闹单干，搞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平反之风不对”，“不能一律都平反”。“三风”都是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动摇，是思想右倾。正如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等同志对大跃进提出批评意见认为是“一场阶级斗争”一样；他把在反右倾运动中、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批评意见，也都视为严重的阶级斗争。

所以，毛泽东认为，从北戴河到北京两个月的会议，讨论的是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工作问题，他不准备多讲；他只讲怎样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他用很通俗的话表述自己的意见：“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他说，“《香山记》是讲观世音菩萨的故事。天和地都不唱，单唱《香山记》，就抓阶级斗争”。他严厉地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十中全会发

出了这个“红色信号”。

阶级斗争的可怕图景

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国各省、市陆续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通称“四清运动”）的试点工作。毛泽东亲自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开始了新的恶性循环。

毛泽东号召“抓阶级斗争”，各级党委闻风而动。在搞“社教”运动的地区和单位中，一抓就抓出了许许多多所谓的阶级敌人，揭露出许许多多所谓的阶级斗争现象。

例一，1963年2月8日，湖南省委在关于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写道：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当前阶级斗争是激烈的，不论农村或城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嚣张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刮得很大。敌人的阴谋活动，最突出的是发展反革命组织，进行反革命宣传，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生产队，领导权已经落在地主、反革命手里。有些地方，正在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农村中的单干风，分田分地的现象虽已停止，但是分散副业、分散劳动力的现象还在发展。城镇中也有退店退社的单干风。秋后投机倒把之风大有发展，有些生产队由于大搞投机倒把，生产完全停顿。有些地方的农村集市，实际已变成资本主义活动的场所。城镇中私商的投机活动更猖狂，不但长途贩运，而且私招工人、开办黑厂黑店。随着两极分化的出现，雇长

工、放高利贷、买卖房屋和自留地的现象也发生了。秋后办酒请客成风，有些人实际上是把请客当作“生财之道。”封建迷信活动更普遍，不少地方修祠堂、建神庙，师公、巫婆、风水先生到处害人骗钱。农村、城镇赌风很盛，盗窃活动也很猖獗。黑剧团和卖唱者到处宣扬色情和封建迷信。不少的城镇出现了暗娼。总之，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企图复辟，“牛鬼蛇神”纷纷出现，从各方面威胁着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也是严重的，一部分党员和干部，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影响之下，已经变质或者正在演变。有些人不承认有阶级，同敌人“和平共处”，认贼作父，与地主、富农拜兄弟、交朋友、结亲戚。有些人已经叛变投敌，参加反革命组织，成为敌人进行复辟的得力助手。在刮“黑风”中，有些党员、干部就带头搞单干，投机倒把，雇工种自留地和经营副业，放高利贷，利用请客、迷信搞剥削。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上衰退，不干革命，说“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要能舒舒服服过日子就行了。”有擅自离职、退党的，有不工作而专门干私活的，也有腐化堕落、乱搞女人、讨小老婆的。有些干部包括有些领导干部，已经完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个别的基层单位，已经烂掉。总之，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是严重的。……

例二，同年4月15日，河南省委的报告说：这次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确凿地说明当前我省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光是90个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揭发出来的材料，大小投机倒把活动一万三千多起，地富反攻倒算两万六

千多起；反动会道门活动八千多起；巫婆、神汉、“阴阳先生”五万多人；续家谱一万多宗；买卖婚姻近五万起。特别严重的是，不少党员、干部参与了这些活动，有些甚至是他们带头干的。

这样的“情况报告”纷纷送到中央。许多地方的报告都说，由于认真执行了中央关于“社教”运动的指示，农村的“单干风”制止了，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了，各种矛盾和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了。所以，在同年2月召开的研究“社教”工作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兴奋地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5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根据各省、市上报的材料，“前十条”把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的阶级斗争情况概括为9个方面：

①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进行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下中农。

②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某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③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

④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

⑤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

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

⑥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

⑦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

⑧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⑨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前十条”所概括的“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实际上都是3年困难时期农村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少数干部作风不正，多吃多占，社队账目不清；一些农民搞封建迷信和倒买倒卖活动，以及个别地主、富农分子搞不法活动等。这些现象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具有敌我斗争的性质。有些情况则是干部和农民为调动生产积极性和战胜饥荒而采取的措施，如种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经营副业和长途贩运等。而且当时各地揭发出来的所谓“牛鬼蛇神”的破坏活动，有很多是虚假的，捏造出来的。例如1963年6月，据河南省南阳、信阳、商丘、洛阳、安阳5个专区和许昌专区4个县的统计，揭发出来的4771份“尖端”材料，情节属实的占54%，情节有出入和完全不实的占46%。一般材料虚假成份更多。据南阳专区的内乡等5个县统计，共揭发出“牛鬼蛇神”破

坏活动材料4694起，经初步核实，属实的仅占15.4%，情节有出入和完全不实的占84.6%；商丘专区揭发出有现行活动的会道门639起，查证属实的只有14起；反革命线索179起，查证属实的只有9起。况且这些所谓“属实的”材料，也是根据当时的“左”的观点而确认的。可是，当时却把这些局部的、个别的、夸大的、虚而不实的现象集中起来，加以抽象概括，得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结论：“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正在向我们进行“猖狂的进攻”，“阶级斗争形势是严重的、尖锐的”。所以要开展“社教”运动，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

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阅读各省、市“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并作了许多批示。他根据这些材料批示说，共产党人只有坚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才能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他说：

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现状及其严重后果的可怕图景作了骇人

听闻的描绘。1963年9月中央通过的“后十条”，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概念。

八届十中全会后，就是通过上述倾盆大雨式的宣传教育，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一整套“左”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观点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形成了社会思潮。

国际上的“反修”斗争，是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国际背景。早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就提出“批修”的问题。1957年3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批判”。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由于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冲突，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对中国施加巨大压力，我国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一手抓国内的“社教”运动；一手领导国际上的“反修”斗争。抓“社教”运动，也是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1963年中苏论战公开化。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所谓南斯拉夫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由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还缺乏充分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上的自觉认识，没有正确认识国际共运中出现的新问题，对于国际形势、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缺乏科学的判断，因此，在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同时，把苏联和东欧各国进行的一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尝试，看作是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现象，严厉地加以批判。由国

际上“反修批修”，联系到国内的“反修防修”。于是把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争论，把经济工作中注意经济效益和强调对劳动者的物质鼓励等主张，以及为摆脱“左”的框框而采取的某些改革措施，都斥之为修正主义。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所谓“和平演变”和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侵略所造成的威胁，使党内产生的危机感日益加重。毛泽东担心中国党内也会出现“修正主义”，出现“赫鲁晓夫”，中国也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1964年以后，他逐渐认为党变修、国变色已经成为现实的危险。所以他把“反修防修”放到了更加突出的地位。

“大写十三年”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把这段话作了歪曲理解的，除康生、陈伯达外，恐怕要数柯庆施了。康、陈、柯等人得到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便狠抓意识形态的工作，一来为他们自己的“革命”制造舆论，二来把异己者的意见、观点、言论斥为“反革命”。

50年代中期，陈毅从上海市调到中央工作，柯庆施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成为华东地区第一把手、最高负责人。他思想和作风同陈毅截然不同。他在上海推行一

条宁“左”勿右路线^①，独断专行，被后人称为“上海一言堂”。

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大肆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同年6月以后，他为“大跃进”浮夸风推波助澜。在文学艺术方面，他一句话，枪毙了电影剧本《吉鸿昌》、话剧《七月流火》、影片《布谷鸟又叫了》。

1959年5月3日，周恩来同参加人大和政协的文艺界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的部分文艺工作者讲的《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意图纠正1958年文艺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触到了柯庆施的痛处，他不准上海的代表在上海传达周恩来的讲话。

1961年6月“新侨会议”时期，柯庆施指令上海代表“只要带耳朵，不要带嘴巴，上海的路线是正确的，用不着检讨”。周恩来对电影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讲话，批评“五子登科”，就是针对受到柯庆施器重的姚文元之类“棍子”的。柯庆施不仅不准在上海传达周恩来的这个讲话，他和市委主管宣传工作的张春桥等人，还指责上海的代表“有话不在上海讲，要去北京讲”^②。他们嘲讽赵丹、张瑞芳是“通

① 柯庆施在1965年4月9日去世。他被“四人帮”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江青曾多次推崇柯庆施。例如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有份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支持的”。

② 参加“新侨会议”的上海电影工作者有赵丹、白杨、秦怡、张瑞芳、黄宗英、舒绣文、蔡楚生、陈鲤庭、孙瑜、沈浮、郑君里、桑弧、刘琼、艾明之、张骏祥、谢晋、袁文殊、李洪辛、丁一、徐桑楚、王世贞等25人。“文革”期间，这25人全部被关进“牛棚”，遭到严重的折磨和摧残。

天演员”（意思是他们可以直接向周恩来反映意见）。

1962年“广州会议”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
陈毅对剧作家们的讲话，上海市委坚决抵制，根本不准宣
传。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后不久，1963年初，柯庆施提出
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1月4日，柯庆施出席上海市文
艺界元旦联欢会并讲了话。他称赞了话剧《第二个春天》、
电影《李双双》和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说这些戏写的
都是解放以后十年的现代生活，很值得提倡。他说：

文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的。帮
助人民树立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
旧社会只能培养人们自己为自己的自私自利思想。社会
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才能
开始建立^①。

同年2月的春节团拜会上，柯庆施明确提出“写十三
年”的口号，他说，因为没有人提倡写十三年，所以我来提
倡；你们如果写十三年的戏，我就来看，不演十三年的戏我
就不看”^②。

同年4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上
就“写十三年”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春桥在发言中

^① 1963年1月6日上海《文汇报》报道。

^② 另据文明之回忆，柯庆施在春节团拜会上声色俱厉地说，“只要是写
十三年的，我就带老婆孩子买票去看；不是写十三年的，请我看也不
看。”参见《周恩来与文艺》第371页。

讲了“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他宣称：“只有写十三年，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才是社会主义文艺”。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在发言中，都指出“写十三年”的口号有片面性，特别批驳了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错误论调。

1963年12月25日至1964年1月22日，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柯庆施在开幕式上讲话，声色俱厉地批评话剧舞台上没有现代的东西。他说：“目前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问题是，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在内，热中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对于反映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沸腾的生活和火热的斗争，反而缺乏兴趣，缺乏热情”。他歪曲事实说，近几年华东地区有的话剧团在1960年上演的现代戏，只占全部剧目的7%，1961年占17%，1962年连一个也没有了。有的话剧团在1961年和1962年两年里，连一个现代戏也不演^①”。

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关于文艺创作的题材问题，即要不要提倡努力表现现代生活的问题。但是，人们后来才明白原来柯庆施、张春桥等是把它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提出来的，他们别有用心。他们要借此整一批人，制造一条“路线”。

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题材的多样化。但在建国以来，这个客观要求经常受到“左”的干扰。1956年5月，中

^① 见1963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宣部长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中说，“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他批评了当时在题材问题上的“左”的主张。但是1958年提出“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要求文艺为鼓吹“三面红旗”服务，严重地限制了创作题材的范围。所以周恩来、陈毅在调整文艺政策期间，都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

周恩来说：

至于题材，完全可以允许作者自由选择。古代，没有社会主义，但有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人民创造了许多他们理想的人物，如武松、穆桂英等，还有不少神话，都可以写。……创作题材要有个大体的比例，文化部在这方面要多做些工作，但决不能强迫命令和干涉过多^①。

他又说：

演现代剧可以表现时代精神，演历史剧也可以表现时代精神。……不能被时代精神拘束了，对时代精神要作广义的了解。否则你就不能写历史剧、神话剧、童话剧了。如果只是把现实生活搬上舞台，那有什么看头^②。

陈毅说得更为直截了当：

要写的东西很多，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几千年历史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38页。

^② 《周恩来论文艺》第112—114页。

都可以写，近40年的革命实践也可以写，12年来已经很成熟的东西也可以写，为什么要逼迫我们的作家，忙去写一些不成熟的东西，糟踏精力，糟踏劳动力，这不好^①。

这些意见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既没有反对写现代题材，又主张不要限制题材的范围。然而，这些意见显然是针对1958年以来题材问题上“左”的偏向，因而触怒了柯庆施、张春桥等人。他们提倡“大写十三年”，蓄意同周恩来、陈毅唱反调。

柯庆施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开幕式上讲话中说，“有些时候，有些地方，舞台上居然在那里宣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有些人，特别是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干部，对此不痛心，不干涉，不阻止，不反对，甚至还去找理由替它辩护”。他又说：“不写现实生活；不写工农兵，认为这里没有戏，没有人情味，感情不丰富，实际上就是认为：只有写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写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这才有戏，才有人情味，才有丰富的感情，……”柯庆施的这些指桑骂槐的话，显然是对着周恩来和陈毅的。

不仅如此，提出“大写十三年”，还为迫害一大批著名的文艺作家制造口实。1962年前后，出现了一批历史题材的小说、影片和戏剧，如小说《我的一家》、《刘志丹》、话剧《兵临城下》、《胆剑篇》，电影《革命家庭》、《红

^① 《文艺研究》1979年第2期。

白》、《红河激浪》、《逆风千里》、《早春二月》、《甲午风云》、《舞台姐妹》，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以及根据民间传说或古典小说改编的戏曲片绍剧《三打白骨精》、越剧《红楼梦》、《柳毅传书》、川剧《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京剧《谢瑶环》和昆曲《李慧娘》等。这正是调整文化政策文艺园地开始复苏的可喜现象。可是柯庆施、张春桥声称凡是不以十三年为题材的作品都不属于社会主义文艺，只有写十三年的作品才有现实的教育意义，一切写历史题材和革命史题材的作品都没有现实意义和价值，至于传统剧目更不在话下——它们不仅不是社会主义文艺，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贩卖封资修的货色”，“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他们把大批优秀作品排除在社会主义文艺之外，全盘否定“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运动的成就，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文艺战线的成就，这就为后来林彪、“四人帮”制造“文艺黑线专政”论，在文艺界实行法西斯专政、打击迫害大批文艺界的领导人和作家、艺术家作了舆论准备。

“文革”中，许多文艺界领导人——如原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前《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等被迫害致死，在他们的“罪状”中，都有“反对写十三年”这一条。

不可否认，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描写社会主义时期生活的作品的确为数较少，而历史题材和传统剧目数量不少。这是什么缘故呢？

首先是许多作家不熟悉十三年的题材。因为建国13年

来，除了前头6年有值得讴歌的生活以外，从1957年起，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重大失误接二连三，接着是三年经济困难。如何认识这后7年的历史，作家处于惶惑之中（历史不成熟，生活不熟悉），所以难以下笔。

其次，多写历史剧，也是响应党的号召。1962年9月29日，在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扬传达邓小平的指示：编一点历史戏，使群众多长一些智慧。同年11月，周扬召开历史剧座谈会，号召历史学家编写历史题材的戏，并请吴晗负责写“中国历史剧拟目”。同月19日，中国剧协邀请首都文艺界和史学界举行座谈会，讨论历史剧问题。可见，多写历史题材是事出有因的。同时，写现实题材的作品，往往招致种种责难，受到不应有的限制。创作人员怕犯忌讳，笔下顾虑重重，因此有意回避现实题材，调转笔锋去写他们所熟悉的近现代革命斗争的历史题材和历史故事，用革命英雄事迹和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人民克服困难；或者去创作历史剧、改编传统剧目，以史为鉴，以古喻今，让人民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寓教育于娱乐之中。这样做，既可以使各种剧种得以发展，又使群众在物质困难年代得到文化食粮的给养。

一方面，陈毅为作家们撑腰，他说，为什么要逼迫我们的作家去写不成熟、不熟悉的题材呢？另一方面，柯庆施要作家去“反映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沸腾的生活和火热的斗争”，就是要他们去歌颂“政治思想战线上伟大胜利”的反右派运动，去歌颂给国家带来灾难的共产风、浮夸风，去歌颂不现实的人间天堂。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

文艺，就是封资修。可见，围绕“大写十三年”的争论，实际上是赞美不赞美“左”倾错误的一场深刻斗争。

诚然，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左”倾错误造成人民情绪的低落、社会的不安定，一些低级、庸俗以至黄色反动的文艺作品乘机沉渣泛起。但这毕竟只是局部的现象。而且，正是由于康生、江青这些“中央首长”擅自开放一些禁演的旧戏、坏戏，使戏剧舞台上出现了混乱。这怎么能怪罪广大文艺工作者呢？

“两个批示”

由于把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份严重，又认为反革命复辟先要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再加上江青、康生不断提供假情报，所以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在领导国内“四清”、国际“反修”的同时，十分注意文化艺术方面的“阶级斗争”。他多次严厉批评文化界。例如，1963年9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戏剧要推陈出新，不要推陈出新，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同年11月，他又说，《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的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果不改变，就改名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人死人部。

1963年上海开展“故事会”活动，用讲故事的方式，对

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进行阶级教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从1963年7月起，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小册子，书名《故事会》，至1966年1月，共编辑出版21辑。据1—12辑统计，共68篇故事，其中关于农村阶级斗争的8篇，回忆对比（忆苦思甜，歌颂新社会，歌颂人民公社）7篇，革命斗争8篇，生产斗争5篇，新人新事、移风易俗15篇。1963年12月，中宣部文艺处编印了一份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这份材料的一些内容是经过柯庆施歪曲的^①。12月12日，毛泽东看了这份材料，写了如下批示：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者。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个批示虽然说“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是它在总体上、基本上全面否定建国14年来文学艺术的成绩。这个批示对文化艺术界状况的估计，

^① 参见《关于“文艺黑线”和“两个批示”——陈荒煤谈文艺的斗争》，香港《广角镜》1979年第84期。

很大程度上是以柯庆施提供的材料为根据的。反过来，柯庆施又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12月25日华东话剧会演开幕式上讲话，理直气壮地宣扬他的“大写十三年”的主张，并恶狠狠地指责文艺界。他说：

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相适应……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和斗争，15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①。

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赶来参加这次会演，却遭到了冷遇，除夕晚宴主宾席没有他的座位，元旦柯庆施以华东、上海主人接见演出人员，田汉坐在边屋，远离接见大厅，见不到这位主人。大会即将结束，秘书处传来消息，大会闭幕式主席台上没有田汉的座位。这已经不是对田汉个人的礼遇问题，而是公开向戏剧界挑战。为了避免僵局的出现，田汉悄悄地提前离开上海。这时，一般文艺界人士虽然还不知道毛泽东的批示，但已经传来风声，说13年来文艺工作路线有问题。

1964年1月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30多位中央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由周扬讲文艺界的问题，中央领导人先后插话，发表意见。

周扬说，这一年多来，主席很注意文艺问题。根本问

^① 这个讲话刊登在1964年8月出版《红旗》杂志第15期上。

题，就是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少数人根本反对这个方向，也就是不赞成这个方向，也就是要搞资产阶级方向，封建主义方向。就是离开社会主义搞死人、古人、洋人，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挤社会主义的东西，来占领阵地。他说，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到方向问题上来，提到文学艺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来，还提到反修问题上来，把一些现象综合起来，提到这么一个高度来看问题，就比较清楚。

与会的中央负责人一致认为毛泽东的批示是正确的。许多同志都对文艺战线的状况作了严重的估计。如刘少奇根据周扬的讲话说，整个文学艺术的阵地，我们无产阶级跟社会主义占领得很少，封建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占压倒优势，阵地是它们占了。

就在毛泽东写了“第一个批示”和部分中央负责人的“一、三”谈话之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1964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有北京和外地的戏剧工作者二千多人参加。据说晚会“着重的是吃喝玩乐，部分演出节目庸俗低级，趣味恶劣”^①。陆定一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剧协的一部分人已经腐败；所有各协会工作人员都应该轮流下放锻炼和加强政治学习”^②。中宣部立即向剧协党组作了传达，责成他们

①②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共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五），第337页。

作出检查，并在3月下旬召集文联和各协会党组成员、总支和支部书记50多人，开会进行讨论。与会者认为“迎春晚会”问题是当前阶级斗争在文艺队伍中的反映，是剧协领导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暴露，这种情况在其他协会中也存在着。因此，决定整风。参加整风的有全国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曲艺工作者协会、舞蹈工作者协会、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摄影学会等10个单位的全体干部。经过20多天的集中整风学习，5月8日，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报告》说整风中检查出下列的问题：

一，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各单位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作家、艺术家对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缺乏热情，《剧本》月刊不刊登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剧本《夺印》，却热心发表《李慧娘》等鬼戏。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外国名歌二百首》，发行70多万册，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二，文艺理论批评旗帜不鲜明，不鼓励作家创作现时代的先进人物形象，反而提倡多写不好不坏的“中间人物”，音乐舞蹈界盲目崇拜西洋。三，对文艺队伍的落后面估计不足，忽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文艺机关政治空气稀薄，工作人员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严重，追求个人的名利，想成名成家，有些单位人员复杂，队伍不纯。总之，各文艺团体的根本问题是没有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问题确实很严重，必须痛下决心，改变作风，整顿组织。

中宣部的《报告》提出五项改进措施：要求作家努力创

作反映当前阶级斗争的作品，改进文艺刊物，加强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其他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各单位立即抽出 $\frac{1}{4}$ 到 $\frac{1}{2}$ 的干部下放劳动，参加农村“四清”，改造思想；成立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联系实际，活学活用；清理队伍，改组领导机构^①。

文联和各协会的负责人是遵照毛泽东的“第一个批示”、中央负责人“一·三”讲话和陆定一的批评进行整风的。他们从严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中宣部的《报告》是根据上述指示精神起草的。这个《报告》的草稿（未经中宣部负责人审阅，未经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定稿）被自称为“流动哨兵”的江青看到，她借口个人要看，私自将这份草稿送交毛泽东。6月27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草稿上写下了第二个批示，更加严厉地批评文艺界。他说：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再前进一步就要坠入反革命的深渊，“裴多菲俱乐部”，那就是策划政变的反革命团体了。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二室编，《中共社会主义时期文献资料选编》（五），第338—342页。

这两个批示对文艺界震动很大，许多人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即将降临，整个文艺界在劫难逃。这两个批示不久就成为发动“文革”的重要的理论根据。

康生、江青的出台

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不正确的估计，康生和江青在其中起了恶劣作用。对于文化艺术界人士来说，康生和江青是两个凶神恶煞。他们在十中全会以后，以抓阶级斗争为名，到处煽风点火，掀波作浪，直到“文化大革命”窃取党政大权，干尽了祸国殃民的勾当。对于这两个在“大批判”中扮演主角的人物，须得作一点突出的介绍。

康生，原姓张，名宗可，字少卿，1898年出生在山东胶县，1917年全家搬到诸城，改名张光裕。

康生从小过的是地主少爷生活。因受新思潮的影响，投机革命，1924年7月进上海大学学习，1925年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换姓改名赵容。中共“六大”后，他投李立三所好，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秘书长。1931年投靠王明，1933年赴苏联，起用俄文名字Кан Ишен（康生），成为王明的国际伙伴。1937年11月随王明回国，到延安，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任中央党校校长。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由紧跟王明转变为拥护毛泽东。1941年延安整风，康生任总学委副主任，

掌握整风运动领导权，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很不得人心。

从1949年6月至1955年，康生因职位排在饶漱石之下，心怀不满，消极怠工，先后到青岛、杭州、北京“养病”6年，直到饶漱石因“高饶联盟”事件身败名裂、中共准备召开“八大”，康生才重返政治舞台，到处出头露面。“八大”选举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比原来的政治局委员降了一格，名次排在陈伯达之后，他十分恼火。但为了东山再起，他含恨隐忍。

“八大”前，他就探听到毛泽东准备花更多的精力从事理论研究。他看准了方向，“八大”后，1956年11月，便着手抓理论方面的工作，准备从这里打开一条取得毛泽东宠信的路子。1957年3月15日康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1959年3月，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康生被任命为编委会副主任，插手《毛选》四卷的编辑工作。1959年下半年，他又受中央委托，兼管中央党校工作。这样，康生就掌握了党的理论工作的领导权。

接着，他盘算下一步棋的走法。“八大”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最高领导人对此是不会太舒服的。康生决定同“八大”唱对台戏，提倡个人迷信，高唱个人崇拜。他用尽心计，突出宣传毛泽东，大讲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和贡献。1957年3月13日，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自1956年以来，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有了四个方面的“新的说明”，“新的发挥”和“新的发展”。1958年夏，他在北京音乐堂

给全市政治教师作报告，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顶峰”的观点，说“世界上没有谁能超过他的水平”。1960年1月，他又发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的提法。总之，从1957年至1960年，康生到处作报告，提出一系列新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最明显、最突出、最全面”，是“全面发展”，“全面超过”，是“顶峰”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曲意逢迎，无耻吹捧。他这样做，用心有三，一可以制造个人迷信，禁锢人们的思想；二可以美化自己，把自己打扮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三可以借此打击陷害异己者——那些坚持真理、反对个人崇拜的人。

1958年，康生是“大跃进”的吹鼓手。他利用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份，跑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长城内外几个省市，他走到哪里，就讲到那里，从“教育大跃进”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从消灭家庭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调门越来越高。他全盘否定教育部的工作，否定学校的基础教学，鼓吹停课劳动，训斥教授专家，痛骂知识分子。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他激昂慷慨地批判彭德怀、张闻天。庐山会议后，他积极作“反右倾”的报告，并且在理论界找出杨献珍作为批判对象，制造“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问题的争论，把杨献珍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领导人集中精力从事调查研究，制定各种条例，采取措施，贯彻“八字”调整方针，战胜困难。唯独康生却悠闲自得，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游山玩

水。他同周恩来、陈毅等纠正“左”倾错误唱反调，借口关心传统戏曲的整理工作，在昆明，在成都，在杭州，在北京，凭着权力，强迫一些剧团和演员演出许多未经整理或早已禁演的低级趣味、色情淫荡和封建迷信的旧戏、坏戏，如《花田八错》、《十八扯》、《宝蟾送酒》、《辛安驿》、《虹霓关》、《大五花洞》等。康生反对京剧演现代戏。他曾对人说：“谁要马连良演现代戏，我开除他的党籍”。1962年春天，在杭州，他陪江青看了将近两个月的戏。在康生、江青的鼓励下，在1961年前后戏曲舞台上出现了混乱现象。

然而到了1962年十中全会，康生听到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讲话，立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摆出一贯反对旧戏、坏戏的戏剧改革家的姿态，大抓文艺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到处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任意把一些优秀（或有某些缺点）的作品打成毒草，陷害许多著名作家。

和康生同时出台的还有江青。他们狼狈为奸，里应外合。

江青原名李云鹤，乳名李淑蒙，一说李进孩，山东诸城县人。康生家于1907年搬到诸城。他比江青大16岁，曾当过诸城高等小学校长，那时江青刚上小学。因江青的母亲曾在诸城大地主张家当过佣人，为此，江青早已认识张家二少爷张少卿。

30年代，江青即蓝苹在上海因参加左翼文艺活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写了悔过书出狱，参与为蒋介石祝寿的演出。1937年，她到了延安，隐瞒了上述不光彩的历史，得到康生

的袒护和引荐，与毛泽东结婚。鉴于江青历史不清以及毛泽东的地位和工作的重要性，一些中央领导人曾提出几点约束江青的不成文的意见：不得参与党政工作；不得抛头露面；照顾好毛主席的生活。40年代和全国解放后对江青都是照此办理的。例如1950年元旦，江青打电报给毛泽东要求去参观新解放区的土改。为此，毛泽东于1月4日打电报给刘少奇和江青，意思是说，同意江青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可见，当时对江青的管束、对她行动的限制是比较严格的。她要出头露面，须经过一定的组织手续；特别提醒她“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防止江青以特殊身份指手画脚。江青在建国后的工作情况她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有一段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毛主席作秘书，主要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

江青说自己在文教方面是“一个流动的哨兵”，这个比喻是最恰当不过了。江青她无权抓军队工作和政治工作，她对经

济工作不感兴趣。至于文艺方面，因为30年代在上海演过戏，还有点老本。再说她挂名为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化部电影艺术局顾问，所以充当“流动哨兵”——可以自由活动，东走西窜，两眼盯着文教界，把她“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送给毛泽东。仅这一句话，人们便可想而知，毛泽东关于文教方面的许多信息、情报是由江青提供的。

江青早有政治野心，只是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她满腔愤恨地说：“刘少奇他们专了我十多年的政，不让我参加党的活动”。1962年江青在杭州“养病”，康生陪伴她，一连看了两个月的旧戏、坏戏。但是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并号召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江青和康生一样，看准了这个时机，决心打起“文艺革命”、“戏剧改革”的旗号，开始积极活动。她先想插手北京文艺界，遭到北京市委的抵制，就跑到上海，得到华东第一把手柯庆施的支持。柯庆施让张春桥给江青当助手。张春桥又带上“棍子”姚文元。1963年春，他们准备批“鬼戏”，首先向戏剧界开刀。从此，康、江勾结，柯、江、张、姚串通，“大写十三年”，大闹“京剧革命”，评《海瑞罢官》，为“文化大革命”敲响了开台锣鼓。

三 文苑奇冤

诬陷小说《刘志丹》

康生插手文艺界制造的第一桩冤案，就是小说《刘志丹》事件。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现在写小说盛行，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后一句话，原是毛泽东引用康生的话，是康生诬告《刘志丹》时说的一句话，后来被写进了《毛主席语录》，增加了它的知名度和权威性。

1962年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警告全党注意阶级斗争问题，康生立即活跃起来，很快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典型”，即小说《刘志丹》的创作和出版。

1956年，为了对工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工人出版社拟订了一个出版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的选题计划。作家李建彤（刘景范的妻子、刘志丹的弟媳）接受了创作《刘志丹》的任务。她从1956年开始搜集资料，1958年动笔，5年之内，5易其稿。1962年春写出了第5稿（上册），征求意见。不料这部小说触犯了某些人。例如，书中描写了一个被

游击队改编的土匪，后来又叛变投敌了。有个头面人物，认为那个土匪就是他的哥哥，就到康生那里去告状。康生如获至宝。他还没有看到书稿，便武断地说，“我一看书稿，就知道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7月底至8月初，《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刊载了《刘志丹》第6稿的部分章节，康生得知后，一方面命令所有报刊一律停止发表小说《刘志丹》，并责令工人出版社把《刘志丹》第3稿印300本，第5稿印600本送中央审查；另一方面在北戴河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和八届十中全会上竭力煽动对该小说的批判。

李建彤在收集材料时，曾走访了许多地方和许多原在西北局工作过的同志，如习仲勋、贾拓夫、马文瑞等。第3次和第5次修改稿曾送请这些同志审阅。这些同志鼓励了作者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于是，康生便凭着主观想像，捏造罪名，说《刘志丹》不仅“为高岗翻案”，而且“为习仲勋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他说《刘志丹》“剽窃毛泽东思想”，树立陕甘根据地“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在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批判“翻案风”，把《刘志丹》也列为“翻案风”的表现之一。康生一口咬定，“习仲勋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爱人李建彤，合伙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目的是为高岗翻案。”他说习仲勋是这个反党集团的挂帅人物。这个反党集团不仅有刘景范，还有贾拓夫，上有头目，下有手脚，活动能量，可谓大矣！根据康生的诬告，十中全会在没有搞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认定“习（仲勋）、贾（拓

夫)、刘(景范)是个反党集团”，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康生任专案组组长。十中全会后，专案组对作者李建彤进行“三堂会审”。同时，没收她的全部采访记录，并且按记录上的姓名寻找那些被采访过的干部和群众。此外，西北5省的大批干部陆续被调到北京来“学习”，说他们是反党集团的人。《刘志丹》一案，从1962年审查到1966年“文革”前夕，还没有作出结论。

“文革”开始后，康生声称要“继续算《刘志丹》这笔账”。姚文元点名批判《刘志丹》，说它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说那些支持、鼓励和审阅小说的领导人是“反党野心家”，说他们“企图假借这部小说，洗刷高岗的反党罪恶，篡改历史，推翻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正确结论”。康生还给红卫兵提供资料，煽动他们到全国各省市贴大字报，揪人。

这桩冤案株连极广，后果极为严重。习仲勋被撤掉了副总理的职务，审查了16年，关押8年。国务院经委副主任贾拓夫撤职下放，“文革”中被害死在北京郊区。劳动部部长马文瑞，“文革”中被关押了6年，一机部副部长白坚因“为小说提供炮弹”，在一机部被批斗致死。湖南省劳动局副局长刘宗勉，被沉到河里淹死。原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受尽肉刑，被折磨致死。该出版社吕宁被打成内伤，周培林受了电刑。该书责任编辑何家栋全家被赶到乡下，6口人每月只给30元生活费，母亲和两个儿子在贫困中病死。给作者带过路的陕北群众王悦贤、刘景华被迫害致死。陕甘地区被揪出

的所谓“彭、高、习黑爪牙”达1万多人。^①

这是一桩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它的所有罪状，都是康生一手捏造出来的。小说里并没有出现高岗的名字，也没有写高岗的主要事迹。康生硬说“小说中的罗炎就是高岗”。其实，罗炎并无其人，他是采用5个人的素材塑造出来的艺术典型。其中只有一个情节和高岗有相似之处。本来高岗是陕甘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即便写到了他，那也是历史事实，不能认为是为他翻案。小说中并未写习仲勋的事迹。小说描写和歌颂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是无可指责的。把表彰革命先辈的革命业绩，说成是“为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完全是欲加之罪，无限上纲。小说里写到刘志丹创建陕甘根据地时，曾经从毛泽东的著作中得到启示，他说“井冈山是咱们的榜样”，表示要“照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样子去做，去发动群众，组织红军，武装割据！”作者是怀着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描写刘志丹的，说明陕甘根据地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创建和发展的。所谓“剽窃”之罪，何从说起？十年内战时期，星火燎原，群雄并起，除了中央苏区，各地还建立了不少革命根据地。小说描写了这种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而又特别说明陕甘根据地是以井冈山为榜样建立的，这怎么能是“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呢？可见康生加给《刘志丹》的种种罪名，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康生为什么要诬陷《刘志丹》呢？说穿了就是为了投最高领导之所好。小说《刘志

^① 参见刘尚莹：《把〈刘志丹〉定为反党小说是一大冤案》，1979年2月1日《解放军报》。

丹》描写的是高岗工作过的一些地方，而彭德怀正好担任过西北区书记，习仲勋又是彭德怀的副手，把“彭—高一习”串连在一起，由彭、高而迁怒于习，很符合思想逻辑，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迎合了毛泽东的心理，何况它还为阶级斗争理论提供最现实的根据，证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完全正确，批判“翻案风”完全正确。当然，由《刘志丹》而引出的所谓“利用小说反党”的奇谈，为向文艺界开刀和诬陷更多的作家、作品创造了新的罪名。

《李慧娘》和鬼魂戏

江青出场闹“文艺革命”的第一个“杰作”，就是批“鬼戏”，批孟超的昆曲《李慧娘》。康生支持江青，诬蔑《李慧娘》是反党大毒草。

1958年，周恩来看了北方昆剧院演出革命现代戏《红霞》之后，给全体演职人员讲话时讲到，剧院今后的剧目，应当两条腿走路，既演出革命现代戏，也演出新编历史剧和优秀传统戏。对待传统戏既要继承又要发展，要推陈出新。根据周恩来的意见，1959年冬，北方昆剧院约请老作家孟超把明代周朝俊的传奇《红梅记》改编为昆曲剧本。孟超广泛搜集和研究了有关的剧种和剧目，如秦腔《游西湖》、川剧《红梅阁》、梆子《阴阳扇》、京剧《红梅阁》等，在此基础上，于1960年春夏之交完成了初稿。他剪除了原作的繁枝蔓叶，集中刻画太学生裴禹和李慧娘之间的离奇悲壮、高尚

纯洁的生死恋，同时突出描写裴禹对南宋腐败朝政的抨击和李慧娘对奸贼贾似道的反抗斗争，把剧名改为《李慧娘》。

《李慧娘》故事大意是：南宋末年，蒙古族入侵，大敌当前，偏安临安（即今杭州）的南宋王朝危在旦夕；可是把持军国大权的宰相贾似道仍然不抵抗，欺上瞒下，歌舞升平，老百姓生活痛苦不堪，敢怒而不敢言。太学生裴禹（舜卿）曾多次联名上书，揭露贾似道的误国害民，但这些状纸都落在贾似道的手里。

贾似道身边有许多妻妾，其中有一个叫李慧娘。李慧娘原是良家女子，在避难途中被贾府抢去，被迫当了贾似道的小妾，备受凌辱折磨。李慧娘对贾似道的荒淫卖国恨之入骨。有一天，贾似道祝寿，带了妻妾坐船游西湖，恰好被裴禹等太学生撞见，裴禹当面斥责贾似道：“当日督师汉阳，派宋京前往元军称臣纳币，乞和求降；班师之日，却欺君骗民，谎言凯旋，因此步步高升，今日之事，又何尝不是依样葫芦。你这大大的卖国奸贼，难道还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贾似道气恼至极。这时忧郁寡言的李慧娘听了这个青年人竟敢痛斥贾似道，不禁脱口赞道：“壮哉！少年！美哉，少年！”不料此话被贾似道听见。贾似道怒不可遏，下令回船返府。回到相府，他把李慧娘杀死，埋在后花园红梅阁畔。他又派人把裴舜卿抓来，关在红梅阁里，准备第二天将他杀害。李慧娘死不瞑目，她的鬼魂又回到人间，先到红梅阁救出了裴生，又到了贾似道府内，痛骂奸贼。她说：“俺李慧

娘，生作冤禽，死为厉鬼，喷火千丈，正气凌人，喷血三尺，足制贼命”。她一头撞了过去，贾似道昏倒在地。李慧娘跳上书案，大笑三声，唱道：“千古正气冲霄汉，俺不信死慧娘斗不过活平章！”

1961年夏秋之间，《李慧娘》在北京首次公演，然后到各省市巡回演出，得到周恩来的赞许，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

但是，就是这样一出形象壮美、充满爱国意识和斗争精神的好戏，遭到了江青、康生等人的诬陷。1963年3月，江青到了上海，得到柯庆施的支持，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炮制了一篇“围剿”《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5月6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从此，全国戏剧界开始大批“鬼戏”。

《李慧娘》从创作、演出到被批判，在这个过程中，康生扮演了很可耻的角色。康生和孟超都是山东诸城县人，有同乡同学之谊。孟超改编《红梅记》，曾多次请康生提意见。康生不仅支持孟超的改编工作，而且提过修改意见，1960年《李慧娘》彩排期间，康生多次到剧场看戏。他建议把李慧娘头上戴的蓝色鬼穗子改为红色鬼穗子。原来孟超写的李慧娘赞美裴生“美哉，少年”是两句重复句，康生说，要有点精神，提笔把前一句改为“壮哉，少年”。1961年秋，《李慧娘》正式公演，康生又亲临观看。看后，非常满意，专门写信给孟超，“祝贺该剧演出成功”。康生全面肯定《李慧娘》的编导、乐曲和表演，说它是“近期舞台上最

好的一出戏”，称赞孟超“这回做了一件大好事”，还指令北方昆剧团“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

可是，到了1962年秋天，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康生的态度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支持江青批“鬼戏”。1964年7月30日，他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作总结报告，指责北京剧协“十五年来没有写出一本好剧本，相反倒有了《李慧娘》、《谢瑶环》这样的坏剧本。”他质问道：“为什么会出现了牛鬼蛇神，出现了《李慧娘》这样的鬼戏？”他要北京剧协对此作出答复。他说，“李慧娘这个鬼”是“代表了死了的阶级”来“报仇的”，“向谁报仇呢？就是向共产党报仇！”康生就是用这样耸人听闻的罪名，把《李慧娘》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1965年3月一个笔名叫齐向群的写了一篇《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说作者孟超“是通过剧中人物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号召和鼓励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向社会主义去进行复仇斗争。”

1963年起，《李慧娘》被打入了冷宫。“文革”期间，《李慧娘》的作者、导演、演员、评论工作者、出版部门的大批人员都遭到残酷迫害，甚至他们的家属、家属的朋友也受到株连。孟超把康生写给他的两封赞扬《李慧娘》的信交给了“专案组”，谁知掌管专案组的就是康生，两封信都落入康生之手。康生为了灭口，诬陷孟超是“叛徒”。孟超沉冤难雪，含恨而死。

把《李慧娘》打成毒草剧目，主要理由有两条：一是说

戏中出现了鬼魂形象，是“鬼戏”，是宣扬封建迷信；二是说孟超改编时，突出裴禹、李慧娘这两个主要人物的反抗性和斗争性，是着意借古讽今，影射现实，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

这两条罪状都是强加的，是无端诬陷。

我国的文学遗产（其实外国文学也一样）如小说、戏曲、笔记中，向来有许多神鬼故事。神鬼虽然是虚幻的东西，但它代表一种自然力量，同时，代表一种社会力量。正如廖沫沙在《有鬼无害论》一文中说，文学作品中的神鬼，代表自然力量的色彩已经很少，它们是在参加人世间的社会斗争。本来是人，死后成鬼的阴魂，当然更是社会斗争的一分子。戏台上的鬼魂李慧娘，我们不能单把她看作鬼，同时还应当看到她是一个至死不屈服的妇女形象^①。

对于鬼魂戏，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加以分析，区别对待。有好的鬼魂戏，也有坏的鬼魂戏，好的鬼魂戏属于神话剧范畴，坏的鬼魂戏属于宗教剧范畴。

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鬼神形象。马克思高度赞美的希腊神话传说里，有的就穿插着鬼魂的故事。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肯定“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他还引用马克思的话，最好

^① 廖沫沙：《有鬼无害论》，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报》。

的神话具有“永恒的魅力”^①。我国传统的神话剧《天仙配》、《张羽煮海》、《刘海砍樵》等以及鬼魂戏《伐子都》、《钟馗嫁妹》等都曲折地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对坏人的惩罚，它们宣扬的并不是封建迷信思想。《活捉王魁》（《打神告庙》）、《窦娥冤》，则是强烈控诉社会人世的不平。焦桂英一个弱女子，竟然动手打了海神，砸了他的神位，窦娥负屈含冤，她骂天骂地，她提的三件心愿——血溅白练，三伏天降下瑞雪、楚州亢旱三年——实现，表现了她的冤屈之深和斗争性之强。李慧娘和焦桂英、窦娥一样，都是鲁迅所说的复仇的美的鬼魂。

如果说出现鬼神就是宣扬灵魂不灭的唯心观念，那么《三打白骨精》，也出现神鬼精怪，而毛泽东却借它写诗抒情。毛泽东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描写杨开慧、柳直荀两位烈士的英灵“直上重霄九”，为接待烈士的英灵，神话中的吴刚捧出了桂花酒，美丽的嫦娥为之翩翩起舞。当人间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报九霄，烈士们激动得热泪倾盆。人们从诗中感受到的是无比优美的艺术境界，是对烈士的革命功绩和乐观情怀的歌颂，有谁会说它是宣扬灵魂不灭的唯心观点呢？1961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编辑出版的《不怕鬼的故事》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它向人们宣传的不是唯心主义，而是藐视敌人、藐视困难、战胜敌人、战胜困难的唯物主义的斗争精神。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05页。

另有一类鬼魂戏，如《目莲救母》、《活捉张三郎》、《黄氏女游阴》、《游地府》等，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超脱引渡，展现地狱的阴森、恐怖，用以恫吓、愚弄落后的人民群众，使之慑服于幽冥世界的威力，听从命运的摆布。这一类宣扬封建迷信的坏戏，是必须批判、禁止的。

文艺作品中出现神鬼魔怪的很多，如中国传统剧目《闹天宫》、《白蛇传》、《宝莲灯》、《天仙配》，古典小说《聊斋志异》等，从来没有人出来反对过。外国的优秀作品，如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其中都出现鬼魂形象，也从来未遭反对。为什么唯独对昆曲《李慧娘》中出现鬼魂而肆意抨击呢？可见，以出现鬼魂形象为理由批判《李慧娘》是别有用意的。

把《李慧娘》打成大毒草的，主要原因是说他借古讽今，影射现实。1964年1月3日，部分中央负责人座谈毛泽东关于文艺的“第一个批示”时，有位领导人就说，李慧娘是个厉鬼，她是有反党动机的。这个戏是号召人民来反对贾似道那些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这是非常可笑的批评。难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的文章指出，怎么可以把贾似道比作共产党呢？过去封建时代帝王将相都不曾认为反对贾似道就是反对他们，还能容纳《红梅阁》，而我们却不能容纳《李慧娘》，这样做，把我们党置于何地。

我们党历来教育党员要关心和同情人民的疾苦，反对残暴，反对压迫，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群众。革命老作家孟超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把《红梅记》改编为《李慧娘》的。

你看裴禹质问贾似道：

为什么劫民盐，重利益剥？

为什么占民田，压榨抢掠？

为什么增赋税，强索豪夺？

为什么滥用刑法，排挤善类，杀人如麻……

闹得这大宋朝，哀鸿遍野，黎民失所！

你看李慧娘的鬼魂谴责贾似道：

俺笑那君王无知昏庸，

认你做好平章。

你却向元兵称臣投降，

任意诛杀，苦害善良，……

你看裴生的表白：

纵然是祸来天外，俺大丈夫，肝胆在，有何惧哉！

你听李慧娘自豪地说：

俺李慧娘生前受欺死后强梁。

痛斥奸贼，张扬正气，从来是优秀作品的主题，怎么能说是反对共产党呢？

1962年昆曲《李慧娘》出版时，孟超在该书的跋中，特地说明他写《李慧娘》的思想出发点，“不过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人生而已”。他说：

有人认为李慧娘生前懦弱，死后坚强，虽亦感人动人，毕竟是虚无空幻，寄希望于渺茫，也难免有过屠门而大嚼，聊以快意，无补于现实；但我则终以为生前受尽压迫凌辱，白刃当前，渐露与权奸拼死斗争之机，染

碧血，断头颅，授死不屈，化作幽魂，再接再厉，不仅为个人复仇雪恨，且营救出自己心佩情往之裴禹，并以庶黎为怀，念念不忘生活于苦难泥涂之众生，如此扬冥冥之正义，标人间之风操，即是纤纤弱质，亦足为鬼雄而无惭，虽存在于乌何有之乡，又焉可不大书特书，而予以表彰呢。①

老作家一片丹心，光明磊落，到头来却长期受辱，蒙冤而死。他在临终之前，带着深重的痛苦和悲愤对他儿子说：“我冤哪！”“有人害我啊！”②他没有说出害他的是谁，他怕连累亲人。因为害他的正是权势盖世、手操生杀予夺大权、随时可以制人于死命的康生和江青。

田汉和《谢瑶环》

1963年开始的批判“封资修”的矛头，首先指向戏剧界，而首当其冲的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田汉。1963年11月，毛泽东两次批评“《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同年12月，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把“戏剧”列在被批评的首位。他指责的“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其中就包括对田汉的批评。

① 孟超：《试读丹青涂鬼雄》，昆剧《李慧娘》，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118—119页。

② 孟健：《写在〈李慧娘〉再版的时候》，1979年3月13日《光明日报》。

1963年底至1964年1月，田汉参加华东现代题材话剧会演，遭到大会东道主的冷遇，大会主席团、宴会主宾席上都没有他的座位，柯庆施在会上大讲“写十三年”，指责建国十三年来戏剧工作“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而且还借口“上海有人说抗战以前即三十年代电影、话剧好得很”，便大加发挥，说20年代30年代文艺的方向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到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解决。他用抬高毛泽东的《讲话》来贬低30年代。田汉在会演结束之前悄然离开上海，他愤而写了一首长诗《江南——你中国话剧的摇篮》^①，以中国现代话剧运动的光荣历史，回击柯庆施等人对“五四”以来中国革命话剧运动的否定。他写道：

——

江户移来的春柳，
首先是结根在美丽的江南，
汤姆叔在烈火中的呼号，
推助了中国革命的波澜，
从王钟声的热情洋溢，
到陆镜若的经营惨淡，
舞台上革命家的面貌，
成了当时人们学习的典范。
江南——你中国话剧的摇篮！

^① 《田汉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0页。

二

五四运动的话剧队伍，
也首先集结在江南，
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
为民族民主革命而奋战，
与广大革命人民建立了联系，
与国民党反动派结成了仇怨，
从宗暉牺牲在雨花台下，
到战士们前仆后继战斗在城市和民间，
江南——你留下革命话剧的无数伤痕！

.....

诗中的王钟声、陆镜若和宗暉是早期话剧团体春阳社、春柳社和南国社的成员，他们都是革命志士，王钟声在辛亥革命时被袁世凯的亲信杀害，宗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春柳社成立于日本江户，曾演出司吐夫人的《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大叔的小屋》），其中的主角即汤姆叔。中国现代话剧运动一开始就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紧密相连。

田汉离开上海到苏州。1月27日，他在司徒庙见到著名的清、奇、古、怪四棵古柏，历经风霜摧残，仍然萌发新枝，充满生机，因作《无题》诗一首^①：

断裂腰身剥薄皮，
新枝依旧翠云垂。

① 《田汉诗选》第352页。

司徒庙里精忠柏，

暴雨飘风总不移。

田汉触景生情，借咏精忠古柏表达自己对党的忠诚和对柯庆施一伙否定革命话剧历史的愤慨。

1964年6月5日开始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康生、江青排挤、打击田汉已凶相毕露。当时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二个批示”已下达，江青召集演剧人员讲话，造谣说全国2800多个戏曲剧团，演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话剧团演的也是“名”、“洋”、“古”，都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她质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吃人民的饭，不为人民服务，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康生为大会作总结报告，说北京剧协14年来没有一点成绩，倒出现了象《李慧娘》、《谢瑶环》这样的坏戏，公然指名批判田汉。

京剧《谢瑶环》是田汉于1961年创作的。当时党中央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克服官僚主义，要学“海瑞精神”，不要学“霸王别姬”。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田汉把陕西地方剧碗碗腔《女巡按》改编为京剧《谢瑶环》。

《女巡按》讲的是谢瑶环女扮男装，察访民情，诛杀不法分子而遭到迫害的故事。它是否定武则天的，以喜剧形式结尾。田汉改编的《谢瑶环》则以悲剧结尾，它肯定武则天，而对地有所批评。

谢瑶环原是武则天手下的一个女官，是乡村教师的女

儿。她目睹豪门贵戚兼并土地，忧虑百姓颠沛流离，希望皇帝制止豪强，严明刑法，抚慰黎民，安定社稷。武则天封她为右御史台，改名谢仲举，巡抚江南，察民吏善恶，观风俗得失，查问疾苦，赈济饥贫。谢瑶环带着武则天的上方宝剑，到了苏州。这时，天官尚书（梁王）武三思（武则天的内侄）的儿子武宏和御史中丞来俊臣的异父同母弟弟蔡少炳，依仗父兄权势，横行三吴，抢占民女，侵夺民田，使失地百姓流离失所，民怨沸腾。谢瑶环敢作敢为，不怕权奸恶少，将蔡少炳斩首，武宏重责40大棍，命他限期把侵占的田地、房屋退还原主。

武宏等诬告谢瑶环“私通太湖匪寇”。武三思、来俊臣为子弟报仇，篡改武则天的旨意，骗取上方宝剑，率领禁军到江南，假传圣旨，将谢瑶环处死。等到武则天发觉自己受骗，御驾亲幸江南营救，已经晚了一步，只好斩了武宏，免去武三思天官尚书之职，为谢瑶环平反昭雪。

京剧《谢瑶环》主要写谢瑶环敢于同豪门贵族作斗争，写谢瑶环深入民间，敢于为民请命，为民除奸，最后以身殉职。剧中的武则天有这样几句唱词：

百尺天枢新建就，铁柱铜盘颂大周。只是各地官民多密奏，一家欢乐万家愁。太宗的言语说得透，要提防“载舟之水也覆舟”。

意思是说，在洛阳建造的“大德天枢”已经落成，大周的天下虽已巩固，但还要注意安抚百姓，警惕“翻舟”的危险。作者田汉借武则天之口讲李世民的治国之道，是讲历史上这

两位封建统治者懂得人心向背的道理。这里的舟比喻国家政权，水比喻人民百姓。水能载舟，政权靠百姓来维护；水也能覆舟，搞得不好，把政权推翻的，也是平民百姓。所以执政者要重视人民的力量，照顾人民的利益，正确解决舟和水的关系——政权和人民的关系。

戏中还写了一个有正义感的风流倜傥的青年书生袁行健，疾恶如仇，仗义执言，很得谢瑶环的赏识。谢瑶环被害后，他请谢瑶环的侍女转告武则天，请圣上“开张视听，采纳忠言，使百姓有击壤之乐，无涂炭之苦。若再宠信奸佞，残害忠良，只怕天下从此多事了。”

如果我们把《谢瑶环》当作历史故事来看，以史为鉴，本来是有益无害的。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谢瑶环》被打成了“反党大毒草”。认为田汉以古讽今，借历史故事诽谤现实，发泄他对社会主义的强烈不满。说田汉引用唐太宗的名言“载舟之水也覆舟”是“要煽动我们的劳动人民起来造共产党的反，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那武三思、来俊臣是影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的子弟瞎胡闹，就是影射我们高级干部放纵子弟瞎胡闹。谢瑶环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实际是田汉自己代表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向共产党“请命”。当时有篇文章批判田汉的“覆舟之感”，作者写道：

人们就不禁要问，正当全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号召下，高举三面红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战胜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把社会主义

革命的车轮不断推向前进的时候，为什么在你的脑子里却忽然产生了“覆舟”之感呢？显然在田汉同志的心目中，他感到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已经变成和人民对立，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因而人民就要起来推翻这个政权了！他笔下的……武则天的政权，正是对社会主义现实的影射和攻击。……总之，人民活不下去了，无产阶级政权要完蛋了，“载舟之水要翻舟”，当时的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正是这样叫喊的^①。

于是田汉被打成“反党作家”，“文革”期间，又被加上“反鲁迅”和“叛徒”的罪名，屈死在监狱里。

当年的批判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田汉不仅是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而且是我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的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他创作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革命歌词和《文成公主》、《关汉卿》等优秀戏剧。1947年3月，当田汉50岁生日和创作生涯30周年的时候，郭沫若曾写了一首祝辞，说田汉肝胆照人，贫贱难移，人民之所爱戴，魍魉之所畏惹，莎士比亚转生，关马郑白难比^②。文章传海内，桃李遍天涯。可是，一位毕生献身于革命事业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竟然给加上“反党作家”的罪名，真理何在？正义何在！

^① 云松：《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1966年2月1日《人民日报》。

^② 参见廖沫沙：《暴雨飘风总不移》，《田汉诗选·序》第2页；这里的“关马郑白”，指元代戏曲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

我们党内有些人，神经是何等的脆弱。“载舟之水也覆舟”，连封建帝王都懂得这个道理，而我们共产党居然怕听别人讲这个道理。“三面红旗”的失误导致三年经济困难，我们竟那么讳莫如深，怕有识之士的忠言刺到了痛处。即使武宏、蔡少炳之类有某些影射之嫌，也用不着“对号入座”，火冒三丈。“八旗子弟”的教训，不是周恩来曾经多次提出的告诫吗？

《谢瑶环》中的那个书生袁行健劝谏武则天，“如果再宠信奸佞，残害忠良，只怕天下从此多事了。”这些话，对于党的领导人来说，是逆耳之言。可是历史的不幸，竟被这位杰出戏剧家所言中。林彪、康生、江青等，不就是被宠信的奸佞之辈吗？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陈毅以及许许多多以身许国、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不就是被残害的忠良吗？结果天下不是多事了吗？对于残害忠良的奸佞之辈来说，正因为田汉的言词戳到了他们的心窝，所以他们不让田汉这样的一片忠心、才华盖世的老作家活在世上。否定了这样的革命文化的先驱者，也就为否定“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田汉在历史剧《关汉卿》中，曾写下如下壮烈的诗句：

将碧血，写忠烈，

作厉鬼，除逆贼，

这血儿啊！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

长与英雄共魂魄！

这充满豪情壮志的悲愤诗句，既是对伟大戏剧家关汉卿

的歌颂，也是自己胸怀的抒发。

《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及其他

1964年7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文艺的“第二个批示”，大会结束时，康生在总结报告中，不仅诬陷昆曲《李慧娘》、京剧《谢瑶环》是坏戏，还污蔑电影《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是大毒草。7月底，中宣部写了《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说：“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使这些修正主义的材料公之于众”。从此，全国展开了对一批电影的批判。

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应当严肃认真地来评论影片〈北国江南〉》。文章认为这部影片在怎样反映时代精神、怎样正确反映阶级斗争、怎样塑造正面人物、怎样对待中间人物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上，都有严重错误。接着，全国各主要报刊都开始了对《北国江南》的批判。有几家报纸，还辟设了讨论专栏，《文汇报》就是其中的一家。该报的“关于电影《北国江南》的讨论”专栏，从8月初至9月初，一个月内就发表了几十篇批判文章。

影片《北国江南》，阳翰笙编剧，沈浮导演，于1963年摄制完成。该片描写的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改造自然，把千里塞外变成江南的故事。影片塑造

了两个并无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但忠厚朴实的共产党员——吴大成和银花。（银花有眼病，终幕之前，她的眼病治好了。）这部很朴素的影片遭到了急风暴雨般的批判。批判者认为：一，它以阶级调和观点，歪曲和抹煞了现阶段农村的阶级斗争（说影片中看不见“阶级斗争的红线”）；二，它是“中间人物”的标本；三，它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典型；四，必须严肃批判该片的错误，以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腐朽思想的遗毒。

一些文章突出该片在“政治倾向”上的错误。有的说，1963、1964年，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的两年，也是阶级斗争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尖锐搏斗的两年，只有摆到这个阶级斗争的总的背景下来观察，才能看清，这部影片的问世，是没落的资产阶级文艺观向战斗的无产阶级文艺观发起的一次挑战。有的说，影片编导者用资产阶级人性论、人情味和阶级调和论偷换了无产阶级党性的原则。影片“企图通过银花这些‘英雄’的形象来撼动人民的情感，毒化人民的思想，瓦解人民的斗志，从而达到使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目的。”^①有的文章竟把影片中生理上害眼病的银花，武断地说成政治上“瞎了眼的共产党”，是丑化和咒骂党的干部。

这些批判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作者阳翰笙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说：

^① 参见《文艺报》1964年第8、9期合刊：《〈北国江南〉讨论综合报道》。

……把现实主义当成修正主义来批；表现人的美好心灵和高尚情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文艺要通过塑造各种不同个性人物来表现生活，被说成歪曲现实；而表现人物的复杂内心矛盾和转变，又说是写中间人物；……这些文艺创作的基本理论原则，全部搞颠倒混乱了^①。

在批判《北国江南》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电影《早春二月》的批判。《文艺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都发表了许多批判文章。《文汇报》从9月17日起辟设“关于电影《早春二月》的讨论”专栏。《电影艺术》第4期也开辟专栏批判《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批判者质问“《早春二月》为什么阶级服务？”，“《早春二月》要把人们引到哪里去？”。

《早春二月》是谢铁骊根据“左联”著名作家柔石于1929年创作的中篇小说《二月》改编的。《二月》描写一个愤世嫉俗、又找不到出路的知识青年萧涧秋。如鲁迅所说，“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②萧涧秋来到一个江南小镇——芙蓉镇。在这里他同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陶岚相爱，又对一位在大革命中牺牲了丈夫的文嫂的艰难生活深表同情。小说描写了几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有官僚资产阶级的子弟钱正兴，有口头上信仰三民主义的方谋，有信仰教育救国的空想

^① 《阳翰笙电影剧本选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328页。

^② 《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第149页。

主义者陶慕侃。萧润秋和陶岚属于另一种知识分子。他们对现状非常不满，与旧的传统习惯格格不入，对资本主义、三民主义、教育救国一概怀疑，而自己又没有一种坚定的信仰，他们渴望着一种奋争，一种变革，却又孤单软弱；他们远离人民革命的洪流，没有找到一条真正的革命道路。小说反映了20年代（1926年左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彷徨。也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愤懑和对知识分子出路问题的思考。

电影《早春二月》基本上忠于原著。著名演员孙道临饰萧润秋，谢芳饰陶岚。影片以高水平的电影艺术将“左联”烈士的作品搬上银幕，它既是对30年代左翼文艺工作者的纪念，也使60年代的知识青年见识30年前的社会黑暗和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影片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但它却遭到比《北国江南》更为猛烈的批判，说它“是一部浸透了资产阶级思想毒汁的坏影片”，“是一株用五光十色的漂亮颜色装饰起来的毒草”，“是一部露骨地美化个人主义，歌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掩盖和调和阶级矛盾影片”，说“整个作品，从始至终，都贯串着一种虚伪的人道主义的旋律和色调”，等等。

同样，一些批判者把问题提到政治斗争的原则高度。有的文章问：“时至60年代的今天，正当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的时候，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明目张胆地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引导人们怀念旧人物、旧时代的影片呢？”作者自问自答道：15年来的斗争

生活告诉我们，每当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尖锐起来的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也必然会尖锐起来。《早春二月》的出现，是“文艺界某些人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在1962、1963年的一次恶性爆发”，是一些人企图“努力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影片“使广大的身受资产阶级压迫的劳动群众受到蒙蔽，从而起到了巩固和延长剥削制度、模糊阶级矛盾、调和阶级斗争的作用”^①。

随着批判电影《早春二月》，柔石的小说《二月》也被否定了。例如，说它所写的不过是三角恋爱的悲剧，它没有反映出20年代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萧涧秋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右翼分子；陶岚是个“极端利己主义者”，这样的人，在当时已经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力量；小说颂扬了个性解放的思想，是“一曲人道主义的赞歌”。所以，它的基本倾向是错误的。

很显然，上述对《早春二月》的批判和对《二月》的否定，使用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武器和“人性论”、“人道主义”、“人情味”等扼杀革命文艺的大棒。

其实小说和影片不是描写重大的政治斗争。它只是截取当时社会的一角，反映了20年代的社会风习和这个社会几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至于“人性”、“人情”、“人道主义”本来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并不矛盾

① 若湘：《透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早春二月〉》，《文艺报》1964年第8、9期合刊。

的。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宗教桎梏”。这种思潮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这种思潮为中国参加民主革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同样起过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五四”以后不少文学作品表现了这种思想倾向。柔石的《二月》也属于这样的作品。它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得到鲁迅的肯定。影片中萧涧秋对文嫂的同情和救援，表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在大革命中牺牲的老同学的遗孀的关怀。这种“人道主义”原是无可指责的。“个性解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强调个体人的价值，要求有独立的人格，反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束缚和奴隶主义。这种“个性解放”思想不仅在“五四”时期就是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都给参加反封建斗争的知识分子以鼓舞力量。

小说《二月》和电影《早春二月》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对它的是非得失进行讨论和评估是应该的，但以“阶级斗争”作武器予以棒杀，那就未免粗暴无理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早春二月》重新放映，许多从荒芜的文艺沙漠中走出来的青年人，惊奇的发现，原来在他们刚刚出世的时候，中国曾经有过这样优美的影片。他们询问前辈，当年为什么要批判这部影片？

作家李英儒在1979年说：

被打成毒草电影的《早春二月》，其主角萧涧秋和

他的女朋友陶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算是思想先进的人物。不能拿社会主义时代的眼光，去批判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其实，就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今天，有一部分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在内，他们在道德情操上，比起萧涧秋、陶岚们来，还差着一大截子哩①！

这几句平心静气的话，已足以说明当时对《早春二月》的批判是多么悖理和不公平。

1964年12月，江青把《林家铺子》、《不夜城》、《革命家庭》、《兵临城下》、《红日》等影片打成毒草，指令进行批判。

1965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苏南沅的《〈林家铺子〉是一个美化资产阶级的影片》，《文艺报》1965年第5期发表一组文章，其中有胡可的《电影〈林家铺子〉宣扬了什么？》（此文同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张天翼的《评〈林家铺子〉的改编》、孙茂林等的《不许美化资产阶级》。《文艺报》1956年第7期，发表了一组批判电影《不夜城》的文章，其中有管大同的《为什么必须批判电影〈不夜城〉》，以群的《宣传阶级投降主义的影片〈不夜城〉》。于是，全国各地的报刊也相继开始了对《林家铺子》和《不夜城》的批判。

所有批判文章的论点，总起来看，不外乎如下几条：

① 李英儒：《青山证今古，教诲铭心怀》，《解放军报》1979年2月22日。

关于《林家铺子》：一，美化资产阶级；二，掩盖阶级剥削，抹煞阶级矛盾；三，同社会主义唱反调；四，替资产阶级辩护，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为“和平演变”效劳。

关于《不夜城》：一，歪曲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二，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工人阶级，宣扬投降主义；三，给资本家贴金，在工人脸上抹灰，是一幅“合二而一”图。

对于两部影片的批判，同样提到政治原则的高度，认为《林家铺子》、《不夜城》的出现，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在文艺战线上的反映。有的文章说，茅盾的小说《林家铺子》原来就有重大缺点，它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用马列主义观点来分析当时的社会现象的。如果说在30年代茅盾的小说还有一定的社会意义，那末，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把它改编为电影，那无非就是要把我们在1957年那场阶级斗争中所得到的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或印象等一笔勾销，甚至翻了个儿。有的文章说，抛出这样的作品，是资产阶级要同无产阶级较量，要同无产阶级争夺年轻的一代人。

对于这两影片的批判，增加了新的方式，就是请工人阶级站出来说话。《文艺报》第6期刊登长辛店机车车辆厂职工批判《林家铺子》的文章：《世上没有这号资本家》、《天下乌鸦一般黑》、《改编者的目的是什么》《资产阶级的代言人》。6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市东城区工人俱乐部职工业余文艺组批判《不夜城》座谈会摘录：一，“没有斗争的五反斗争”，二，“‘和平长入’的和平改造”，三，

“是阶级斗争还是‘良心发现’”。这样，就增加了批判的群众性和攻击的威力。

如果放下“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万能的批判武器，以实事求是的历史的眼光来看，就显出这些批判思想贫乏，难以令人信服。

《林家铺子》是茅盾在30年代继长篇小说《子夜》和“农村三部曲”之后最成功的作品。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有定评的。《林家铺子》以1932年左右江浙一带的农村为背景，通过描写乡镇小商人的破产，表现了在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买办阶级重重盘剥下民不聊生的社会景象，“一二八”的战火，社会动乱，反动派的巧取豪夺，敲诈勒索，农村破产，农民生活极端困苦，商品没有销路。小说主人公——自私而又懦弱的林老板但求“得过且过”，终于因党部的绑票，局长逼嫁林小姐，弄得倾家荡产，“过不下去”，不得已把女儿许配给精明能干的店员寿生，自己离家出走。一些原想依靠林先生的“小有产者”，把自己仅有一点赖以活命的现钱，存放在林家铺子里，林家铺子倒闭，他们顷刻之间陷入哀告无门的悲惨境地。

这样一部描写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人民悲惨生活、暴露旧社会黑暗的小说，怎么能说是“有严重缺点”呢？夏衍把这部小说用电影艺术展现在观众面前，对比新旧社会，使人受到教育。为什么60年代就不能摄制反映旧社会生活的影片？难道新中国的青少年不应当了解中国的过去吗？如果说60年代就不能看30年代的文学作品，那么，一部

现代文学史岂不是多余的了。在作品中描写了中小商人的遭遇（事实上旧中国广大中小商人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压迫的），就认为是美化了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的辩护士、代言人，这不是神经过敏，就是强加于人。

《不夜城》描写50年代初开展的“五反”运动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在党的正确的“改造”政策的感召下，在强大的工人阶级的压力下，在全国浓烈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中，资本家张伯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许多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那种场景，许多人印象很深。影片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歌颂党的正确领导，欢呼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把这样一部影片打成大毒草，否定工商业改造的客观事实，岂不是歪曲历史，在共产党脸上抹黑吗？

到了1966年，批判的锋芒，指向更多影片。白刃、林农根据同名话剧改编的《兵临城下》，被认为是“美化敌人，同情敌人”，“勾销了武装斗争作用”，“违反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坏影片；林谷等编剧、谢晋导演的《舞台姐妹》，被认为是为30年代的文艺涂脂抹粉；夏衍根据陶承的《我的一家》改编，水华导演的《革命家庭》，被指责为“歪曲历史，歌颂王明路线”；根据吴强同名小说改编的《红日》，被说成是宣扬和平主义，自然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撒尼族优美的民间传说描写反抗恶势力压迫、赞美纯真爱情的影片《阿诗玛》，被江青污蔑为“宣传恋爱至上，美人征服世界”的大毒草。在“文革”中，美丽的优秀女主角杨丽坤遭

到人身侮辱和迫害而致精神分裂。《阿诗玛》长诗的重新修订者、这部影片的文学顾问、著名散文家、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被迫害致死。

江青一口气就枪毙了50多部影片。“文艺黑线专政”论一下子把建国17年中拍摄的绝大部分电影打成了毒草。以上所举的只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几部。

“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

从1964年起，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制造了不少冤案，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中间人物”论。

继1961年6月的故事片创作会议和1962年3月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之后，1962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通称“大连会议”）。会议由全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茅盾、周扬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与会的有8个省市的16位作家和评论家，其中有赵树理、周立波、康濯、李准、西戎、李束为、李满天、马加、韶华、方冰、刘澍德、侯金镜、陈笑雨、胡采等。这次座谈会针对1958年以来文艺创作题材越来越狭窄和片面强调写工农兵英雄人物等问题，研究文艺（尤其是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邵荃麟致开会词和总结发言。在谈到人物创造时，他提出了“写中间状态人物”的问题。他说：

最近几年，创造的人物绝大部分是先进人物，倔强的老头，生龙活虎的妇女，生气勃勃的青年。强调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英雄人物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人物的比较少。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往往集中在这些人物身上。我觉得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亭面糊这个人物给我印象很深，他们肯定是会进步的，但又有旧的东西。毛主席也说，要写各种各样的人物，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这样就更丰富了，写得更丰富更深刻。只有把人物放在矛盾斗争中，不然性格不突出……

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写英雄是树立典型，但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

很显然，邵荃麟提出写中间状态的人物，目的是为了开拓更宽广的创作道路，使文艺作品中的典型更丰富，更多样化。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伴随着政治、经济生活中过分强调人的主观因素和冲天干劲，忽视客观规律和现实可能性，在文艺创作中，也曾过份强调了革命浪漫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浮夸）的意义，忽视现实主义的重要性。针对这种情况，邵荃麟在会上提出使“现实主义深化”的问题。他的主要意见是：作家要写自己“所看见的、所感受的、所相信的”东西；同时，还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即通过形象和逻辑思维进

行艺术概括，从而使“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他认为思想内容的革命性要和生活的真实性相结合，缺乏真实性的革命性是不可靠的，浮泛的，甚至是虚伪的。批评当时创作中流行一种廉价的乐观主义、浮夸的浪漫主义。总之，他认为文艺创作的基本要求是真实地反映生活，革命浪漫主义要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

本着毛泽东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提倡讲真话、实行“三不主义”的精神和周恩来关于发扬艺术民主的指示，参加“大连会议”的这些著名作家和评论家们畅所欲言，充分谈论了几年来文艺创作情况，批评了一些作品中存在的浮夸、虚假等不良倾向，肯定了一些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些并非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

“大连会议”是在调整文化政策时期在文学创作方面抵制和克服“左”倾思潮的一次重要会议。邵荃麟的发言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但是事过两年，1964年，在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之后，在批判封资修的高潮中，《文艺报》首先发难批判“大连会议”和邵荃麟。

1964年10月《文艺报》第8、9期合刊发表编辑部的长篇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和《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10月31日《人民日报》用两个版的篇幅转载了这两篇文章。接着全国各主要报纸也相继转载，从而开始了对所谓“写中间人物”论和被认为是“写中间人物”的一些文学作品的大批判。

《文艺报》的文章采取了歪曲事实、无限上纲的手法。

“文革”以后，1979年8月，《文艺报》发表一篇《评大连会议和“中间人物”论》的文章，揭露1964年《文艺报》编辑部文章：一，“断章取义”，删去一些邵荃麟说过的话，强加一些根本没有的、与邵荃麟完全不相干的话；二，加给邵荃麟的几个所谓错误的“基本观点”是假想的，是凭空虚构的，因此，一系列批判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文艺报》文章是怎样歪曲事实的呢？

邵荃麟说，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很重要的”，在写英雄人物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文艺报》编辑部把“中间状态的人物”简化为“中间人物”，而且说这是一个“特殊概念”；又把“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篡改为“要大力描写‘中间人物’”，“要集中笔力‘写中间人物’”，“是要把‘写中间人物’推到文艺创作最主要、最中心的地位”，同“创造英雄人物的任务相抗衡”。这样，“就势必要把创造英雄人物的任务，从最主要、最中心的地位排挤下来”。这些话都是歪曲的，强加于人的。然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作出结论：“创造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这是无产阶级的主张”，“‘写中间人物’这是资产阶级的主张”。这两种主张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这就是“争论的焦点”。

编辑部文章还说邵荃麟等人把“我国工农群众的大多数”都说成是“中间人物”，即“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物”。这又是一个强加的罪名。邵荃麟曾经解释，所谓“中间状态的人物”就是人民群众中，尤其是农民群众中介乎好人与坏人之间，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之间，先进人物和落后人物之间的人，就是从落后人物向先进人物转变过程中的人物，他们身上有“旧的东西”——“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他们肯定是会进步的”。他还说“农民是两头小中间大”。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指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邵荃麟根本没有说过“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工农群众”这样的话，因为农民的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的，这个政治认识大家都是知道的，都是承认的，大连会议上也没有人说过与此相反的话。换句话说，邵荃麟说的“中间状态”、“两头小中间大”，仅仅是指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大多数农民中，从思想上的先进、中间、落后来看，是“两头小中间大”。而《文艺报》文章对此加以篡改，把思想上的“两头小中间大”歪曲为中间状态的大多数工农都是政治上“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人”。在虚构了这个政治罪名之后，文章便引申出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结论和提出一系列声色俱厉的质问：

照他看来，我国农民的大多数都是缺乏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的“中间人物”，……

按照这种看法，我们新中国就根本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是恢复到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我们的国家就要灭亡。

这种说法，难道不是对于我国伟大现实、伟大人民

的诽谤吗？

这不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场，又是甚么呢？

如果全面地实现了“写中间人物”的一套主张，在我们的文学书刊上，戏剧舞台上，电影银幕上，到处都是动摇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不革命或革命性不强的、不觉悟或觉悟程度很低的、满身都是“旧的东西”——“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和“阴暗心理”的人，那将我们的伟大时代、伟大人民歪曲成甚么样子？我们的文艺还配称为社会主义的文艺吗？

这一引申离开邵荃麟的原意岂止十万八千里！随意上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文艺报》编辑部文章还歪曲邵荃麟关于“革命现实主义”的意见，说邵荃麟提倡的现实主义，“是抽掉了革命性的现实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实主义”。这同样是一个政治性的批判，戴上了“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帽子。

毋须查证邵荃麟发言的全文，只要看一看经过《文艺报》编辑部摘编的材料，邵荃麟关于现实主义的意见是一清二楚的。邵荃麟说：

前几年有种理论，好象乎平凡凡就不够劲，这是一种偏见。首先要看艺术有没有感动人的东西。我看我们还是百花齐放，看扎根深不深，现实主义基础深不深。

总的看来（我们的创作）革命性都很强，而从反映

现实的深度、长期性、复杂性看来，感到不够；表现在人物创造上，比较单纯；单纯化反映在性格描写上，人与人的关系、斗争过程的描写上。这说明了我们的作品的革命性高，现实性不足。

现实主义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我们的创作应该向现实主义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出现实。

现实主义深化，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寻找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

这些意见有什么错误呢？但是《文艺报》编辑部文章硬说邵荃麟是企图用这一套理论来代替毛泽东所倡导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要抽掉我们文学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抽掉它的阶级性、战斗性和现实性，使它变成一种不革命或革命性稀薄的‘中间文学’，然后沿着资产阶级的斜坡滑下去，直到变成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文学而后已”。总之，编辑部文章写道：

我们同邵荃麟同志的争论，不是一般的文艺理论的争论，而是文艺上的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是大是大非之争。

明明是关于文艺创作问题的正确主张，被歪曲成政治上的反动。

《文艺报》编辑部的文章影响很大。它给批判“中间人

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定了政治批判的基调，后来各报刊上的批判文章都是沿着《文艺报》文章的调子展开的。诸如说“中间人物”论是“同英雄人物争地盘”；是“反对创造英雄人物的完美形象”；是要“按照这种‘中间人物’的精神面貌来改造我们文艺的精神面貌，改造我们广大劳动群众的精神面貌”；“是排斥社会主义文艺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作用，是同过去的资产阶级作品那样，以全部兴趣和同情去歌颂‘小人物’”；是“对工农兵群众的污蔑”；是“合二而一”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在文学理论上的表现；……所谓“现实主义深化”，就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复活”；主张“现实主义深化”，就是提倡“平平凡凡的现实主义”，它“不仅反对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也极力排斥革命的理想主义”，“这套似是而非的理论，不过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糟粕和现代修正主义‘写真实’的反动理论的大杂烩而已”，等等，等等。

到了“文革”期间，“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被列入文艺“黑八论”，继续进行批判，这次“大连会议”被诬为“反革命黑会”，许多赞同“写中间状态人物”的作家、评论家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遭到残酷迫害，邵荃麟含冤死于狱中，遗体没有下落。1979年9月20日在追悼邵荃麟的灵堂里悬挂着这样的挽联：

革命五十年，文坛称诤友，中间人物四字狱，竟致骸骨无存，天胡不仁……

周扬在悼词中肯定“大连会议”和邵荃麟的文艺主张“对于

促进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具有深远的意义”。

1980年召开第四次文代会时，康濯等著名作家回顾“大连会议”时说，那次会议经实践检验后，岂止并无错误，而且不仅当时就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即便在今天也仍然是有着针对性惊人酷似的现实意义的。

1964年《文艺报》编辑部文章批评赵树理“近几年来”“没有能够用饱满的革命热情描写出革命农民的精神面貌”。这是黑白颠倒。事实是赵树理在1958年以后，因为对“大跃进”、“共产风”把握不准，有怀疑，所以有意搁笔不写这一段生活；但在克服“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他努力追求并塑造了“实干家潘永福”和“套不住的手”那样一批扎实苦干的先进农民的形象，这正表现了赵树理坚持不事浮夸的党性原则和以饱满的热情忠实于革命现实主义的可贵品质。

从1964年开始直到“文革”期间，有一批较好的文艺作品，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西戎的《赖大嫂》、刘澍德的《归家》、李准的《李双双》、梁斌的《红旗谱》中的严志和、周立波《家乡巨变》中的亭面糊、柳青《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以及影片《北国江南》中的银花……都以“中间人物”的典型而遭到批判。

《文艺报》1964年第12期发表一份“资料”：《十五年来资产阶级是怎样反对创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摘编了“反革命分子”胡风、阿垅，“右派分子”艾青、陈企霞、冯雪峰、丁玲、秦兆阳、唐达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西彦、巴人等人的言论。20年之后回头来看，这些言论基本

上都是正确的。

所谓“创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社会主义文艺最主要、最中心的任务”，是同后来“四人帮”的“三突出”、“高大全”的文艺主张是一脉相承。如果按照当年批判“中间人物”的理论标准来要求，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时期的文艺作品几乎90%以上都应当否定。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物性格是复杂多样的，丑和美，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优点和缺点这些矛盾的素质往往同时并存于一个人身上。人物的思想是发展变化的，英雄人物、模范人物也有个成长过程，完美无缺的人物是没有的。蒋子龙的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里的主人公刘思佳，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刘思佳自我评价说：“我既不像你们想的那么坏，也不象油库领导说得那么好！我就是我，不好不坏，有好有坏。”如果说“写中间人物”就是资产阶级文艺，不用说蒋子龙的这部小说，新时期十年间创作的千万部文学作品都得打入十八重地狱，那还有什么文艺繁荣可言！

1964年在文艺理论方面的批判的另一个主要对象，就是周谷城的所谓时代精神“汇合”论。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批判文章。只要举出《红旗》杂志1964年第20期刊登的文文宣的《文艺理论阵地上的革命精神和反动精神的斗争——驳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同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把文艺观点问题提到政治思想上的“革命”和“反动”来批判，便可以看出粗暴作法一斑了。

《人民音乐》批判李凌的音乐创作思想，《中国青年

报》批判电影《天山上的红花》插曲《送行》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批判瞿白音的《创新独白》，说它是“电影界黑帮的反革命纲领”，……都是文艺理论方面粗暴批判的典型。

风摧棒打，百花寥落

优秀的戏剧、电影和正确的文艺理论遭到批判，文学作品——小说当然也不能幸免。

首先受到批判的是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的第一、二卷《三家巷》和《苦斗》。如《文艺报》1964年第10期《关于〈三家巷〉、〈苦斗〉的讨论综述》所介绍的，“许多工农兵读者和文艺工作者”“以昂扬的革命精神和鲜明的阶级观点，对这两本小说重新作了评价”，指出它们“没有真实地表现剧烈的阶级斗争”，“把三家巷的阶级矛盾作了完全违反时代精神的歪曲反映”，认为它们是“披了革命外衣”的“言情小说”，是在“革命历史”、“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烟幕下贩卖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毒素的坏作品；作者“宣扬了资产阶级的阶级调和思想和人生论的观点”，宣扬“恋爱至上”主义、个人主义幸福观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客观上帮了资产阶级同我们党争夺青年一代”。

1965年，舒群的短篇小说《在厂史以外》、陈翔鹤的历史小说《广陵散》和《陶渊明写〈挽歌〉》、康濯的短篇小

说《代理人》等相继受到批判。

批判者说，《在厂史以外》是一株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是作者“资产阶级阴暗心理的自我暴露”。你看这题目就很怪，好些厂矿写出了红色历史，而作者却要在红色厂史以外去另写一段，挖空心思去寻找阴暗的死角，大写先进人物的“悲剧”，给工人阶级的光辉历史抹上层黑灰^①。

陈翔鹤在“为谁唱挽歌？”“小说里充满着一种阴暗或凄凉的气氛，流露出一股仇视或幽怨的情绪”，作者“通过历史题材，用隐蔽曲折的方法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在反右派斗争取得伟大胜利之后和国家暂时困难时期，写出这样的作品，‘无非是替反革命、右派作家呼冤控诉而已，岂有他哉！’“对无产阶级送讽词，为右派及其他反动文人唱挽歌，除了暴露自己反动面目而外，政治上就一无所得了”^②。

《代理人》“把社会主义的老区农村写成了‘满天迷雾’，把贫下中农的革命力量说成是“星星之火”；“把革命干部和贫下中农写得懵懵懂懂、离心离德，把人民内部矛盾写成党的领导和农民群众的对立”；它是“‘现实主义深化’理论的新实践，‘揭露性文学’主张的再‘试步’”^③。

黄秋耘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颜母绝食》同样受到批判，说他步陈翔鹤的后尘，也是“明显的反党反社会

① 《文艺报》1965年第1期。

② 《文艺报》1965年第2期。

③ 《文艺报》1965年第8期。

主义的毒草”。

这些批判，除了挥舞“阶级”和“阶级斗争”棍棒、乱扣政治帽子之外，没有什么真实内容可言。

1965年过去，转眼就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强词夺理的批判，发展成为横扫一切的大风暴。1967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文艺战鼓》编辑部编了一本“大批判”资料。该书仅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列出6大罪状，分门别类加以批判。这本资料倒也“简明扼要”。只要看一看它的目录，便可见当年雾塞苍天，百花凋落的文坛景象。兹将该书目录抄录如下：

(一) 反党、反毛主席，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树碑立传

《刘志丹》(李建彤)

《六十年的变迁》(第二部) (李六如)

《保卫延安》(杜鹏程)

《青春之歌》(杨沫)

《小城春秋》(高云览)

《朝阳花》(马忆湘)

(二) 歌颂错误路线，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红旗谱》、《播火记》(梁斌)

《我的一家》(陶承)

《风雨桐江》(司马文森)

《晋阳秋》(慕湘)

(三) 歪曲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论、人性论、和平

主义

《三家巷》、《苦斗》（欧阳山）

《火种》（艾明之）

《大波》（共四部）（李劫人）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

《苦菜花》（冯德英）

《文明地狱》（石英）

《在茫茫的草原上》（玛拉沁夫）

《山乡风云录》（吴有恒）

《三月雪》（肖平）

《变天记》、《山河志》（张雷）

《普通劳动者》（王愿坚）

《我们播种爱情》（徐怀中）

《工作是美丽的》（陈学昭）

（四）歪曲和攻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上海的早晨》（周而复）

《在和平的日子里》（杜鹏程）

《乘风破浪》（草明）

《风雷》（陈登科）

《在田野上，前进！》（秦兆阳）

《香飘四季》（陈残云）

《金沙洲》（于逢）

《归家》（刘澍德）

《水向东流》（李满天）

《过渡》（沙汀）

《南行记续篇》（艾芜）

《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茹志鹃）

《勇往直前》（汉水）

（五）丑化工农兵形象，歌颂叛徒，美化阶级敌人

《红日》（吴强）

《暴风骤雨》（周立波）

《破晓记》（李晓明、韩安庆）

《桥隆飙》（曲波）

《屹立的群峰》（古立高）

《红路》（扎拉嘎胡）

《源泉》（丁秋生）

《清江壮歌》（马识途）

《辛酸地》（管桦）

《铁门里》（周立波）

《战斗到明天》（第一部）（白刃）

《长城烟尘》（柳杞）

《新四军的一个连》（胡考）

（六）大写所谓“中间人物”，反对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

《下乡集》（赵树理）

《三里湾》（赵树理）

《灵泉洞》（赵树理）

《丰产记》（西戎）

《李双双小传》（李准）

《山乡巨变》（周立波）

《东方红》（康濯）

《桥》（刘澍德）

《我的第一个上级》（马烽）

《高干大》（欧阳山）

以上6支毒箭，射及63部小说，55位作家。除了少数作品和作家以外，建国以来绝大部分优秀的文学作品和著名文学作家，都在扫荡之列。至于对“五四”以来（尤其是三十年代）的优秀作品的批判和否定还不包括在内。在新中国的文坛上如此“毒草丛生，群魔乱舞”，可见“文艺黑线专政”铁证如山。在十年浩劫中，这些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些作家都赶进了“牛棚”，有的伤、有的残，有的被迫害致死（如赵树理、周立波、陈翔鹤）。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字冤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例如，1979年6月7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举行报告会，宣传部长宣布，“四人帮”把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战斗的青春》、中篇小说《归家》等几十部作品，当作毒草批判，复查结果，没有一本是毒草；“文革”前17年上海拍摄的如《李双双》、《聂耳》、《舞台姐妹》、《红日》、《北国江南》、《不夜城》、《阿诗玛》等故事片和舞台艺术片240多部，经过复查，没有发现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影片。北京和各地出版的著名文学作品及拍摄的电影，情况基本上和上海相同。

四 哲学“罪案”

杨献珍怒斥主观唯心论

1964年，在哲学界，开展了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的所谓“合二而一”论的大批判。事实上，对杨献珍的批判，并不是1964年才开始的。

197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文章，题为《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①。文章说，建国以来，我国哲学战线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原则性的大斗争，即：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斗争，关于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斗争，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斗争。这三次大斗争都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由叛徒杨献珍一个一个挑起的。

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歪曲和捏造！

1953年，理论界讨论我国的经济基础时，杨献珍认为，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基础由5种经

^① 当时各省市主要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有的地方还出了小册子。

济成分组成。他不同意“单一经济基础论”——即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只有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杨献珍的意见被认为是“综合经济基础论”受到批判。1964年围攻“合二而一”时，有人算“老账”，认为“综合经济基础论”是“抹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是“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等等。

历史过去了35年，当人们回顾新中国走过的道路，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被确认以后，杨献珍当年关于以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多种成份构成经济基础的见解，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1958年前后，又发生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当时有人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说成是“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把它和“矛盾的同一性”混为一谈。杨献珍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同一性”和“矛盾的同一性”的“同一性”是根本不同的两种范畴。前者的“同一性”是“等同”的意思，把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就是存在，存在就是思维），所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哲学史上从来就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恩格斯和列宁对此有明确的论断。而“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着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既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矛盾的同一性”才是辩证法的命题。不应当把这两种不同的“同一性”混为一谈。

杨献珍写了《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一文阐述上述观点。文章送到康生手里，他开始没有表态。后来康生去

问毛泽东：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毛泽东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康生把这个意思告诉了杨献珍。杨献珍感到，原来争论的是思维和存在是不是同一的，现在问的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提法改变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与“思维和存在之间有同一性”，两者的意思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唯心主义的命题，把思维等同于存在，后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命题，即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解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不久，康生便制造谎言，他说：杨献珍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就是不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是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杨献珍的意思经过康生这么一歪曲，就成了反对毛泽东的了。毛泽东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杨献珍竟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这一歪曲经过康生之口散布出去，在理论界不胫而走，许多人就据此批判杨献珍。

不仅如此，不久之后，把理论上的争论同杨献珍对待“大跃进”的态度联系在一起，说杨献珍割裂了思维和存在的联系，把思想和存在绝对对立起来，其政治目的，就是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反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伟大作用。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杨献珍在1958年、1959年对“大跃进”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唯心主义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1958年“大跃进”，大刮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身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的杨献珍，深感这种忽视客观规律、不讲客观条件、过份夸大人的主观作用的主观唯心主义

的危害性。他联系实际大力宣传要学习唯物主义理论，要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作风，反对主观唯心主义。

1958年11月19日，他给中央党校新疆班和自然辩证法班讲课时，批评了“大跃进”中不顾客观规律的种种事实。例如，“有的地方提出一个县或几个县在两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首先实现共产主义”，“有的认为目前就应当消灭商品、货币”，“废除按劳分配的原则”，“实现全面供给制”^①。他说“大跃进”中一些人冲昏了头脑，说什么“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有一个合作社，计划在几年内抛出一个十万斤的‘卫星’上天”。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就认为主观能动作用是万能的，只要能够想到的，都能够做到”，“意志自由论讲精神创造世界，竟把精神的作用夸大到脱离物质的基础，精神可以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把能动作用变成神话了，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变成了孙悟空一样”。他说，“离开一定的物质基础空谈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是没有办法发挥的”^②。

1959年初，杨献珍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抨击更加尖锐。1958年秋季，鉴于“大跃进的形势”，中央决定中央党校不开课了，各教研室的教学干部和工作人员，分别下放到城市工厂和农村社队参加“大跃进”，在实践中学习。当时根据报纸报道，河南省号称“千斤省”，即全省平均亩产小麦一千斤，而且“样样工作都好，居全国第一”。党校哲学教研

^① 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第85页。

^② 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第98、99、103页。

室的同志就下放到河南省的四个县的社队参加劳动和学习。1959年1月，杨献珍到河南省看望哲学教研室的下放干部。他看到了省党代会的简报和与会代表的发言记录。其中有一个县委书记的发言，使他大为惊骇。该书记说：“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彩……”结论自然是，要搞“大跃进”，就必须虚报。下放干部向杨献珍汇报说，他们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和报纸上宣传的完全是两回事。某县城关公社，社员已经没有粮食吃了。报了千斤省的地方，怎么秋收过后不久就没有饭吃了呢！中央组织部的一位下放干部参加该县县委工作，他没有办法，只好叫老百姓把红薯藤晒干，磨成面，做糊糊喝，聊以充饥。这就是大跃进年代号称“全国第一”的先进省的人民生活的真实情况。杨献珍对这种虚报作风深感不安，甚至愤慨。

同年6月12日，河南省委党校参观团和抚顺市委党校校长访问中央党校，杨献珍接见了他们，并同他们作了一番真诚的谈话。在谈话中，他尖锐地批评了大跃进中各地弄虚作假的各种恶劣作风。他的中心意思是，我们办党校，应当给学员多讲一些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道理，反对唯心主义。他列举自己在河南省耳闻目睹的许多事实，想以此引以为戒。不料这个参观团回去以后，就把杨献珍的谈话整理打印出来，到处散发。有几处得到此件，都向康生告发。

还有，同年7月29日，杨献珍同中宣部政治经济学习班的学员谈话中，批评一些地方的大跃进“现实主义百分之

一，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这话又被康生知道了。

根据这些情报，康生在庐山会议之后，立即布置中央党校党委会对杨献珍开展批判斗争。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一连批判了八、九个月。总的罪名是“反对三面红旗”，至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百分比，无疑是直接反对毛主席的了。

那么，杨献珍究竟是怎样“反对三面红旗”的呢？河南省委党校参观团整理打印的谈话记录，保存了历史的真面目。我们不妨摘引几段谈话内容，看一看这位老哲学家在唯心主义猖獗的年月里，是怎样坚持唯物主义原则的。

有的地方指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胆量等于产量，思想等于行动，这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弄虚作假总不能算作唯物主义吧！可是在去年，弄虚作假几乎成了“流行病”。河南的西平县某公社胡吹“小麦亩产7320斤”，有个科学刊物叫作《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一九五八年第四期上登了一篇题为《揭开了7320之谜》的文章，作者是陈炎理，好像是某公社的党委书记。他捏造了许多“根据”和“理由”，把虚构的“7320”说成是真的。我看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掩盖7320的谎言”，才比较切合实际。科学刊物发表这样的文章，到底科学不科学呢？还有这样一个生产队，为了虚报单产，放假卫星，就把几十亩水稻移栽在一亩专供参观用的水田里。白天晒死了，夜间再移栽新的。象这样的

卫星还是以不放为好。某地的三关庙乡，被称为“哲学之乡”，他们在大办钢铁时提出的口号是“超鞍钢，超美国，超苏联”。这个在近几年内要实现“三超”的思想基础，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①？

列宁说过，离开唯物主义是错误的，危险的，甚至是反动的。有些人把列宁的这些话忘记了。个别同志甚至拿着唯心主义当宝贝，说什么“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等等。现在应当好好地检查一下，到底是虚报能鼓足群众干劲呢？还是实报能鼓足群众干劲呢？虚报的结果搞得没饭吃，搞得群众脸都浮肿了，这叫群众脸上有光吗？……去年这一阵“浮夸风”，把我们党多年来培养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冲垮了，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这比丢在地里的粮食损失还大得多②。

钢铁、粮食都是硬东西，说假话办不到。钢是一吨一吨炼出来的，粮食是一颗一颗长出来的。孙悟空拔根毫毛一吹，要啥有啥，这本领已经失传了，没地方学。现在我们要的是真铁、真钢，不是要假“钢铁卫星”。社会主义不是靠吹牛得来的，而是靠一点一点用劳动建设起来的。不能虚报的受奖，说实话的插“黑旗”，要是这样的话，我看这种“黑旗”比弄虚作假的“红旗”

① 献杨珍：《我的哲学“罪案”》第113—114页。

② 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第114页。

还好得多①。

有些人的数字观念，好像是越大越好，搞密植是越密越好，定指标是越高越好②。

“共产风”，事实上是反共产主义风。以平均主义为核心的“共产风”，其本质是私有制的普遍化。这就是说，你有我也要有，人人都有一点。有的东西如果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就毁掉它，谁也不能占有。这是毁灭文明，倒退到原始社会的反动空想。去年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是自己的，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③

什么叫党性？列宁说：“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党性”。……去年有些人是有意弄虚作假，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说谎话，放假卫星，欺骗党和人民，还有什么党性？……我们党是靠唯物主义取得胜利的，什么时候搞唯心主义，什么时候就要碰钉子。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霉，全党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台，这是用人民和干部的鲜血换来的教训④。

这些铮铮言词，虽然尖利、刺耳，却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人民事业的无比忠诚，表现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私

①② 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第115、116页。

③ 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第117页。

④ 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第119—120页。

无畏的高贵品格。在浮夸成风、唯心主义盛行的大跃进年代，如此清醒地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如此猛烈地抨击弄虚作假坏作风的，能有几人？可是，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开始不久，中央党校党委会也开始对杨献珍的批判。康生说，杨献珍和彭德怀，一文一武，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一唱一和，反对“三面红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杨献珍被迫写了《向党低头认罪》的检讨书，才由康生批准停止批判，他的职务由中央党校校长降为副校长。

1962年初，中央党校党委按照中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检查了党校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一致同意给杨献珍平反。但是两年之后，1964年，康生又制造围剿杨献珍的“合二而一”问题的大冤案。

“合二而一”的由来

1962年2月，在遭受康生迫害的第二年，杨献珍到西北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他看到、听到大跃进中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在西北地区也普遍存在。他仍然坚持1959年的看法，认为这些歪风的思想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片面性。9月，他从西北归来。11月，他以《怎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为题，给党校学员作了长篇报告，强调要尊重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尊重辩证法反对片面性。他举例说：

快与慢，缓与急，劳与逸，苦战与休整，都是对立

的统一，就是说，对立的双方都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抓住一头，丢掉一头，就是片面性，就是破坏了对立的统一的规律，同时也就是违反自然规律的。

他还把形而上学和辩证法列为两个公式加以对比。

形而上学：在绝对不能相容的对立中思维。

是——是， 否——否。

休整——休整， 苦战——苦战。

联合——联合， 斗争——斗争。

辩证法：对立面的统一。

是——否， 否——是。

休整——苦战， 苦战——休整。

联合——斗争， 斗争——联合。

“不是冤家不聚头”，“又是冤家又聚头”。“冤家”就是指的对立，“聚头”就是指的统一。

他的讲话，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1962年11月11日，杨献珍给中央党校学员印发的一份资料《“是——是，否——否，是——否，否——是”是什么意思？》。在这份资料中，他第一次使用“合二而一”这个概念。他写道：“对立统一、一分为二、合二而一，是一个意思。”

1964年4月，杨献珍应中央党校新疆班学员和新疆工作人员的要求，讲了《尊重唯物论》和《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在后一个讲题中，他第一次讲述了“合二而一”问题。后来，他在其他文章和申诉书中多次讲到“合二而一”的由来和他对它的理解。他是这样讲述的：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其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就在这个地方列宁在括号中写到：“参看拉萨尔所著《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第三篇（《认识论》）。”其中，斐洛说：“因为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把它分为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从此我认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和“统一物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两种说法。

杨献珍从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引出了两种说法：“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和“统一物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他认为这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两种说法，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前者从“分”的方面讲，后者从“合”的方面讲。他又说：

对立统一规律既是一种普遍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种规律能在古代希腊的大思想家的头脑中得到了反映，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很多大思想家，难道这种规律不会在他们的头脑中反映出来吗？我想也一定会有的。但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头脑中是怎样反映的，怎样表达的呢？从此，在读书的时候，就留心探寻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过中国古代哲学史，但也喜欢翻看一点旧典籍。中国古书上合乎辩证法思想的地方不少，例如

① 转引自艾恒武：《关于“合二而一”的论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相反相成” “欲将取之，必先与之”等等，都是合乎辩证法思想的。但我还想找到在表达形式上也和“对立统一”相类似的说法。1961年夏……借阅了……《兰田县志》，偶尔在其中看到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说宋朝有一位思想家叫吕大临，著有《老子注》两卷，原书据说已经遗失。晁公武介绍这部书的内容，说大概的意思是：“盖以老聃之学，合有无谓之元，以为道所由出，盖至于命矣”，……这不正是“对立统一”思想吗①？

他又说：

在1963年，方以智的《东西均》出版……书中是讲矛盾的问题……只有两个正相反对互相对待的东西，才能构成一对矛盾，……《东西均》中提出了“合二而一”，我认为这个提法与斐洛说的“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是一样的意思。“合二而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于“对立统一”思想的简明表达法，它同“一分为二”都是表达“对立统一”思想的。在看《东西均》这本书时，我采取了“合二而一”的提法②。

这就是“合二而一”的由来。这个由来以及杨献珍对“合二而一”这个概念的理解和使用，都是一清二楚的。“合二而一”同“一分为二”、“二本于一”一样，都是对立统一的通俗表达，它既包括对立面的互相联结，也包括对立面

① 转引自艾恒武：《关于“合二而一”的论战》第6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的互相斗争，以及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他用具体事例说明“对立统一”的关系：

总之，对立面的统一，就是说，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必须在对立面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例如，必须在取和予的统一中去把握取，取时不要忘记予。要在购和留的统一中去把握购，购时不要忘记了留。讲长远利益时，不要忘记了当前利益。强调集体利益时，不要忘记了个人（社员）利益。强调政治挂帅时，不要忘记了物质鼓励。强调多快时，不要忘记了好省。强调产量时，不要忘记了质量。强调集中时，不要忘记了民主。强调大集体，不要忘记了小自由。强调高速度时，不要忘记了按比例发展。强调不断革命时，不要忘记了革命发展阶段论。如此等等，反之亦然^①。

需要指出的是，杨献珍的《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是针对当时干部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中的片面性讲的，所以他虽然也讲了对立面的斗争和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问题，但是他的重点是讲对立面的互相联结、不可分离地联系着这一方面的。例如他说：

事物本是由矛盾的两个侧面构成的，两条腿走路，而只抓住一个侧面不放，用一条腿走路——这就是片面性。……所谓统一，就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不可分地

^① 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第185—184页。

联系着的，而硬把它分开，只抓一面，这是人为的，是违反事物本性的^①。

学对立统一规律，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起来的本事。要经常记住事物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经常记住在对立面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

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实际工作中的片面性^②。

杨献珍针对实际工作中的片面性，着重讲对立面的“互相联结”，但它丝毫没有忽视或否定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的意思，更没有用“合二而一”去反对“一分为二”。他在1967年的申诉中反复声明：“我绝对没有想过要用‘合二而一’去与‘一分为二’相对抗，也不认为提出‘合二而一’，就是反对‘一分为二’。”^③“我在讲课时，主要还是讲对立统一规律，只是在解释什么叫‘对立统一’时，说中国古代思想家曾用‘合二而一’来表达‘对立统一’的思想，我没有单独地突出地去宣传‘合二而一’。”^④1979年他又说：“我没有把‘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对立起来过。我认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是关于‘对立统一’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表达方法。”^⑤但是，康生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仍然肆意歪曲杨献珍的原意，制造“合二而一”大冤案。

①② 引自艾恒武：《关于“合二而一”的论战》第17页。

③ 杨献珍：《我的哲学“罪案”》第303页。

④ 同上书，第307页。

⑤ 杨献珍：《关于“合二而一”的问题》，《哲学研究》1979年第5期。

康生玩弄阴谋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教师艾恒武、林青山听了杨献珍1961年11月的《怎样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报告和1964年4月讲的《在实际工作中尊重辩证法》，觉得杨献珍讲的观点很有新意。他们认为当时理论界对“一分为二”的宣传不够全面，导致的后果是只讲对立不讲统一，只讲斗争不讲团结，只讲分裂不讲合作。而杨老的讲法道理深刻，切中时弊，两人便合写了《“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提出“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时，既要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又要在对立中把握统一”。他们把文章交给本教研室辩证唯物主义组组长黎明，征求他的意见。黎明当时是《光明日报》“哲学”副刊的兼职编辑。他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把文章推荐给《光明日报》于5月29日发表。

《光明日报》将艾恒武、林青山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印出清样后，送了一份给康生。由康生掌握的，以关锋、吴传启等人组成的“反修哲学小组”也搞到一份清样。关锋说：“这可是一条大鱼，应当捉住，不能让它缩回去”^①康生和关锋密谋之后，立刻布置张恩慈写了题为《“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一文，以项晴的笔名在6月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

^① 参见艾恒武：《关于“合二而一”的论战》第27页。

当时，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康生利用开会之便，将艾、林的文章和项晴的文章交与江青，请她“送主席看”。据中央党校大事记记载：1964年6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常委会上指出：‘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号召展开对合二而一的批判”^①。这样，康生就有了“尚方宝剑”。他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欺上瞒下，耍弄阴谋。从1964年6月24日到9月23日3个月内，他先后9次亲自召开会议或用其他方式布置“战斗”，逐步把“合二而一”问题由学术讨论引到政治批判上来。据他后来（1966年11月5日）对他的亲信说：“1964年‘合二而一’的斗争，开始好象是学术斗争，我们有意识地搞一下，先引起大家讲话。以后点了杨献珍，提到政治方面了。这个斗争一来，杨献珍就垮了。”^②

首先点名批判杨献珍的，是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就“合二而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作者署名王中、郭佩衡。这篇文章是康生指使《人民日报》社起草，由康生主持，有艾思奇、范若愚等人参加的中央理论小组经过反复修改写成的，并借用王中、郭佩衡两人的名义发表。康生说：“在党报上公开批判一个中央委员不是随便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杨献珍在政治上的批判。”^③这篇

① 参见艾恒武：《关于“合二而一”的论战》第37页。

② 转引自范若愚：《“合二而一”批判由来》，《红旗》杂志1979年第10期。

③ 引自范若愚：《“合二而一”批判由来》，《红旗》杂志1979年第10期。

文章片面摘引杨献珍关于对立面互相联结的同一性的论述，断章取义，用同一性的命题偷换对立统一规律的命题，说杨献珍讲的“合二而一”就是“对立面不可分离的联系”，学习对立统一的目的，就是“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文章把“合二而一”篡改成为矛盾调和论。由于这篇文章的权威性，所以后来许多批判文章都是以《商榷》一文中被歪曲了的所谓“杨献珍同志的观点”为根据的。许多所谓“罪状”和政治帽子，都是根据这种经过篡改的理论，“逻辑地”推论出来的。

仅仅把“合二而一”搞成阶级调和论，还不能在政治上制杨献珍于死命。7月24日，康生指示，要把批判“合二而一”发展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去，发展到1959年杨献珍的讲话问题和1962年右倾翻案问题上去。换句话说，必须把杨献珍的思想说成是“一贯反动”，把理论上的批判同“反对三面红旗”、“右倾翻案”等政治问题挂上钩，才能把杨献珍整倒。

8月4日，在中央党校全体学工人员大会上，艾思奇介绍1953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论争、1958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争。他把这3次论争联系起来，说这中间“有个一贯的东西”，“始终是用形而上学反对辩证法，用矛盾调和论反对对立统一规律”。8月17日起，范若愚按照康生口授的提纲，用了3个半天的时间，向党校学工人员作报告，介绍“1959年——1960年高级党校党委内部对杨献珍同志的批判和1962年杨献珍同志的翻案问题”。报告说1959到1960

年对杨献珍的批判“不是过火了，而是不彻底”。这个报告从政治上、理论上、世界观上到个人品质作风上，全面否定杨献珍。报告的录音在北京市的17级以上的干部中播放。有的听报告人说，这个报告“是一次极其生动的阶级斗争课，对当前批判杨献珍同志的反动哲学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报告用铁的事实揭穿了杨献珍同志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丑恶面目。提高了政治嗅觉和阶级觉悟，认识了杨献珍反党反毛主席的反动本质”。①

1964年8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撒仁兴（关锋化名）的《“合二而一”是阶级调和论的哲学基础》。文章进一步篡改杨献珍的观点，诬蔑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是排斥矛盾斗争的哲学，抹杀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他说：“排斥矛盾斗争的‘合二而一’哲学，必然导向于阶级调和论；那些阶级调和、阶级合作的谬论，那些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归结到哲学世界观上来，无非是排斥矛盾斗争的‘合二而一’的哲学。”

为了把杨献珍从理论上驳倒、从政治上一棍子打死，康生、陈伯达决定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开展政治批判。这就是8月31日出刊的《红旗》第16期上以“本刊报道员”名义发表的《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

《红旗》报道员文章同样采取断章取义的手法，抽去杨献珍关于矛盾同一性的言论，抹杀杨献珍关于矛盾的斗争

① 以上内容参见艾恒武：《关于“合二而一”的论战》第46页。

性、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变化发展的论述，武断地说杨献珍主张矛盾调和，否认斗争。文章说：“在他这种‘合二而一’观点里，事物内部矛盾不见了，事物内部对立面的斗争不见了……旧事物要为新事物所代替，这些都不见了。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报道员”文章还进一步肯定“合二而一”和杨献珍“政治上的反动性”，说什么“‘合二而一’是系统的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是“同党唱对台戏”，而且把“合二而一”问题同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联系起来，说：

杨献珍同志在这时候大肆宣扬“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肆意歪曲对方的观点，然后任意上纲，进行粗暴的批判，同时依仗自己的政治特权，封住对方的嘴，使之无权答辩，从而置对方于死地。这就是康生的卑鄙手法。《红旗》的文章，基本上完成了康生等人要制造一场政治冤案的计划。

这场批判动员的面很广，参加的人很多，据《人民日报》国内资料组的统计，到1964年底，7个月内，各地主要报刊发表的文章就约有500篇左右，除了哲学界整个动员起来以外，还有很多工农兵的文章。许多地方的党校、高校、共青团和人民团体组织、人民公社、报刊编辑部还举行了座谈

会。

1965年中央党校校委会给党中央写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罗列了杨献珍的“十大错误”。这个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文件批发全党。杨献珍被撤销了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校委委员的职务，

到了“文革”期间，康生授意“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写了《“合二而一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哲学》一文，说什么“合二而一”论“在国际上是适应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颠覆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需要，在国内是适应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需要。它是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御用哲学，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动。”杨献珍本人则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坐了8年监狱，出狱后又过了8年流放生活。

“思想罪犯”知多少？

本来“合二而一”问题是学术讨论范围内的事情，但是康生玩弄卑鄙的阴谋手法，把它搞成了一场政治大冤案，全国上千人受到株连成了“思想罪犯”，遭到迫害。

“文革”一开始，“主犯”杨献珍被戴上“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大叛徒”等政治帽子，拉出来轮番批斗，搞“喷气式”，在烈日下罚跪，受种种折磨。1967年5月18日，杨献珍被囚禁，

9月，康生下令，将他正式逮捕入狱。这时，他已71岁了。

1975年5月19日出狱，整整过了8年监狱生活。他年近八旬，又被流放到陕西潼关3年。杨献珍在解放前因参加革命两次坐国民党的牢，也不过7年，他没有想到，一个正直的忠实的共产党员，因哲学思想问题成了“罪犯”，坐自己人建造的牢房竟达8年之久。

原中央党校党委委员、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因敬重和维护杨献珍，被迫害致死。

孙定国山东省牟平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抗日战争初期，在山西参加“牺盟会”，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太岳军区212旅旅长、太岳军区副司令员，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了战功。1948年到马列学院学习，后留校任职任教。他随着杨献珍多次挨整。1963年夏，他被调离中央党校去西安，康生指令他所在单位“内部控制使用”。1964年冬又奉命回北京接受批判。在批判会上，一些人污蔑他充当杨献珍的“忠实走狗，上窜下跳”，是杨献珍的“打手、干将”。有的学员骂他是“流氓、兵痞”，十恶不赦的大坏蛋。1964年12月19日，在中央党校全体学工人员大会上，陈伯达当众侮辱他，叫他站起来，用嘲弄的口气向全场人员介绍说，“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孙定国，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也以冒牌的哲学家自居了，他是紧跟杨献珍的”。陈伯达还诬蔑孙定国把他扔在纸篓里的练毛笔字的废纸偷出来，裱糊上，到处招摇撞骗。他唾骂孙定国是“大流氓，大坏蛋，大骗子”，“死不要脸”。孙定国无法容忍陈伯达和批判者

的如此侮辱，于当天夜里，留下遗书，抛下妻子和 5 个子女，冒着凛烈的寒风，跳入中央党校西南角的人工湖的冰窟窿里自杀了。

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也因“合二而一”问题被迫害致死。

黎明天津市人，1935年17岁参加“一二、九”运动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入党，在人民军队里，担任过政治教员、营副教导员等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党的干部教育和部队政治工作作出显著成绩。他在战斗中负过伤。1950年考入中央马列学院，毕业后留校，在教学和研究方面成绩显著。1964年，他对艾恒武、林青山的《“一分”与“合二而一”》一文提过几点修正意见，推荐它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并在课堂上顺便说到“合二而一问题，也可以研究嘛！”1964年8月24日、25日，在为炮制《红旗》“报导员”文章而召开的逼供“座谈会”上，黎明态度强硬，使康生一伙恼羞成怒。《红旗》“报导员”文章歪曲事实，黎明看了以后，非常气愤，他发表声明，表示抗议，他说，“为什么堂堂的一个党的权威刊物这样不实事求是”。因此他受到极严厉的批判，说他“反动气焰极其嚣张，竟敢对党刊发表声明！”并要他认清“今天的运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但黎明没有表示收回他的声明。他被定为“合二而一”论的“骨干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出中央党校，到河北省永清县农村劳动改造。“文革”发生后，他成了专政对象，被抄家、批斗、备受凌辱。1968

年5月，“清理阶级队伍”，黎明又一次挨整，他终于不能忍受非人的折磨，投井自杀了。这年他50岁。

当时中央党校被康生“引蛇出洞”的“策略”引出来的和在其他方面同杨献珍有牵连而被迫害的研究班学员、普通班学员、理论班学员和教工人员达154人之多。他们被定了各种各样的罪名：“合二而一”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双料“特务”……一律下放农村干校劳动改造，直到1975年1月。

艾恒武背上“反毛泽东思想的政治错误”的包袱，以“合二而一”论主犯之一的身份度过了15个年头。

“合二而一”论的另一个主犯林青山，1976年初被遣返吉林（他是吉林市人，被送到长春市），档案袋里装有上千页“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疯狂攻击三面红旗”的材料，没有一个单位肯收留他，最后在一个菜站上卖菜。

全国赞成或同情“合二而一”观点而受批判，被清洗的，不知其数。

1964年9月23日，康生亲自召开全国省市宣传部长、党校校长和报刊负责人会议。他说：“看看各省市写赞成‘合二而一’的是些什么人？从5月29日发表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以来，已经一百多天了。”他又说：“这次批判不是杨献珍个人的问题，包括的地区很广泛。从北京到穷乡僻壤，从首都到公社，没有一个省份没有这个问题的。范围从大学到小学，从文化界到工厂、商店，从党、政、民，一直

到军队。”①

一位知情的同志揭发说：

点名批判杨献珍同志开始后，报社每天收到许多来稿，每天将赞成“合二而一”观点的来稿，专门写一份书面材料，写明作者的地址、单位和文章题目。康生要将各省有同意“合二而一”观点的文章作者列出名单，交给各省……过了一段时间，有几个省就来信索取这些同志的文章，报社都照寄了，后来听说这些同志许多都挨批了。”②

社会上这些同志写稿子寄到报社，支持“合二而一”的论点，纯粹是学术问题。可是康生硬要报社和各地党政部门把这些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残害了许多无辜的同志，例如：

海军航空学校有一个教师，写了一篇关于“合二而一”的稿子，寄给一家报纸。这家报纸把它转回航空学校。这个教师就成了杨献珍的“孝子贤孙”，批斗了好几次，最后开除军籍，赶到农村。

广东有一个人写了同意“合二而一”的稿子，投到报社，报社给转回原单位，他成了“杨献珍的黑干将”，关了好多年。

江苏有一个五好战士，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

① 参见林青山：《康生外传》第224—225页。

② 转引自艾恒武：《关于“合二而一”的论战》第38页。

竟至被判刑处死^①。

杨献珍对一位访问记者说：

历史上有过株连十族^②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所谓十族就是指九族加上他的学生。而“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那些受株连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③。

这样大规模地围剿“思想罪犯”的事件，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杨献珍关于“合二而一”的观点不仅是十分明确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少文章指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都可以看作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达。矛盾调和是矛盾同一性的一种形式。有的矛盾双方的结局是一方战胜一方，或双方同归于尽。然而大量的矛盾其双方之间是协调一致的关系，双方互相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互相渗透，共同发展，其结局是互相接近，甚至有的可以融为一体。调和并不否认斗争，斗争也不绝对排斥调和。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缺一不可。可是1964年对杨献珍的批判，把“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对立起来，用“一分为二”取代“对立统一”，实际上只强调了对立，否定了统一；只能讲矛盾的对立和斗争，不能讲

^① 以上三个事例均见白夜：《访杨献珍》，《新闻战线》1980年第12期。

^② 见白夜：《访杨献珍》。

矛盾的统一和调和；只能讲“斗”，不能讲“和”；只能讲“分”，不能讲“合”；谁讲“不可分离地联系着”，讲“合”，谁就是提倡折中调和，就是宣扬投降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团结——批评——团结”变成了“斗、斗、斗”。“不斗则退，不斗则修”。这种“斗争哲学”就成了把阶级斗争绝对化和扩大化的“左”倾思想的哲学基础。

冯定的两本书

1964年9月，《红旗》杂志第17、18期合刊发表了《评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一文，11月，《红旗》第21、22期合刊又发表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评冯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一文。由此发难开始了对我国另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冯定的围攻。

冯定是我国理论战线上的一位老同志。他为传播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教育青年一代做了许多工作。《平凡的真理》是冯定几十年从事理论工作的心血结晶，该书从1955年出版以来，共印过11次，销行50万册。1957年11月出版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向青年们浅显而又透彻地讲述了必须自觉做人和应当怎样自觉做人的道理。此书发行不到两年，就重印7次，总印数达86万册。这两本书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发生过广泛的影响。但是，它们在1964年下半年，却一下子成了“宣扬修正主义的大毒草”。《红旗》的文章给《平凡的真理》扣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庸人哲

学”、“资产阶级哲学”等帽子；给《共产主义人生观》扣上“同赫鲁晓夫唱一个调子”、“宣传修正主义思想”等帽子，并严厉指责该书中对董存瑞、黄继光的英雄行为的论述是对革命英雄的“诬蔑”、“诽谤”。《红旗》编者加上按语，支持这种政治攻击，说“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全国各重要报纸和理论刊物除了转载《红旗》的文章，并纷纷批判冯定的这两本书。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从中央到地方发表了几百篇批判所谓冯定“修正主义观点”的文章。

这场批判完全是由康生和担任《红旗》总编辑的陈伯达一手制造的政治诬陷事件。

其实冯定的这两本书，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好书。它们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把哲学理论问题通过形象而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化成通俗易懂的道理；理论紧密结合实际，既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进行了思想教育。

《平凡的真理》由四篇组成。第一篇“真理和智慧”，主要讲述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头脑究竟是怎样认识外界事物的，侧重剖析认识的生理基础和社会基础。第二篇“真理和谬误”，扼要介绍了两种对立的认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第三篇“真理和规律”，扼要地说明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原因和结果、现象和本质、量变和质变、肯定和否定、偶然和必然、内因和外因等等）。这3个部分，作者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作了通俗而又科学的论述。第四篇“真理和实践”，讲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宇宙观在实

践中的运用，涉及学习、工作、斗争、领导、修养等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作者列举了许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极为平凡的事例来说明深刻的哲学道理。

就是这样一本好书，《红旗》杂志的文章却说它“是一本庸人的哲学，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哲学，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针锋相对的。它只讲个人‘趋利避害’，不讲阶级斗争和革命，它要人们放弃一切崇高的理想，只在个人生活上寻求满足。这本书是帮助资产阶级毒害青年的一本坏书。”批判者的这些话，都是颠倒是非、不顾事实的诬陷之词。本书以大部分篇幅讲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怎么能说是和马克思主义针锋相对呢？难道说只有讲“斗争”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本书中“人类改革社会是靠不断的斗争的”、“人生就是斗争”、“阶级斗争现在并未熄灭”等题目，讲的就是阶级斗争和革命。“修养首先就是克服个人主义”、“共产主义要求个人都能有全面的发展”等题目，讲的就是崇高理想和反对只顾“个人生活上寻求满足”的个人主义。本书要求青年具备各种知识，学习专业知识，提高认识能力，提高文化素质，讲求科学，抛弃荒诞、蒙昧的迷信思想，做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聪明智慧的共产主义者。它哪里是“放弃”崇高理想、只讲个人生活享受的坏书呢？批判者所要说的，不过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去实现理想”之类的空洞说教而已。

对《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的批判，同样是采取断章取义、任意歪曲、颠倒是非、无限上纲的卑劣手法。

例如，该书“群众观点”一节，讲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个人利益和大众利益的关系。作者首先批判了自私自利的人生准则，指出损人利己决不是共产主义道德而是剥削阶级道德；然后讲共产主义并不否认一己利益，也不否认个性。但“大众的利益高于一切”，“人生的大义和乐趣实在莫过于为群众谋利益”。所以，“当一己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那么就得了毫无条件来服从大众的利益”。在革命斗争中，一些革命者因为革命的需要“舍弃一己的利益”，“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写到这里，作者讲到董存瑞和黄继光的英雄行为。他说：

董存瑞和黄继光，在一瞬间是不可能将一己的利益和大众利益进行详细的比较、考虑和选择的，而可能只是一种正义的冲动；然而这种冲动，对先代的义士们、烈士们来说，正是平时深明大义或者说是认识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才能有的，对现代的我们来说，正是平时深明革命的意义和不断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人才能有的。

这一段话，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义士们、烈士们一瞬间的英雄行为，正是他们平时明白了“大众利益高于一切”这个道理的结果。但是，批判者却断章取义，故意只引前半句而不引后半句话，说冯定认为董存瑞、黄继光等烈士的英雄行为“只是一种正义的冲动”，以此作为证据，指责作者“诬蔑”和“诽谤”了革命英雄。

又如，冯定在“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一节中，根

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基本原理，指出“历史决不是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创造的”，“个人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起些个人的作用”。革命领袖是在群众的革命要求和革命行动中产生的，领袖的智慧和力量，正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而决不仅是个人的智慧和力量”。所以，“群众的领袖是群众的代表罢了”。领袖的作用固然是很大的，他的英明或者过错，“往往会促进或者推迟历史的发展”，但是领袖作用不管有多大，它“只能影响历史发展的迟速，而决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我们“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不应该将领袖神化”。

夸大个人作用的最大危害，就是在于广大的群众不知不觉忘记了自己的力量，阻止了群众的觉悟，抑制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因而也容易使领袖或少数的重大政治人物犯错误，引致严重的不良后果，……

如果将领袖神化，认为领袖当作个人是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认为依靠领袖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就可知道一切和创造一切，那么对伟大艰巨的社会主义事业同样是有危害的。

这些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论述，却被批判者诬蔑为“同赫鲁晓夫唱一个调子”，即“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把群众对领袖的爱戴，像赫鲁晓夫那样，说成是个人崇拜。”“文革”开始，给冯定扣上“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人们经过了十年内乱，亲身体会了个人崇拜、“将领袖神化”的“造神”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感到冯定在50年代末所

说的话，是多么亲切，多么正确，多么有远见。

又如，冯定在本书中说到在国内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如何处理国际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制度之间的关系时，他说，在中国，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之后，即用暴力手段解决对抗性矛盾、夺取政权之后，有可能用和平手段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国际关系上，我们主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制度之间的矛盾，用和平的方法，而不主张用战争的办法来解决。冯定这些意见是无可指责的。他说在中国特定的国情和特定的条件下，对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实行和平改造。至于国际问题，力求用和平办法解决，无非是说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我们反对战争。批判者却不顾本书的上下文，无视作者的本意，指责冯定“背离革命立场”，宣扬修正主义的“和平过渡”；硬说冯定不提革命的武装斗争，不提暴力革命，否认社会主义改造是激烈的阶级斗争，“是对中国历史的歪曲”。

掐头去尾，偷换概念，歪曲对方的原意，穿凿附会，强加罪名，然后进行粗暴批判。这是当时康生、陈伯达一伙制造冤案，打击陷害老一辈革命家所惯用的伎俩。

“文革”开始，康生和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和顾问身分到冯定任职的北京大学，在万人大会上给冯定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帽子，煽动群众对他进行批判。之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又把冯定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所谓“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挂上钩，给冯定加上“刘少奇的黑理论

家”、“吹鼓手”、“走资派”、“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罪名，横加迫害。可见，1964年开始的对冯定的批判，是康生、江青、陈伯达一伙蓄意打击迫害我国一批有名望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五 经史何辜？

刚直不阿的经济学家——孙冶方

1964年下半年，康生、陈伯达在围攻哲学家杨献珍、冯定的同时，开始围攻经济学家孙冶方，判定他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

这位所谓“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孙冶方本姓薛，和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是远房同宗兄弟。1924年，他16岁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10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毕业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当了3年政治经济学课的翻译（讲授该课的是列昂列节夫等苏联经济学家）。在苏期间，他遭受到王明宗派集团的排挤打击。1930年回国，在上海从事工运工作。不久，他应邀参加陈翰笙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的农村经济调查工作，结识了薛暮桥、钱俊瑞、骆耕漠、徐雪寒等人。1934年，他们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农村》杂志。他们通过实地调查，以大量确实资料论证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批驳托洛茨基派否定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谬论。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上海担任地下党文委书记。1941

年，他先去重庆，后辗转到苏北，找到新四军，被分配在华中局宣传部和党校工作。全国解放后，他在上海、华东担任经济管理工作。1954年调到北京，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57年后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代理所长和所长。

孙冶方在实际部门工作时，十分重视理论研究，在研究部门工作时，又十分注意联系实际。他经过长期的考察和研究，对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和我国经济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早有自己的看法。1956年，他写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和《从“总产值”谈起》等文章，明确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继续起着重要作用，反对把“价值、价值规律”、“商品经济”、“资本、利润”视为“资本主义概念”，“资产阶级观点”的错误观念。他指出社会主义生产要讲究经济效益，所谓“不惜工本是社会主义建设应有气魄”的说法是错误的^①。

1956年后，他看到许多部门不根据具体情况，片面强调“三线”基地建设，盲目地将沿海的企业迁到内地，打乱了原来的协作关系，破坏了原来基地的技术力量和生产能力。他说：“这种搬迁，是豆腐搬成个肉价钱，得不偿失，既失地利又违人和，是很不经济的！”

1958年“大跃进”，小高炉大炼钢铁，完全不计成本，他疑惑地问：“这是为了啥？”有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

^① 参见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5页。

国家，追求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只要有了钢，亏损或盈利都无关紧要。”孙冶方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偏见！社会主义绝不是不讲价值。忽视价值，是30年代苏联经济学中的自然经济论的流毒，这样干，不是把老本都要吃光嘛，不是坐吃山空嘛！”^①

1959年，他去农村调查，看到大办集体食堂弊病很多，浪费严重。很多人都看到了这种情况，只因为它是涉及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优越性的大问题，所以都缄默其口，不敢议论。但孙冶方不避忌讳，发表自己的看法。后来在他的支持下，经济研究所的同志根据调查材料向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撤销集体食堂。这个报告由他转呈中央。

1961年以后，他更是大声疾呼，要“为企业请命，为利润恢复名誉”。

1964年，当他被扣上鼓吹“修正主义利润挂帅”、“修正主义企业自治”的帽子遭到围攻时，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寸步不让，而且利用开“批判会”的时机，系统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例如，1964年8月10日，陈伯达在《红旗》编辑部召开北京和天津的部分经济学者关于再生产问题的座谈会。名为座谈会，实际上是专门批判孙冶方的经济学观点，特别是批判他所宣扬的资金利润率（即生产价格）的观点。孙冶方就利用答辩的机会，在会上作了“关于生产价格问题”的长篇发言，充分论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

^① 转引自鲍光前、林晰：《探索真理的人》，1980年7月23日《人民日报》。

需要生产价格，需要资金利润率”。他说：“越是有人反对我，我越是肯定”^①。他正气凛然地说：

我主张赤裸裸地交代自己的观点，想了什么，就说什么。我不管有的同志一讲到资金利润率，就说是修正主义观点（这样就无法讨论下去），也尽管人家在那儿给我敲警钟，提警告，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后也不准备检讨。但我要申明，我要的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要资本主义的^②。

对于批判他的人，他准备应战，准备反击。他理直气壮地说：

如果大家把我驳倒了，我坚决地、彻底地检讨，该戴什么帽子我自己戴^③。

说不服又批不倒，只好采用行政手段，撤销了他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随后把他下放到农村劳动。“文革”期间，更是动用专政手段，将他逮捕入狱。从1968年4月5日，到1975年4月10日，孙冶方因经济观点问题坐了7年监狱，受尽了折磨。出狱时，身体极度衰弱。但他一下车，就对接他的人说：“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当工宣队要他写个材料正确解决“三对待”（对待领导、对待群众、对待自己）问题，他挥笔写道：“个人恩怨我从不计较，理论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符合真理的观点一

①②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290、291页。

③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292页。

个也不放弃。”①

1976年，“四人帮”还在肆虐，国民经济濒临绝境。孙冶方忧国忧民，在一个风雨之夜，抄录了陆游的一首诗：

僵卧孤村不自哀，
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

他借爱国诗人的这首诗表达自己的忧思和仍然要横戈跃马为社会主义祖国战斗的决心。

孙冶方就是这样一位无私无畏、刚直不阿，为真理而献身的人。

是非是怎样被颠倒的？

明明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会成了“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呢？原因就在于孙冶方冲击并否定了传统的教条，在于他冒犯了某些所谓“理论家”的威权。

孙冶方“不唯书，不唯上”，他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同时，他深入考察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经过独立思考，形成一整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套经济理论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大相径庭的。

他认为，用最小消耗取得最大经济效益是社会主义经济

① 引自邓加荣：《有这样一位经济学家》，1980年2月24日《光明日报》。

的出发点。所以，他对于我国经济工作中不计成本、不讲经济效益的作法，最感痛心疾首。他从50年代起，就多次从经济管理体制上指出这种旧规章在实践中造成的严重危害。以机器设备的“大修理”为例，我国制度规定，所谓“大修理”就是不能改变设备原来的形态和基本性能，如果越出了这个范围，就不叫大修理而叫作“改建”或“基建”了。为了保证重点建设，基建投资是卡得很紧的。于是就出现了许多不合理的现象。例如，某船厂承修某主顾的几条大海船，其中有两条在修理中换掉了百分之八、九十的钢板和百分之五十的角铁，两条船的修理费几乎等于买一条新船。被修理的这种海船性能很差，时速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这种船在日本早就拆作废铁卖掉了，而船主却坚持要花大价钱修出一个崭新的老古董来，原因是财政规定只能作大修理处理，不能拆旧更新。1961年，他在上海调查，看到了更多的复制古董的事实。上海机床厂有一种1944年美国造的龙门刨，效率很低，3台顶不上我国济南机床厂的1台，而使用这种龙门刨所用的人工、场地、动力却要多花3倍。但是按照规定，这种美国龙门刨的折旧年限还有9年，还要经过两次大修理才能报废。孙冶方指出，使用这种“新的老机器”，不能不浪费更多的燃料、材料和劳动力。他说：“我们要避免这样的结局，就应该时时打算盘，随时算一算投资的效果”^①。

①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3—5、38—40页。

孙冶方认为，社会主义大生产不能靠主观意志，必须以价值规律为依据，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他认为把价值规律同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也是有悖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由于孙冶方强调价值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在1964年的激烈辩论中，一位批判者责问孙冶方：

“那么，你认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依据的是什么规律？”孙冶方脱口而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于是，这位批判者得意地嘲笑道：“嘻，恰恰相反，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起作用的偏偏不是价值规律，而是使用价值规律！”后来陈伯达、“四人帮”就把孙冶方的这句话当作修正主义“罪证”来批判。这句话虽然是在情绪激动时脱口而出的，但它符合孙冶方长期坚持的思想。所以，在14年之后，孙冶方仍然认为这句话没有什么错误。他以《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在1978年10月28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①。

孙冶方认为，流通是社会主义社会化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代谢过程，必须十分重视产品流通过程中各个环节对于生产的促进作用。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都忽视流通。这种“无流通论”是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宗法制经济以及革命战争年代实行物品供给制所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深刻地反映在苏联和我国的经济理论和实践

① 参见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371—376页。

中。从50年代起，孙冶方就批评我国经济生活中绝对平均、吃大锅饭，忽视竞争的自然经济论。

孙冶方认为，在按照生产价格定价的条件下，利润是反映企业技术水平高低和考核企业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指标。他大声疾呼“为利润恢复名誉”。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来说，这是最大的离经叛道。他在1956年的文章中，就反对把“资本、利润”看作是“资本主义观念”、“资产阶级观点”。1963年9月，他针对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的“自然经济论”，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的利润指标》一文，其中思想是：应该分清社会主义企业利润和资本主义企业利润的界线；反对用对待资本主义利润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主义企业利润；必须努力扭转亏损、增加利润，恢复社会主义利润指标的名誉。1978年8月，他写了《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一文，发表在《经济研究》1978年第9期上。他一贯主张，每一个企业都要通过技术革新和改善经营管理，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利润，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

孙冶方主张在统一计划下扩大企业的权限，实行企业的独立经济核算制，主张建立企业之间的供销合同制。他在1961年6月写了《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等文章中，论证财经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扩大企业的权限。

由于孙冶方向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全面挑战，所以他遭到教条主义者的全面攻击。同时，他的直言不讳的品格

和层次对经济建设中“左”倾错误的抨击，引起康生、陈伯达等阴谋家的忌恨。他们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把孙冶方打成了修正主义者。

孙冶方抨击了“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和集体食堂，他的言论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他没有接受“教训”。1961年，我国理论界已经把价值、利润、奖金、企业自治等当作修正主义的东西大肆批判，孙冶方仍然固执己见”。有一天，康生见到他，对他说：“听说你在经济学方面有许多新的观点，可以打份报告嘛，我负责给你转上去。”孙冶方本着共产党员的革命责任感和理论工作者的严肃态度，将他七、八年来观察到的问题和理论思考，写成了《关于全民所有制内部的财经制度问题》、《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以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研究报告”。当这些报告一份份打上去以后，康生就翻了脸，他恶狠狠地说：“小小的一个经济所长，竟敢鼓吹利润挂帅！”

1962年，陈伯达起草了一个关于财经工作的《报告（草案）》。8月22日，孙冶方写了一份书面意见，对这个《报告（草案）》中许多不妥当、不正确的提法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他指出《报告（草案）》不应当只强调生产是解决市场物价问题的关键，还应当着重讲讲整个流通环节对促进生产的重大作用；他指出“全国的货币发行量同商品供应量，特别是主要商品供应量相比还是过多”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货币发行量过多与否，不是相对于“商品供应量”

说的，而只能是相对于整个市场的商品流通量说的；他指出不应当把计划供应等同于凭证、凭票供应；不要把“集市贸易”叫作“自由市场”，因为“自由市场”这个概念含义不确切……陈伯达看了这些意见，装作虚怀若谷的样子，亲自召见孙冶方，表扬他的《意见》写得好。然而，正是这份意见书戳到了陈伯达这个伪君子的痛处，揭露了这个所谓“理论家”的经济学理论并不高明，因此，他怀恨在心^①。

1964年秋，在全国批资、批修的高潮中，康生、陈伯达根据孙冶方写的“研究报告”，判定他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说他鼓吹“修正主义利润挂帅”，修正主义企业自治”……，组织对他的批判。仅1964年下半年，就批判他39次。“文革”期间，“四人帮”又搞了两次对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大批判。给他戴了“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

是非被颠倒，真理被践踏！但是真金不怕火炼。历史证明，孙冶方是我国有远见卓识的经济学家，是有傲骨而无媚骨的知识分子的典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一向提倡和坚持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的利润和扩大企业权限，一切经济活动都要讲究经济效益、力求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这些经济理论和管理原则，被越来越多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和各种经济活动的理论依据。有的国家过去很

^① 参见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192页脚注。

重视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他们根据他的理论进行经济改革，国民经济发展很快。他们介绍经济改革的经验时说：“我们现在的经济管理体制，同孙冶方20多年前的主张是一样的。”^①

孙冶方在这本书的《前言》中说：“如果陈伯达不把我的文章当作〈批判材料〉在《内部未定稿》登出来，那么我的其它许多研究报告和未发表的文稿，也许都被销毁了”，“这正是所谓‘因祸得福’”^②。“批判材料”保存了历史“真迹”，它使我们从所谓“修正主义”的史料中窥见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崇高品格。

戚本禹的发迹

1963年底，在历史学界也开始了大批判，批判的急先锋是戚本禹。

戚本禹，祖籍山东威海市，1931年出生于上海。50年代初，他在中央团校学习时，被选派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给田家英当助手，做资料工作，后调中央办公厅来信来访办公室任科长。1961年，他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搞调查，给田家英写了一封关于调查研究成灾的信，田家英将此信转报毛泽东，毛泽东写了批语转发全党，戚本禹因此出名。1963年8月，他写了一篇《评李秀成自述》（发表在《历史研究》1963年

^① 参见鲍光前、林晰：《探索真理的人》1980年7月28日《人民日报》。

^② 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4页。

第4期上），“一鸣惊人”。

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的评价，历来存在着不同意见，多数人认为他是太平天国后期具有政治远见和卓越军事才能的著名将领。1856年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天国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859年，李秀成继洪仁玕、陈玉成之后，被封为忠王，成为独当一面、掌管太平天国军政大权的重要领导人。他六解京都之围，打破曾国藩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使曾国藩“心已用烂，胆已惊碎”，从而一度稳定了太平天国后期的战局。他乘胜东进，所向披靡，两次进军上海，多次把外国侵略者打得落花流水，望风而逃。天国形势危殆时，李秀成部署指挥了数十万兵力的天京解围战。在此失败后，他向天王提出了当时形势下最好的战略建议：“让城别走”，没有得到批准；他再提出广储粮饷，增兵驻守的要求，也没有被采纳。最后，只好以对天国的忠心，死守天京。天京陷落，他抛妻别母保护幼天王突围，把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自己骑劣马战斗，战败被俘。李秀成也有他的局限：对天王的“愚忠”思想，使他未能大胆执行“让城别走”的战略计划；他对那些动摇叛变分子，过于宽容，反而使太平军将士遭到杀害。他被俘后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下了几万字的“供词”——《自述》。《自述》主要记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历史和他本人参加天国革命活动的经过，反思天国的兴衰得失由来；同时，在字里行间，也有一些玷污自己，称颂曾氏兄弟的话。出于保民保军的目的，他向曾国藩提出收降遣散部众的“招降十要”——希望“恩赦”各省

之兵，对“南京城内不计是王是将，不计何处之人，求俸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其他行”。

综观李秀成一生言行，他忠于天国，同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天国革命作出卓越的贡献。被俘后，抱定以死殉国的决心，在曾国荃灭绝人性的锥刺刀割下，“血流如注”，他神情自若，昂然不动，最后赋诗慷慨就义。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牟世安、罗尔纲等，对李秀成及其《自述》，都持肯定的态度。

可是戚本禹不同凡响。他一出台，就摆出一副极左派的面孔，一棍子把李秀成打成太平天国的“叛徒”。他不顾李秀成的全部革命实践，只根据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一些话语，抓住李秀成《自述》中的某些词句，片面地加以曲解，以假说代替事实，一口咬定李秀成在被俘之后丧失了革命气节，背叛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说李秀成在《自述》中“美化敌人”，“丑化自己”，“夸大他跟天王之间的矛盾”；凭主观想像说李秀成一直对革命没有坚定信念，早有投降变节之心，临危时贪生怕死，“认贼作父”、“屈膝媚敌”；说李秀成《自述》“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因此，“不能让变节分子的‘自白书’继续彪炳于革命的史册”。

戚本禹全面否定李秀成，把李秀成骂得一无是处。他的文章一发表，就遭到了史学界的普遍反对。中宣部令各地报刊不要转载戚本禹的文章，并组织文章，予以驳斥。1963年冬和1964年上半年，报刊上开展了对李秀成问题的讨论，有

个别支持戚本禹，但多数是反对和批评戚本禹的观点。

戚本禹惶恐不安，正准备写检查时，江青召见了他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原来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根据戚本禹的文章的内容批示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江青还说，文章应当写下去，可找康生请教^①。在康生的指导下，戚本禹写了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在1964年8月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时戚本禹因人得势，有恃无恐。他再一次断定李秀成《自述》的“反动性质”，肯定李秀成“出卖祖国，向敌人招供”，向敌人“乞恩求活”，“准备去当统治阶级的鹰犬”，《自述》是他原有的投降变节思想的“合理产物”。他指责那些主张“一分为二”地评价李秀成的人，“不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历史人物，而是用革命的词藻来为变节分子进行粉饰。”

戚本禹在文章中提出了讨论李秀成问题的实质。他说：

问题实质不在于谁否定了李秀成的历史作用，问题实质、意见分歧的真正所在，乃是我们对李秀成的投降变节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他气势汹汹地说：“一个人变节了，却仍然可以得到人们这般的歌颂，难道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合理的吗？”他指责一些人“用虚假的色彩描绘了一个变节分子”，为了“替这个变节分子涂绘灵光圈，不惜歪曲事实，丑化其他领导人”。

① 黎澍：《评陈铁健著〈瞿秋白传〉》，《书林》1988年第6期。

他说：

于是，一个在革命危急关头经不起考验，背叛了自己祖国和自己阶级的懦夫，变成了“万古忠义”、“崇高伟大”的革命英烈；而坚持革命不屈，带头吃野菜度困难的革命领袖，却变成了执迷不悟、作恶多端的历史罪人。叛徒翻了案，好人栽了赃，忠变成了奸，奸变成了忠，没有了是非，没有了真理。我们不禁要向某些学者和文学艺术家们提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的不公平！？如果你们大肆宣扬李秀成投降变节的专门论著、教科书、画册、诗歌和戏剧，真的都变成了不允许更改的东西，那么，美化敌人和丑化革命还有什么错误？“曲线救国”和“保命哲学”还有什么不对？如果变节分子真的可以变成革命英雄，那么，革命还有什么光荣？叛徒还有什么可耻？

戚本禹极尽颠倒是非之能事！如果说，在1964年的时候，人们读着戚本禹的文章，还只是认为他狂妄自大，不可一世，或者隐约地感觉到他口气很大，可能来头不小，但并没有领会到他说这些话的真正用意和政治背景；那么，待到十年动乱开始以后，“打倒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口号响彻云霄，全国“抓叛徒”成风，特别是革命先烈瞿秋白和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成了“叛徒”，批判《多余的话》、批判“黑《修养》”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戚本禹这些话的真正份量：你们百般美化可耻的变节分子，为叛徒翻案，你们恶毒攻击伟大的“革命领袖”，忠奸颠倒，你们究竟用心何在？什么

“功过论”，什么“伪降说”，统统都是往叛徒脸上贴金！原来，戚本禹强调讨论李秀成问题的所谓“实质”，把学术问题升格为政治问题，是有着某种政治目的的。

戚本禹在文章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著名作家、戏剧家阳翰笙的话剧《李秀成之死》和欧阳予倩的话剧《忠王李秀成》。他说《李秀成之死》“竟然把一个在革命斗争严重关头投降变节的历史人物，当做完美的革命英雄加以歌颂”，而“天王洪秀全在话剧里变成一个昏庸鄙陋，倒行逆施，几乎无人不骂的对象”。话剧《忠王李秀成》也把李秀成当作一个伟大的革命英雄和坚持革命气节的典范进行歌颂，而把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写成了一个听信谗言、斥疏忠良、杀戮功臣的糊涂虫。

戚本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指名攻击阳翰笙等人呢？原来1964年6月，毛泽东写了关于文艺的“第二个批示”，8月，文艺界开始批判电影《早春二月》和阳翰笙的《北国江南》。戚本禹在历史论文中旁及文艺作品，是为了配合文艺界对“封资修”的批判。

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酝酿于抗日战争之前，脱稿于1937年8月，即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2个月。剧本描写了天京被围，危在旦夕时，李秀成率领军民浴血奋战直至壮烈牺牲的故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创作于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剧本集中描写李秀成在挽救天国的种种建议遭到洪秀全的否定之后决心与天京共存亡的悲壮故事。

这两位剧作家都是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对历史人

物进行了适当的虚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当前的抗日战争服务。两个话剧中所写的李秀成英勇机智，誓死效忠天国，全力捍卫天京，关心民众疾苦，爱护部下将士，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并不是美化变节分子；剧中描写后期洪秀全迷信上帝、昏暗固执、信用奸佞、听不进李秀成的正确建议，致使天国坐失良机，终于败亡。这些也完全是历史的真实，并不是恶毒攻击“带头吃野菜度困难的革命领袖”。

话剧《忠王李秀成》中的李秀成，在就义前，面对几个劝他投降的原太平军将领，说了一段慷慨激昂的话：

投降是最可耻的事，投降是最可耻的人；有志气、有德行、有骨头、有良心的汉子，是决不会在敌人面前投降的。天京破了，我们的事业没有败。开路的不怕吃尽苦中苦，成功的是我们的后人。看吧，不出五十年，我们的子孙辈就会举起大红旗，打进北京城去，赶走那些妖魔！你们是班什么东西！一个个昏了头，瞎了眼，死了心，掉了魂，无廉下耻，蛆一般的家伙，也配站在我面前说话吗①？

再看看历史上的李秀成在声讨叛降胜保的部将李昭寿的檄文《谕李昭寿》：

本主将自与尔共事以来，觉尔大有作为，将才不俗，故惜尔如珍宝，视尔如手足……竟不意尔乃反骨之

① 《欧阳子偕剧作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89—281页。

人，早知其如此，悔已迟矣。诚本主将目不识人……今已降妖，是人人得而诛之矣。本主将之前情尔既不念，而我与国诛妖之大义岂忘心乎？本主将誓必兴师问罪。情义既绝，各路之妖可缓诛，惟胜保与尔势必先诛也^①。

这篇檄文和话剧中的语词虽然不同，但两个李秀成那种大义凛然，对叛徒的愤激之情是一致的。

可见，两个话剧是歌颂了农民起义英雄，并没有美化变节分子。当然，两个话剧写于抗日战争时期，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上文所引的李秀成怒斥叛将的那段话，就是含有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意思。《李秀成之死》剧中的李秀成说：“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天下是中国人的天下，谁要想来抢占我们一尺一寸的江山，我们太平军就得把他们消灭个一干二净！”^②李秀成就义前高呼：“我们中华民族中最优秀的人物一定很快就会跟着我们来的。”^③这些话，也显然是借古人之口宣扬正义的抗日民族战争，激励人民的爱国主义热忱。戚本禹把阳翰笙、欧阳予倩两位作家在30年代、40年代写的历史剧，拿到60年代来批判，这难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吗？

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俨然成了对李秀成历史评价的最后裁决。如果说在此之前，各种不同意见还可以争鸣；从此之

① 转引自陶剑平：《评戚本禹〈评李自成自述〉》，《杭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②③ 《阳翰笙剧作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8页。

后，凡是不同意戚本禹的观点，为李秀成的英雄行为辩护的文章，一概不准发表。例如，作者李晴于1964年8月写了《怎样评价李秀成及其〈自述〉》一文，全面分析李秀成的功过，同戚本禹唱反调。这篇文章还未发表就被扼杀，而且被作为作者的“反革命罪行”材料之一，藏于档案中达10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与读者见面（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戚本禹因评李秀成投机成功，受到康生、陈伯达的青睐。1965年冬他写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1966年3月—5月，他点名批判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吴晗、邓拓，更是“一举成名”，以致不久成为显赫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两次“史学革命”

1958年和1966年，我国曾有过两次所谓“史学革命”。

1958年，在“大跃进”、“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历史学界开始了“史学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历史观”。

当时批判“厚古薄今”、“唯史料论”（“史料即史学”）等观点和烦琐考证的研究方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场“史学革命”有很大的片面性。1958年2月和5月，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陈伯达，利用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作报告的机会，借口贯彻

“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化方针，在史学界刮起了大搞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不正之风。用戚本禹的话来说，当时“史学战线上掀起了一场大破帝王将相主宰历史，大写劳动人民历史的轰轰烈烈的史学革命运动”，“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批判和改写全部历史”^①。在这场“革命”中，大破帝王将相，写历史只要写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不要写统治阶级内部的“狗咬狗”的斗争；大破王朝体系，把历史上的封建王朝的称号和王朝本身的历史从中国通史中削减或删除去；厚今薄古，变成了只要今，不要古；批判“唯史料论”，认为注重史料就是资产阶级观点，提倡“以论带史”；评价历史人物只有阶级斗争观点一种标准，一大批历史人物因为是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或者为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服务被全盘否定。这种“左”的片面性，给历史研究和教学造成很大混乱。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开始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等左的错误，史学界的著名人士也对“科学大跃进”中出现的偏差提出批评。

1959年3月，郭沫若以“答《新建设》杂志编辑部问”的方式，发表了《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就“打破王朝体系”、“史料、考据和历史学的关系”、“历史人物的评价”等问题，从正面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实际上

^① 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红旗》1966年第4期。

批评了各种左的偏向。例如他说：

旧时代的史书，是替帝王将相作家谱，那种编写方法，无疑是应该抛弃了。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应该打破封建王朝体系，这是对的。

但打破王朝体系，并不是要求把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抹掉。事实上既存在过朝代，如何能抹得掉呢？我们要打破的是旧的历史观点、封建正统观点、专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办法，而不是简单地把王朝抹掉。

他说：

从新的历史观出发，固然应该着重写劳动人民的活动，但以往的社会既是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活动也就不能不写。……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即使有时是狗咬狗，如果关系重大，也值得写。例如西晋的“八王之乱”完全是狗咬狗，但招致了“五胡乱华”，甚至南北朝好几百年的分裂，完全不提，那是不妥当的^①。

范文澜、翦伯赞等也先后发表文章或讲演，支持郭沫若的意见。翦伯赞的主要文章有：

《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先发表于《新建设》1959年3月号，后发表于1959年3月28日《光明日报》）。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红旗》杂志1959年第10期），

^① 《新建设》1959年第4期，《新华半月刊》1959年第8期。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1961年12月22日《光明日报》）

《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5月号）。

在这些文章中，他就史与论（史料与理论）、古与今、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全面的辩证的分析，批评了“大跃进”以来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中出现的各种偏向。

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翦伯赞认为，编写中国通史，不应该从中国历史上删掉王朝的称号。“作为一个史学家，我们有权打破王朝体系，但无权任意删去王朝的称号，因为前者是史学家的观点，而后者是历史事实。我们要打破的是以王朝为体系的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点，不是王朝的称号”^①。他列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常常使用王朝或国王的纪年，如“凯撒时代”、“七月王朝时代”、“路易十六世初期”、“乔治二世时代”、“拿破仑时代”以及“秦以前”、“周秦以来”等等来叙述事件的历史进程。

有一种主张认为既然打破王朝体系，就可以把帝王将相的活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以及传统视为十分重要的政治制度、政治沿革都予以删减，王朝的始末也可以不加叙述。总之，是一反前人之所为，过去轻视的，现在就重

^① 《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页。

视，过去多讲的，现在就少讲或不讲。翦伯赞说：“如果真是这样走极端，走偏锋，那就会替新中国通史带来极大的片面性。这不是辩证法，不是科学的态度。”^①

关于“厚今薄古”的口号，翦伯赞是十分赞同的。他指出，以往历史教学中厚古薄今的现象十分严重，有些高等院校在7门中国史必修课中有5门古代史，在11门选修课和加修课中，只有两门是近代现代史。但同时，他指出，强调“厚今薄古”却又出现了简单化、片面性倾向，把厚今薄古理解为“分量问题”或“先后问题”。有些高校过多地削减古代史在通史中的比重，个别学校削减30%；有些省市新编的初中历史课本，把一年讲完的古代史，压缩在一学期讲完，把厚今薄古理解为压缩古代史的分量。有些高校的历史课先教现代史，再教近代史，最后才教古代史，把厚今薄古当作先后问题。翦伯赞提出，厚今薄古，只是说要以更多的力量、更大的注意来加强近代现代史的研究，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好好地研究古代史。“略古详今是应该的，问题就是详略的程度，要有个限度。”先讲现代史，后讲古代史，这种讲法，是不妥当的。“因为通史的目的，是要使学生得到一种贯通古今的基本历史概念”，它要阐明从一个历史阶段过渡到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变革过程。“前一历史阶段中孕育着后一历史阶段的因素，在后一历史阶段中残存着前一历史阶段的断片，不了解前一历史阶段，对于后一历史阶段就无法

^① 《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27页。

说明”。①

他还反对把“古为今用”理解为古今类比，例如把古代农村公社和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类比，把明代在朝鲜进行的抗击倭寇的战争和解放后的抗美援朝类比，这些都是不对的。

在这些文章中，翦伯赞还对史料和史学、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人民群众和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等问题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刻分析。

郭沫若、翦伯赞等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中各种左的错误倾向的批评，同周恩来、陈毅对文艺创作、文艺评论中左倾错误的批评一样，都是调整党的文化政策的组成部分。但是郭沫若、翦伯赞等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党的政策的正确意见，显然触怒了陈伯达和一些坚持左倾错误的人。在他们看来，1958年史学界的左倾“是一个充满着朝气的史学革命，方向对，干劲足，成绩大。”而翦伯赞等“以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史学革命，……把刚开始不久的史学革命说得一无是处，……出现了一股反对史学革命的逆流”②。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批判“翻案风”、“黑暗风”。1963年起，关锋、戚本禹等就发表文章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史学观点。他们不敢冒犯郭沫若、范文澜，而把主要矛头指向坚决反对左倾错误的翦伯

①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33、34、55页。

② 戚本禹等：《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应当批判》，《红旗》1966年第4期。

赞。1963年夏天，关锋、林聿时的《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问题》（载《历史研究》第6期），不指名地批判翦伯赞“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对阶级观点作了不正确的理解”。

1965年12月，戚本禹在《红旗》第13期上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资产阶级的历史观”。文章虽然没有点名，但文中所引用的被批判的观点都是翦伯赞的。戚本禹一面攻击翦伯赞“反对马克思主义”，一面把陈伯达奉为“典范”，说他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一书，“写的是近代帝王将相中一个最反动的人物，由于作者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进行了研究，不仅写出了反动阶级代表人物活动的特点，而且通过一个反动人物，从一个方面写出了当时的历史真象”。

戚本禹这篇文章开始了第二次“史学革命”。它同1958年的“史学革命”一脉相承。对于这篇文章的反动实质，在它发表的18年之后，历史学家黎澍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黎澍说：

戚本禹的所谓“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就是历史学必须为眼前政治需要服务的更加穿凿和简单化的说法。在他看来，历史学仅仅跟在现实政策的后面，为它作一点注解已经远远不够了。还必须根据某种政治需要来改铸全部历史，把历史学直接变成他心目中的政治的一部分。只讲政治，不讲科学，以学术为手段进行政治斗争，使一些学术著作的价值随同他们在政治上的兴衰而

起落。这就是戚本禹的文章给予历史学的教训。他发表这篇文章的真正用意当然不在历史，而在政治^①。

黎澍又说：

戚本禹所“为”的“革命”无非是“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他的“史学革命”首先就是革了翦伯赞、吴晗、邓拓的命。但显然这还不是他的目的。他不是历史学家，甚至不懂什么历史，其所以装腔作势，发出这种“为革命”的叫嚣，无非是看准了风向，想充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窃国的先行，做一笔投机买卖罢了^②。

黎澍这番评论，彻底揭露了陈伯达、戚本禹等人鼓吹“史学革命”的真正用心。

翦伯赞被置于死地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吴晗进行政治陷害。第二天，该报记者访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翦伯赞。翦伯赞仗义执言，批评姚文元“粗暴”，“打棍子”，“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他说：“吴晗同志是反对蒋介石的，他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政治上没有问题。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

^{①②} 黎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①他还亲自两次主持北大历史系教师讨论姚文元的文章，实际上是对姚文元的声讨。

同年12月，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为公开批判翦伯赞揭开序幕。1966年3月，戚本禹、林杰、阎长贵3人合写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应当批判》一文，在《红旗》第4期和3月24日《人民日报》上同时发表，给翦伯赞扣上了“资产阶级史学的代表人物”的大帽子，还把他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两文，诬蔑为“两篇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

戚本禹等在文章中给翦伯赞强加了4大罪状：反对阶级观点，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大肆宣扬“让步政策”；还捎了两个罪名：反对“以论带史”，反对“古为今用”。这时候，“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揭开，翦伯赞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他只有挨打的资格，没有还手的权利，终于被戚本禹强加的罪状置于死地。

戚本禹等人使用了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歪曲捏造和恶意中伤等卑劣手法陷害翦伯赞。

他们加给翦伯赞的第一条罪状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相对抗”。

原来翦伯赞在1962年批评历史研究中的一种错误倾向，

^① 陈清泉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翦伯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下册第1558页。

不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是把阶级观点变成简单的公式，去生搬硬套。为了克服这种倾向，翦伯赞强调说，要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这个意见有什么错误呢？毛泽东说过，“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就是要求把历史当作一个发展变化的客观过程，观察任何事件和人物都要联系具体的历史条件，不要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这同阶级观点是并行不悖的，根本没有“把阶级观点排除在外”。

翦伯赞从来不反对阶级观点。他说，“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问题，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阶级性或党性在历史学上的表现。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对待任何历史问题，这是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基本要求。”^②不过，他反对把阶级观点简单化。例如，不管地主阶级处于上升阶段还是没落阶段，不加区别地同样加以反对，这样就会把全部中国古代史说成漆黑一团。他批评一些人对阶级观点的片面理解。他举例说：

也是为了站稳立场，讲历史上的矛盾，只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认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是狗咬狗，值不得一提。不仅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就是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也只讲革命的一面，不讲反革命的一面，甚至讲革命的一面，也只讲优点，不讲缺点，好像讲了反革命的一面，或者讲了革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9页。

② 《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93页。

命的一面的缺点，就会丧失立场。只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不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已经是一种片面；讲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又只讲革命的一面，讲革命的一面，又只讲优点，这就是片面之片面^①。

还有，在对待历史人物问题上，用阶级成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使得很多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人物都被否定。“很多古代文学家的名字便从文学史上消灭了，因为这些文学家有的是官僚地主，有的还是贵族、皇帝。”^②

可见，翦伯赞主张“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不是完全正确的吗？怎么能说是“反对阶级观点”呢？

第二条罪状是“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

戚本禹等人的根据是什么呢？原来翦伯赞针对当时在农民战争的研究上存在的非历史主义或把农民起义“现代化”的错误倾向，指出：

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

农民反对封建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

农民反对封建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③。

①② 《翦伯赞历史论文集》第97、98页。

③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翦伯赞历史论文集》第60页。

这三个结论不仅十分明确，而且十分精辟。这里所强调的是农民的“意识”，即主观认识。就是说，农民在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受苦的根源是封建制度，不可能认识到压迫自己的是整个地主阶级，不可能自觉地反对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那种政权制度。这不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吗？这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吗？而且翦伯赞在提出上述论点之后，紧接着作了明确的解释。他指出：“说农民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不等于说农民不反对封建制度、地主阶级，只是说他们是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反对的，或者说，农民所进行的反封建、反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是自发的，不是自觉的。”^①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不要说农民，就是工人阶级也不能科学地认识到自己受苦的社会根源。

对于农民战争的作用，翦伯赞是充分肯定的，他说：“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必须承认它对历史所起的推动作用。”^②至于各次农民战争所起作用的大小，要作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他还说：

“农民战争的领袖人物，应该肯定，但不要把他们理想化，现代化，以至把他们说得和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一

① 《对外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66页。

② 《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59页。

样。”^①这些见解不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吗？哪里是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呢？

第三条罪状是“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

原来翦伯赞说过这样的话：“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的劳动。秦始皇没有挑土，汉武帝没有筑堤，隋炀帝没有挖河，但是他们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组织者，不承认他们动员和组织工作的作用是不对的。”

这段话本来是说得明明白白的。戚本禹却质问道，我国历史上的长城、运河，“究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劳动人民的功劳，还是秦始皇、隋炀帝等创造的，是这些皇帝的功劳？”翦伯赞把这些巨大工程的功劳都记在秦始皇、隋炀帝的头上，这不是“吹捧帝王将相”吗？

其实翦伯赞的话，根本谈不上什么“吹捧”，他只不过举几个例子说明人民群众和个别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翦伯赞在1959年说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这就是前面已经说到的1958年有些历史教师企图打破王朝体系，主张把封建王朝的名称和帝王的名字从历史上抹掉。有的教师讲到秦始皇修长城、汉武帝治黄河、隋炀帝开运河的时候，既不提这些皇帝的名字，也不提这些王朝的名称，只说公元多少多少年，劳动人民如何如何。针对这些偏向，翦伯赞首先肯定这些巨大工程“都是当时劳动人民的劳动”，然后指出，也要承认那几个皇帝的动员和组织作用。既然这些巨大工程在历史上起了保护和促进生产的作用，因此在评论这些帝王的功

^①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41页。

过的时候，也要给他们记上一笔。这不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吗？怎么能是“美化和吹捧帝王将相”呢？

第四条罪状是翦伯赞鼓吹“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本小册子中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翦伯赞试图为这个论点作注释，在1951年2月，写了这样一段话：

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因而中国史上的每一个农民暴动或农民战争，可以说，都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前发展的里程碑。^①到了1961年，他又对此作了补充和修正，指出封建统治阶级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让不让，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②。

翦伯赞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试图

① 《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原载《学习》第3卷第10期，1951年2月；引自《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175页。

② 《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60页。

对毛泽东的论断作出科学的解释。然而戚本禹却以此攻击翦伯赞大肆宣扬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让步，为的是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而否定农民革命的历史作用。那么，戚本禹是怎样批判翦伯赞的呢？他说：

“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剥削和掠夺，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剥削和掠夺。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怎么能够设想地主阶级可以对农民阶级实行减轻压迫和剥削的“让步政策”呢？

这是一种偷换论题的战术。翦伯赞并没有否定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他只是说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有减轻的时候。戚本禹如果要驳倒翦伯赞的论点，就必须用事实证明封建统治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但是他却用“地主的本性必然要剥削农民”来反驳地主的剥削有可能减轻的论点，真是文不对题。

封建统治者当然没有制定一种政策叫“让步政策”。在翦伯赞的论著中也从未出现过“让步政策”这个词。他只是说了“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在讨论中，人们使用了“让步政策”这个词。“让步政策”本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说有，有人说无，在学术上可以各持己见。翦伯赞认为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制度，新的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而对农民有所让步，减轻一些剥削压迫，于是生产力因束缚减轻而得到发展。在这里，农民战争是原因，生产力的发展是结果，其中有一个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这样一个

中间环节。他既没有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也没有否定农民革命，而且正是为了科学地说明农民战争是怎样推动历史发展的。当时有不少人赞同翦伯赞的见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界重提“让步政策”，有人认为，让步政策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剥削阶级可以向被剥削阶级让步，无论在中国史上，外国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秦末、西汉末、隋末、元末、明末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起来的西汉、东汉、唐、明、清等封建王朝，都曾实行过让步政策，减轻赋税，抑制豪强，蠲免钱粮，兴修水利等。这些政策的实施，一般都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让步政策不是统治阶级的“仁政”，他们做的让步，不论或大或小，都是被迫的，是从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中接受教训，不得不让，以免重蹈覆辙。或者因为阶级矛盾尖锐，山雨欲来，革命风暴迫在眉睫，防患于未然，有些王朝的统治者实行某些改良措施（如王安石、居正的改革），用多少改善被压迫阶级的处境以维持其统治，这是镇压与欺骗两种统治手段中的一手。让步政策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农民战争的“间接作用”。所以让步政策一般应予肯定。

戚本禹拿不出象样的证据，只好强词夺理，以“鼓吹让步政策”诬蔑翦伯赞美化地主阶级，否定农民革命。

第五条罪状是主张“史料即史学”，反对“以论带史”。

说翦伯赞主张“史料即史学”，完全是胡言乱语。从1950年起，翦伯赞多次批评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就是“把史料堆积起来”的错误观点。1959年，他继续批判“史料即史

学”，同时也批评了忽视史料的倾向。当然，他没有忽视理论的重要性，指出“不用正确的理论来分析研究，史料等于废物”^①。

翦伯赞确实批评过“以论带史”的口号。那是1962年初。他首先肯定提出“以论带史”的口号意图用马克思主义统帅史料，反对“唯史料论”，所以它起过积极作用；然后指出这个口号有很大的片面性，它“意味着研究历史要从理论或概念出发，不从具体史实出发”^②，它使内容丰富多样、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干燥无味的教条。因此，他认为“以论带史”的提法必须废除，正确的提法应该是“观点与史料的统一”^③。

翦伯赞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偏向，强调的重点不同。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史学界迫切需要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他强调的是理论。1959年出现了忽视史料的倾向，所以他在批判“史料即史学”的错误观点时，强调了史料的重要性。1962年，有人把“以论带史”变成了“以论代史”，所以他主张废除“以论带史”，而代之以“观点与史料的统一”的提法。翦伯赞的意见是无可指责的。

第六条罪状是翦伯赞主张“为历史而历史”，反对“古为今用”（即历史研究为当前政治服务）。

成本禹强加的这一条罪状，也是歪曲事实。赞伯赞从未反

①② 《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46、84页。

③ 《史与论》，原题《关于史与论的结合问题》，载1962年2月14日《光明日报》，引自《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30页。

对“古为今用”，也不反对研究历史为政治服务。不过，他反对类比，反对影射。他说：

不要类比，历史的类比是很危险的。

不要影射，以古射今或以今射古。

不要附会^①。

早在1952年他就批评过这种倾向，即人们为了结合现实政治，常常把过去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作一种轻率的历史类比，甚至不科学地把他们等同起来。他说自己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特别是今天的现实与历史上的现实已经起了本质上的变革，把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同起来，那不是把历史上的现实现代化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②。

那么，古和今，历史和政治是什么关系呢？翦伯赞说：

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不是配合当前的每一个政治运动，政治上来一个什么运动，历史上就要塞进这个运动。……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也不是把古人古事都拉扯到现代，而是总结历史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过，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用这种经验的总结为政

① 《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73页。

② 《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原载《新建设》1952年9月号；引自《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7—8页。

治服务；而是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出历史发展的倾向，用规律性和倾向性的知识为政治服务①。

翦伯赞不愧为一位杰出的史学理论家。他的这些金玉良言，至今仍然是史学工作者的座右铭。多少年来在“为当前政治服务”的思想指导下，历史学被随意歪曲、篡改，失去了它应有的尊严和信誉；至于“四人帮”搞的“影射史学”更是声名狼藉。

戚本禹等人在1966年3月的文章中，诬陷翦伯赞向秦始皇等帝王将相“高唱赞歌”，“顶礼膜拜”。范文澜看了此文后，气愤地谴责戚本禹说：“翦老反对蒋介石，为什么害怕秦始皇？！这样的批判我就不服！”范老还在27日派人专程到翦家探望，表达他对翦老的关心和同情。②

戚本禹等人加给翦伯赞的种种罪名，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翦伯赞有反驳的权利，会把这些无端攻击、无耻诬陷批驳得体无完肤。不幸的是，1963年以后，翦伯赞被捆住了手脚，被剥夺了发言权，丧失了为自己申辩的权利，所以被戚本禹射来的密集毒箭置于死地。

1966年6月1日和3日，陈伯达控制的《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给翦伯赞强加了“史学界里的‘保皇党’”、“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大右派”、“反共老

① 《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93页。

② 《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505页。

手”、“蒋介石的走卒”等罪名，从此他长期遭受人间少有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和迫害，直到1968年12月18日夜和夫人戴淑婉一同含冤离世。

六 “教育革命”

两个“基本估计”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师生们反复背诵着这样一条“毛主席语录”：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条语录摘自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即著名的《五七指示》。《五七指示》谈的是军、工、农、学、商的学习问题，实际上是毛泽东为他的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描绘了一幅蓝图。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动机之一，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的社会。“教育革命”“是这场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①。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我们的学校，这是毛泽东在1964年前后对我国教育状况所作的一个基本估计。

1964年8月25日，他在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说：无论那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那里的教

^①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

授教员以及行政人员，过去都是国民党的，很少有我们的教授，很少有我们的教员，那些人都是替国民党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

同年9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团长和主要演员时说：胜利了，搞社会主义建设，搞了15年，我们文化界比不上你们，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界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也有不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界唱戏的、画画的、唱歌的都有，新闻界好一些，电影界也有。

同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接见古巴党政代表团时说，我国的文化界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服务。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啊！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

196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我们的学校”，这是一个“基本估计”。同这个估计相联系的，还有一个“基本估计”，就是毛泽东在1957年3月对我国知识分子状况所作的估计，他说：

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

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①。

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我们的学校，这就是所谓两个“基本估计”。后一个估计是以前一个估计为基础的。

“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来是指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但过后不久，在实际上，给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其中包括新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1958年批判“白专道路”、“拔白旗”，都同这一估计有直接关系。

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估计，在党中央主要领导成员中间意见显然不一致。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报告，就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毛泽东1957年8月的讲话，实际上否定了这个估计。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中国戏剧工作者座谈会（即“广州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是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队伍当中”，“就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在这次会议上，陈毅发表讲话，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9页。

称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他提出“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同年3月27日，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进一步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要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①。

1961年7月和9月制定的“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都指出了近几年来不少同志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强调必须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

既然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不属于资产阶级而属于劳动群众，那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的学校”这个基本估计也就不能成立。

但是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从1964年至1966年，多次指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着文教事业领导权，并且把它写进《五七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决定。1967年4月12日，江青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演说，更是危言耸听。她说：

……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战线上去，还不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

^①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5—307页。

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意识形态——文教战线这个东西，可厉害哪！

这十七年来，文艺方面，……大量的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几乎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所以我们在文学艺术界，培养出一些小“老艺人”；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要是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那谁改得了？攻也攻不动。

由此可见，发动“文化大革命”，进行“教育革命”，就是要“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①。1968年，“军宣队”、“工宣队”、“农宣队”开进学校，掌握教育领导大权。1971年4月至7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的《会议纪要》说，要建立一支“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的“无产阶级教师队伍”。“工农兵教师是三结合教师队伍的骨干力量。要采用多种形式广泛吸收工农兵参加教学活动；”“要从工厂、农村、部队选调一批工农兵和同工农兵结合较好的革命技术人员充实教师队伍”；“对原有教师队伍继续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

那么，“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结果怎么样呢？这支三结合的“无产阶级教师队伍”在哪里呢？十年

^①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

动乱中我国教育事业遭受的破坏已经作了明确的回答。

“读书越多就越蠢”

1964年2月13日，是甲辰年春节，毛泽东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故称“春节座谈会”），出席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林枫、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等16人。毛泽东就教育改革谈了许多意见。他说，“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要让学生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他认为“现在的考试方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入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①。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都很重要，切中时弊，教育工作者应该重视这些意见，切实进行教育改革。但是，他在论述缩短学制、精简课程的必要性时，却提出了“书要读，但不可多读”、“书读得越多就越蠢”的意见，并且列举了古今中外的许多人和事，来证明自己的意见。

他说，课程多害死人，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孔夫子只有6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了颜回、曾参、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353页。

荀子、孟子等大贤人。

他说，历来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不是状元，也不是进士、翰林。韩愈、柳宗元是进士，是二流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蒲松龄等都不是进士，曹雪芹和蒲松龄是清朝的拔贡。明朝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太祖，一个是成祖，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明成祖皇帝做得也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庆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皇帝就做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说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们都是只专不红，亡了国。……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他说，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下乡采药。祖冲之是自修的。孔夫子也没上过大学，出身贫穷，开始是吹鼓手，还作过会计，放过牛、羊，会弹琴、射箭、驾车子，还搞历史，学会了六艺。

他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书；富兰克林发现电，又是传记作家，是卖报出身；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是个工人，没有读过多少书。

类似的意见，毛泽东在1964年前后反反复复讲了很多。1964年6月24日他同王海蓉谈话时说，汉高祖写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诗写得很好，很有气魄，写诗的汉高祖就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能够写出这样好的诗来。

1965年1月27日，在接见外宾（苏班德里约）讲到军事院校问题时，毛泽东说，过去没有军事学校可好了，打了几十年仗就是没有军事学校。我们的军队90%以上是不识字和小学程度的。国民党尽办军事学校，什么陆军大学毕业，就是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兵打倒了他。他又说，蒋介石办的黄埔军校，两个月入伍训练，四个月学校毕业。蒋介石的军队主要就是这些人还比较能打，陆军大学毕业的实在不能打。他又说，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是革命斗争培养干部，战场就是学校。军事学校我不反对，可以办，但不要学的太长了，一读二、三年，太长了，几个月就行了。

1965年6月26日，他对医务人员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后学3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

同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说，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等等。

毛泽东反对繁琐哲学，反对脱离实际的死读书，反对死背硬记，做书呆子；他主张少而精，主张读书要联系实际，

多让学生自学，学会独立思考，主动地生动活泼地进行学习。他批评现在这种教育制度，“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① 这些意见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他批评繁琐哲学、批评死读书过了头，变成了对系统的课堂教学的否定，对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理论的轻视；变成了赞美文盲，欣赏不读书、不识字的人。现在不是孔夫子时代，也不是蒋介石办黄埔军校的时代。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现代社会关系错综纷繁。自然科学的分工日臻细密，社会科学分门别类也层出不穷，工业、农业、商品、军工生产，经济管理，国际交往都需要具备较高深的科学文化知识，不识字、没文化的文盲在古代可以当个好皇帝，在今天肯定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号召学生到农村去，固然可以熟悉社会，学到一些劳动技能，但是，他们只能是向比较落后的个体农民学习生产技术，而且学习方法是传统的直接经验的传授。

1958年“大跃进”时，搞过一场“教育革命”。当时毛泽东提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大中学校办工厂、办农场，学生走出校门，上山下乡，参加工农业生产，也叫半工半读。和整个“大跃进”运动一样，这场“教育革命”也存在浮夸风、瞎指挥和不切实际的错误。当年的

^① 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389页。

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22年之后的一次讲话中，讲到了1958年的教育革命问题，他说：

1958年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对不对？这个口号还是对的，我们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实行这种结合。可是提的时间不恰当，办法不对，没有详细规定具体办法，没有先在少数学校试验，然后推广。结果是全国一轰而起，实际上形成一个时期的停课。那年秋天，我到各省看一看，小学、中学、大学都不读书，上山去找铁、找煤、挖红薯……实际上把教育搞乱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有很大的责任。搞教育革命，也需要安定的环境，还要措施得当，一轰而起，有害无益^①。

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党的文化政策也随之调整。1961年9月，经中共中央讨论并决定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作了如下规定：

“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为了保证以教学为主，高等学校平均每学年应该有八个月以上的时间用于教学。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至一个半月。……生产劳动过多、科学研究过多、社会活动过多等妨碍和削弱教学工作的现象，应该纠正。”

“专业设置、教学方案、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要求稳定，不得轻易变动。”

^① 《在访问上海交通大学时陆定一同志谈教育、学习等问题》，原载1980年8月4日《光明日报》，8月6日《人民日报》转载。

“在教学中必须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必须克服轻视理论、轻视书本知识的错误观点。”

“切实加强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课程的教学”。

“切实加强基本技能训练”。

这些规定是总结了1958年“教育革命”的混乱状况而作出的，带有纠偏的性质。同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高教六十条”的指示，也指出1958年的教育工作的缺点之一，是“劳动过多，科学研究过多，社会活动过多，对课程的不适当的大合大改”，认为目前高校工作中应该着重解决的第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与此同时，教育部会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着手解决高校和中专的教材问题。从1961年2月至8月初，全国理工农医类高校530多个专业，有360多个专业统一选编了教材。4月11日至25日，中宣部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召开了全国高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以教学为主的方针，正确处理教材和教学中的论和史、古和今、中和外等关系，并拟订了中文、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教育、外语等7种专业和艺术院校7类专业的教学方案，以及224门课程和297种教材编选计划，其中文科126种、艺术171种^①。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会议上讲话，指出1958年以来在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说：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291页。

基本理论知识、基本历史知识以及基本技能的训练，在一些学校里就有所削弱。有些学校政治活动搞得太多，教学没有保证，教学的时间可以任意挤掉。学校停止教学搞政治运动，就等于工厂里停止生产搞政治运动。学校把教学，主要是课堂教学挤到了一个不重要的地位，有些学校甚至不敢提以教学为主，出现了“生产带教学”这么一些不妥当、不正确的口号^①。

同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中央认为，教材建设工作是促使高等学校教学秩序稳定和教学质量提高的重要环节之一。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项工作。

但是从1964年起，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少读书，书读得越多越愚蠢，这同“以教学为主”和选编大量教材是针锋相对的。从1964年起，学生参加“四清”、“五反”，接着“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闹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炼红心”，所谓“以教学为主”，稳定教学秩序，都成了空话。林彪、“四人帮”把注重课堂教学污蔑为“业务第一”、“智育第一”；把缩短学制、精简课程歪曲为“读书无用”；把“读书越多就越蠢”歪曲为“知识越多越反动”。他们憎恨文化科学知识，赞美愚昧，歌颂野蛮，造成了十年文化浩劫。

^①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法令选编》，北京师大教材第165页。

“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

毛泽东认为，书要读，但不要太多；读什么？主要读阶级斗争的书；怎么读？一面参加阶级斗争实践，一面读书。

1964年7月5日，他和侄儿毛远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作了一次长谈，后来毛远新追记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毛泽东问毛远新：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

毛远新答：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的。

毛泽东说：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

毛泽东问：你们学习马列主义是怎么学法？只听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重要的是要到实际中去学习。

毛远新说：工科和文科不一样，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

毛泽东说：不对，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我已和罗总长讲了这个问题。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都去，一个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对于你，不仅要去参加5个月的“四清”，而且还要去工厂搞上半年“五反”最好。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对社会谈不上什么了解。对社会

不了解，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呢？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

“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基本教育思想。

同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并指出，这次谈话，是极为重要的，对于培养革命接班人、推动高校师生自觉地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促进教育革命都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①。

本来，1961年调整文化教育政策，为总结“大跃进”期间“教育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制定的“高教六十条”，已经明确指出，近年来生产劳动过多，政治活动过多，规定今后学生每年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时间，理、工科占总学时的10%左右，文科一般占总学时的20%左右。周扬在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上的讲话，也就学校里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

政治是第一，并不一定政治理论、政治活动要搞得很多。学校里搞政治运动不能过多，过多就要妨碍业务学习。政治是统帅，帅不是兵，兵要多而帅只有一个；政治第一，不等于政治课时数第一。这两个概念要区别。……如果满口都是政治，都是世界观，这不是强调政治，强调世界观，而是把政治和世界观庸俗化了。四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370页。

门（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时间，包括时事政策报告和讨论在内，最好控制在全部学时的20%以下^①。

但是，根据毛泽东“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的指示，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高等学校文科要组织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知指出：

我国高等学校文科脱离实际的倾向十分严重，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相当普遍。有些单位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里，不少资产阶级专家正在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今后的方向，就是使文科院校附设工厂或者迁到农场，办成半工半读或者半耕半读的学校。使文科师生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通知规定，本年冬季开始，高等学校文科师生都应分批下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参加运动时间为一年或一年半^②。

据不完全统计，到1965年底，全国有395所高校22万师生参加了社教运动^③。这是1958年的“教育革命”的继续和发展。“高教六十条”规定的“以教学为主”的方针不但没有得到贯彻，反而受到了批判。

参加“四清”是一种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的方式。那

①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法令选编》，北京师大教材，第171页。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367页。

③ 同上，第378—379页。

么，在校内学习如何进行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的教育呢？1965年3月，《人民日报》介绍了长沙政治学校的经验，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摆在第一位；强调兴无灭资，改造思想；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三大民主，四好运动都落实好。《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指出这些经验，“为我们向解放军学习树立了一个好榜样，特别是为大中学校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全军学校、全国各级党校和大中学校，应该结合自己的学校情况，认真吸取长沙政治学校的经验，把学校办得更加革命化。从此以后，不少高等学校组织政治教员、政工干部到长沙政治学校去学习。

1966年6月，教育部党组向中央写了一个《关于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6月13日中共中央对这个报告作了这样的批示：

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不能再用。教育部应该积极组织力量，根据党和毛主席有关教育工作的指示，重新编辑中学各科教材。……小学语文、历史教材，问题也很多，教育部也应该组织力量着手重新编写和审查。……不论高小或初小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初小各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老三篇”，……①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401页。

教育部党组的请示报告中说，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并，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同时发动师生揭发批判原有教材。

这里说的虽然是关于中小学的教材，但它体现了彻底的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的思想。原来的语文、历史课教材不适用了，一切文化知识课都被取消了，语文和政治合并，全国几亿儿童用一本教材——《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实际上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贯彻在学校教育和教材之中。“文革”开始后，大中学生破“四旧”，“造反有理”，天天读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实际上卷入了一场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的大动乱。

两种教育制度

关于教育制度的改革，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有过一套完整的设想，就是“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

早在1958年“大跃进”年代，他就提出过这套设想，并且曾经试行过。

1958年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关于两种教育制度问题。他说：

“这个问题，我最近又想了一下，又有所发展，就是搞半工半读。我想，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

度和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就是说，不论在学校中、工厂中、机关中、农村中，都比较广泛地采用半工半读的办法。……中等技术学校更可以半工半读，某些大学也可以半工半读。可以有全部半工半读的大学，也可以在现有的大学里面办几个半工半读的班。……

现在农村已经大搞半工半读，农业中学就是半工半读学校。农业中学可以半日读书，半日种地，也可以一日读书，一日种地，还可以考虑半年种地，半年读书。

……

如此看来，乡村里面，城市里面，都可以搞半工半读。就是说，势必会有这么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在工厂中，也是两种主要的劳动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一种是四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其他还有夜校、业余学校、函授学校等等，……如果半工半读的制度能够普遍实行起来，那就可能解决很多问题，可以比较充分地满足许多人的升学要求，工厂里人多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劳动就业的人可以多些。这是采用群众路线，多快好省地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训练大量有文化的技术工人、技术

员、大学毕业生。这样两种主要的学校制度和劳动制度是不是可以在一些单位中试办，请各位同志考虑^①。

同年6月8日、20日，刘少奇又在两次会议上提出：“半工半读问题是从中国条件、中国特点提出的。中国特点是：人多、穷、生活水平低，要进行技术革命，人多劳动力够用。”“学校分两类：第一类是全日制学校，第二类是半工半读、业余学校，主要是半工半读”。“两类学校都算正规学校”。“这些都要规定为国家制度”^②。

此后，刘少奇在各地视察时多次讲到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问题。7月，在天津、山东提出，可以试办工厂招收青年学生的半工半读学校，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逐步做到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学校，半工半读，学生是工人，工人也是学生，农村也可以这样做。9月，在河北、河南提出，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贯彻这个制度最彻底的办法之一是把工厂和学校合起来办。10月，在安徽合肥工业大学提出：在教改中必须注意提高教育质量，现在大学要以读书为主，工厂和农场的学校则当以生产为主，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建设和教育事业。只有将来才可能使二者逐步接近，最后变成一样^③。

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和浮夸风、瞎指挥风的影响，1958年“教育革命”中各地一哄而起办的许多半工半读、半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23—326页。

^{②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223页。

农半读学校，到1959年以后，只有少数坚持下来。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的设想没有成为现实。

过了6年，1964年，教育制度的改革（“教育革命”）又一次提到日程上来，刘少奇又一次提出他的“两种教育制度”的方案。

1964年7、8月间，他在向中央各部和北京市党员干部作报告时，以及在天津、安徽、山东、湖北、广西等地视察时，多次讲到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问题。他说，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有一部分是结合的，既是劳动制度，又是教育制度，又是学校制度。从当前看，只实行一种学校制度，实行我们现在这种学校制度，是不能普及教育的，国家负担不起，家庭也负担不起。只有除开现在的全日制学校以外，再办那种半农半读或者半工半读的学校，既能普及教育，国家和家庭又能负担得起。从长远讲，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可以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培养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的新人。建议各省、市、自治区，每个大城市都着手试验、试办。至少要5年才能初步总结经验，10年才能总结比较成熟的经验，加以推广^①。他还在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会上说，全日制学校现在还是需要的，还得好好地办。等到半工半读的大、中、小学大量办起来，而且办好了以后，全日制学校就可以逐步缩小^②。

^① 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65—467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365—366页。

1964年下半年，全国农村半工半读的农业中学，中等农业技校迅速发展，各种形式（全天、半天、或早、午、晚间读书，其余时间劳动）的半农半读的中、小学普遍创办。1965年3月下旬至4月下旬，教育部召开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总结经验。刘少奇听取了教育部长的汇报，并讲了如下意见：

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都会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包括我们国家在内。问题是 如何防止。现在我们所想到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发动群众搞“四清”，一个是改革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我们办半工半读学校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搞半工半读，不能只搞小学、中学，还要办中等技术学校和大学。70%、50%的初、高中学生要升学，形势已经逼来了，所以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这样一个体系就非办起来不可。

从这年4月7日起，《人民日报》开辟专栏，开展“怎样办好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新型学校”的讨论。这一讨论到10月底结束，共出刊15期，发表了许多学生、家长、教师、教育行政干部的来信、文章以及各试办半工（农）半读学校的经验材料。

1965年10月25日至11月23日，教育部召开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会议指出，目前正在全国各地试办的城市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377页。

工半读学校,已经显示出它的优越性。会议期间,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听取教育会议汇报,并对实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进行了讨论。刘少奇在会上再一次阐述了他对两种教育制度意见。他说:“我们的国民教育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全日制;一种是业余教育;一种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他建议再补充一种“四四制”的形式——四小时工作、四小时读书,实行厂校结合,最好在新开工厂里试验。半工半读“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技术、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新型劳动者。我们的目标应该培养既能当干部、当技术员、当工程师的水平。但是也要当工人、农民”。“半工半读试验的重点是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我们办了半工半读高等学校这样才能衔接起来,逐步形成体系,才可以逐步定型”。他说,“我的意见,还是坚持5年试验,10年推广,不能动摇,发展不要太快。”^①

作为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对于我国人民的教育问题显然有过许多思考。从1957年到1965年,经过8年的调查研究、深思熟虑,他对“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思想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从1964年起,大中城市的一部分小城市,都办起了半工半读的中等学校,部分高等学校和工交、财贸、文教卫生等各行业,也都有了一批试点。北京地区58所高等学校中有33所进行了试点。江苏、安徽、福建、云南、广西、贵州、天津等省、市、自治区也试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388页。

办了半工（农）半读的高等学校。全国66所高等农业院校中，已试行半农半读的有37所，半农半读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15%。全国半工半读中等学校有4000余所，学生80余万人；307所中等农业学校中，实行半农半读的220所，半农半读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52%。

正当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先后召开会议讨论“两种教育制度”问题，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工业、农业各部也先后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和总结试验半工（农）半读学校的经验时，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现行的教育制度；对它表示怀疑；接着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两种教育制度的实施计划被打断了。刘少奇的设想没有实现。

在教育制度改革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有什么异同呢？

毛泽东也是极力主张半工半读的。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学校办工厂或农场进行生产劳动的意见。同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当一位同志谈到勤工俭学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半工半读；专读书就是最坏的，见书不见物，脱离实际，四体不勤。我们的方针是不要全读书，一定要又读书又劳动。同年8月13日，他在天津大学视察时说：“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学生要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①。9月，接见外宾时说，教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229页。

育方面，过去的制度要改变，主要办法是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面读书，一面做工。9月12日，他视察武汉大学时说：“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①1961年7月31日，他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写信，很赞赏江西的做法：大、中、小学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他说，这样的学校很好，各省都要派人到江西考察取经，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半工半读学校，如中央警卫团的警卫战士的文化班。

可见毛泽东是积极主张半工半读的。

从刘少奇方面说，他的“两种教育制度”的设想，也是本着毛泽东所倡导的“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也是出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

但是他们对于改革教育制度的意见又显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毛泽东有关论述“教育革命”的言论中，从来没有对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的设想表示过赞同或支持。相反，正当刘少奇全力进行两种教育制度试点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在1965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说：“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毛泽东对“两种教育制度”的设想至少有3个方面是不赞成的。

一、保留全日制学校问题。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把“整天都是读书”的全日制作作为一种“正规学校”，“规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231页。

定为国家制度”，他认为“全日制学校现在还是需要的，还得好好地办”，等到半工半读学校大量办起来，而且办好了，全日制才可逐步缩小。但是，毛泽东是反对这种全日制学校的，尤其是大学文科。如他所说，文科不改造不得了。如何改造呢？他说：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实际”。“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①。

他还说，大学如果是5年的话，在下面搞3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所以，他是主张废除现行的全日制学校的，至少要改变现行全日制学校的学制和教学方式。

二、半工半读学校培养的对象。学校教育的目的，毛泽东总的提法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刘少奇的提法是，半工半读“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技术、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新型劳动者”，即“培养到能当干部、当技术员、当工程师的水平，当然也要当工人、农民”。至于全日制，更是要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389页。

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了。

三、实行的步骤。刘少奇十分强调推行半工半读“步子要稳”。他明确主张“至少5年才能初步总结经验，扩大试验，10年以后推广”。中央其他领导人也赞同这个方针。1966年1月8日，中央书记处听取高教部部长蒋南翔关于全国半工（农）半读教育会议讨论情况的汇报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指出，发展半工（农）半读教育要谨慎一点，稳妥一点。文科改革，至少要经过两年的试点。总书记邓小平也指出，半工半读方向是肯定的，步子要适当。总之，一个原则，不能降低教育质量——科学技术水平。步子要稳点。其他的改革，都先搞试点，工科更要谨慎些^①。但是，毛泽东要求半工半读，步子显然要急躁得多。“文科不改不得了”，就是一个必须立即改革的信号。他认为阶级斗争是大学生的一门主课，他叫军事院校的师生今冬（1964年）明春全部下去“四清”，一个也不留。至于地方上的高等学校（尤其是文科）的师生更应当全部下农村，而且越早下去越好。

由于这些分歧，刘少奇的教育思想终于被宣判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遭到批判和否定。在“文革”中，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自消自灭。后来的上山下乡“再教育”，“五、七学校”、工农兵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都是神来之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390页。

笔，随意创造，是对文化科学知识的轻视，根本谈不上什么教育制度。

七 “文革”前奏

批判《海瑞罢官》，陷害吴晗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头，人们不了解这篇文章的来历，不理解这篇文章的历史作用，还以为是一般性的学术论文，是姚文元的个人之见。后来人们才明白，这篇文章非同凡响，它实际上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它是江青、张春桥等人，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合伙炮制的。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谈到此文的写作经过：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

《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这段话讲得很清楚，文章是江青到上海组织的，是毛泽东允许的，得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长柯庆施的支持，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合谋，由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执笔写作，对北京、对中央（包括周恩来）保密，从1965年初起，写了七、八个月，每次的修改稿由张春桥把它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到北京，与江青讨论修改意见。

《海瑞罢官》是文艺作品，而且是京剧；吴晗是历史学家，不是文学家，更不是戏剧家，搞文艺作品不是他的所长，对于京戏他更是外行。那么，他为什么要从史学界跑到戏剧界写起京剧来呢？原来他是应北京京剧团马连良等一些老朋友的约请，勉为其难来编写这个历史剧的。为了避免和其他海瑞戏重复，他选取了海瑞54岁那年，任应天巡抚7个月中所做的一件大事——除霸，即将霸占民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的退休官僚徐阶（曾任宰相）的儿子、恶霸徐瑛处死，同时，判处贪赃枉法的华亭知县王明友死刑、吴县知县萧岩“革职回家”，为受冤的民众平反。与此相关的，他迫使乡官（徐阶等退休官僚）退还强占的大量民田：“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田民产，如数归还。”戏里的海瑞唱道：

江南大害是乡官，

强占民田稼穡难，

冤狱重重要平反，

退田才能使民安。

戏中还提到“吴淞江水利正在兴修”，“条鞭良法也要推广”。整个戏主要是写海瑞为官清正廉洁，不为强暴所屈，为民除霸，为民兴利的一段事迹。

《海瑞罢官》几经修改，1961年初于北京工人俱乐部正式演出。同年，《北京文艺》1月号全文刊载了《海瑞罢官》剧本。《海瑞罢官》并不是吴晗的杰作。只因为历史学家动手写戏，这件事引起了史学界、文艺界的兴趣，报刊上为此展开了关于历史剧问题（如历史的真实和戏剧的真实）的讨论。吴晗的剧本成了引玉之砖。

这么一个并不著名的戏，却也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可是她不是出于学术上的兴趣，她是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1962年十中全会以后，江青插足文艺界，就想寻找一个反党乱国的突破口。她找到中宣部、文化部4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拒绝。1964年下半年，她又找到人民日报社的李希凡，请他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李希凡没有遵命。江青感到在北京“攻不开”，1965年初到了上海，与张春桥拍板成交。1964年5、6月间，毛泽东提出中央如果出修正主义、出赫鲁晓夫我们怎么办的问题，1965年9月他说得更肯定，认为中央很可能出修正主义，而且表示出对彭真、对北京市委的不满。江青知道毛泽东的意图，就抓住《海瑞罢官》不放。因为作者吴晗不仅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而且是北京市副市长。批判吴晗，可以借端滋事。

后来江青得意洋洋地说：“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林彪在党的“九大”报告中说得更明白：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这正符合毛泽东的意图。所以江青胆敢违反党纪组织撰写这篇文章，最后还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在《文汇报》上发表。

姚文元的文章既然是搞政治阴谋，而不是认真的文化学术问题的讨论，所以特别显得牵强附会，蛮不讲理，卑鄙阴险。

姚文元的文章共分4大部分：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一个假海瑞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

第一部分，姚文元武断地说《海瑞罢官》“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其实吴晗在《海瑞罢官》（历史剧）的前言中明明写着，这个戏，“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左派海瑞和以徐阶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但是他比较有远见，比较接近人民，他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主张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限制乡官的非法剥削，触犯了本阶级右派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封建社会里，个别有远见的官吏，为人民做了一些

好事，得到人民的称颂，这是事实。海瑞就是这一类“清官”的一个突出典型。如此而已。吴晗从未讲过也无意表现海瑞是“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海瑞是“农民利益的代表”。姚文元的批判完全是强加于人。

第二、第三部分，姚文元硬说海瑞退田是假的，平冤狱是假的，吴晗塑造了“一个假海瑞”，并且给吴晗扣上“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阶级调和论”等政治帽子。其实吴晗在剧中写的海瑞除霸、平冤狱、勒令乡官退田、修治吴淞江等，都是实有其事。虽然个别人物和情节作了艺术加工（有的虚构），但主要人物和基本事实都是有根有据的。姚文元却凭主观想象说除霸、平冤狱“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退田，也只能退给中小地主和富农，“根本不是退给农民”；修吴淞江一事，“也是值得怀疑的”。然后他发了一通议论，说什么“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吴晗“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后来，许多历史学家著文，引证确凿的明史，说明歪曲海瑞的，不是吴晗，而是姚文元。

第四部分，“《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姚文元更是捕风捉影，给《海瑞罢官》及其作者下政治结论。他写道：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

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如果人们不知道什么叫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栽赃陷害，那么姚文元的这一段文字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就是当年搞“大批判”时所惯用的所谓“联系实际”的“阶级斗争反映论”。这种伎俩把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硬拉扯在一起，制造出许多冤假错案。

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于1959年应友人之约动手创作，于1960年11月定稿，怎么会“影射”到1961年的现实呢？

吴晗于1959年写《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的故事》，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写400年前的海瑞，为了什么，吴晗在思想上是一清二楚的。他写海

瑞，是为了给海瑞以正确的历史评价，是表现海瑞敢讲真话，刚正不阿、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精神。他明确指出：“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我们今天要站在人民立场和工人阶级立场，要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百折不挠的斗争。可是姚文元却置别人的观点于不顾，别有用心地质问吴晗为什么写海瑞，是要人们“学习‘退田’吗？”“学习‘平冤狱’吗？”

《海瑞罢官》的主线是“除霸”，这个内容贯穿全剧始终，“退田”只是作为陪衬的。无论除霸和退田，都是写的历史^①，毫无影射现实的影子。可是姚文元一伙却抓住“退田”、“平冤狱”大作文章，并且把它们同1961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胡说吴晗要人们“学习‘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而且把田退给中小地主和富农，“学习‘平冤狱’”，为帝国主义和牛鬼蛇神“鸣冤”。姚文元一伙为了达到政治陷害的目的，牵强附会到了何等地步！

元史研究专家翁独健当时就愤慨地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退田同现实类比，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故意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

① 《明史·海瑞传》说，海瑞为了打击豪强，反对兼并，凡“贫民田入富室者，率夺还之。”所以退田，既退还给中小地主，也退还给农民。海瑞一次“巡历”松江，告状者达几万人。海瑞说他自己，“每放告日，状动三四千计，臣所准行二十分之一而已”。他不可能为所有告状者断案，但他多少为百姓办了一些好事。

反社会主义？”①

历史学家翦伯赞愤愤不平地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人。吴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凡事也有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②

翁独健、翦伯赞的直言指斥，代表了广大正直的知识分子对姚文元陷人于罪的卑劣行径的强烈不满。但是这两位著名学者却因此横遭迫害。

撒网“捕鱼”和攻击“要害”

彭真主持下的北京坚决抵制姚文元的文章，19天不予转载，后来迫于形势，《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才于1965年11月29日和30日先后予以全文转载。转载时两报都加了编者按语。《北京日报》的按语是彭真授意的，《人民日报》的按语是经过周恩来修改的。两报按语都强调了要根据“双百”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

江青、张春桥一伙不予理睬，他们按着既定的方针，把批判吴晗向“广度”“深度”发展。

①② 转引自高治：《震动全国的大冤案》，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他们设下“钓鱼”之计，使更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上钩。且看江青关于“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指示”：

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前一时期《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

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

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辟战场^①。江青把反对他们的人都“引”出来，当作敌人，围而歼之，其用心十分狠毒。

张春桥对文汇报社说：“要放手贯彻‘放’的方针，要让反面意见放一个够”。于是相继发表了马捷、蔡成和、芜人、林丙义、张家驹、羽白、郝晁衡等人批驳姚文元的文章，装出一副“百家争鸣”的样子。

1965年12月31日，张春桥亲自策划，由文汇报社出面召开上海史学界、文艺界座谈会，周予同、周谷城、蒋星煜、谭其骧、李俊民、李平心、束世徵、魏建猷、张家驹、陈向平、陈守实等教授、学者参加了座谈。会前声明，是内部谈话，听听大家意见，不算账。但会议结束时，却突然宣布要整理成文，公开发表，使得与会者目瞪口呆，才知道上了

^① 转引自《历史在这里沉思》第2册第10页。

当。张春桥看到座谈会记录很得意，说是“引蛇出洞”了。但还不够，他在1966年春节联欢上与与会的文化知识界人士说，“参加《海瑞罢官》的讨论要消除顾虑”，“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大家要敞开思想，敢于辩论”。“知识分子革命化途径之一，就是积极参加大辩论”^①。

张春桥一面进行诱骗，一面指令报社把“放”出来的各种观点排列归类，凡是不同意姚文元论点的都被列入“右派言论”，发言者和文章作者都被视为“右派”，成为“狠狠打击”的对象。

青年学生马捷，写了一篇题为《也谈〈海瑞罢官〉》，批驳姚文元，被逼承认自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成了“反动学生”，反复挨整。

西安市青年米曦亭写了一篇批判姚文元的文章寄给《文汇报》，为此在万人大会上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残酷摧残，致使双目失明。

中老年知识分子遭受的迫害更为惨烈。

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教授说，他“始终认为吴晗不是有意反党”，因此被张春桥骂为“老右派”，几次被揪到山东曲阜批斗，致使他全身瘫痪，卧床不起。

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培南说过一句“对海瑞也应一分为二”，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姚耐说过一句“姚文元就是爱打棍子，总不能一棍子把海瑞打死吧！”张春桥知道后，在一

^① 参见高治：《震动全国的大冤案》，1978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次会议上恶狠狠地说：“象李培南、姚耐这样的老共产党员，却在背后向党放冷枪，这笔账以后要算的”。从此，他们果然遭到残酷迫害。

华东师大历史系李平心教授对“清官”问题发表一些议论，和姚文元“唱反调”，惹怒了张春桥，由姚文元化名“劲松”、“伍丁”写了两篇文章，说李平心是“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诬陷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逼得他饮恨而死。他在去世前一个月，愤慨地说：“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要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①

全国不知有多少人落入了江青、张春桥一伙所设置的陷阱之中。

姚文元的文章得到《红旗》杂志编委关锋和戚本禹的支持。关锋读了姚文元的文章连声叫好，并且说，“要干起来，我们一定支持姚文元。”戚本禹表示，“若有人攻姚，我们就出来反驳。”关锋、戚本禹的态度得到江青、张春桥的赏识。两人专程去上海与张、姚直接磋商，返京后又向康生作了详细汇报。在康生的指导下，戚本禹写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载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红旗》第13期上），

^① 以上材料转引自高治，《震动全国的大冤案》，1979年12月29日《光明日报》。

不指名地批判了翦伯赞、吴晗的所谓“资产阶级历史观”。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和陈伯达等人谈话时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点了名，但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陈伯达很快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了关锋、戚本禹。戚本禹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在1966年4月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关锋、林杰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在1966年4月5日出版的《红旗》第5期上）。两篇文章都经康生审定，调子比姚文元的文章更高。戚本禹的文章说：“《海瑞罢官》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关、林的文章更加露骨：“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同志又‘破门而出’（挺身而出也）写《海瑞罢官》……实际上都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吴晗同志的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

吴晗在庐山会议前后写的作品，都被与彭德怀“罢官”一事硬联挂起来。《海瑞罢官》的主题从“退田”突变为“罢官”、“骂皇帝”，吴晗的问题，具有了“反党”的性质。

上海的张、姚和北京的关、戚，形成了南北夹攻吴晗之势。这样，为全力打击北京市委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不过这种攻击“要害”的批判，更显露出它的荒谬性。本来吴晗写海瑞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罢官”毫不相干。吴晗响应毛泽东号召写《海瑞骂皇帝》发表于1959年6月。9月写了论文《论海瑞》，正值庐山会议闭幕。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会议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吴晗和彭德怀既无工作关系，又无私人交往。由于知识分子的小心谨慎和对政治运动不可预测的恐惧心理，吴晗在《论海瑞》一文的末尾加上几段谴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话，以此把自己提倡海瑞精神同彭德怀问题划清界限。《海瑞罢官》写于庐山会议之后，它是被北京京剧团拉上马不得已而写的。剧本原名《海瑞》，剧本的结尾是海瑞处死恶霸徐瑛，徐阶昏倒在地，海瑞面对新任巡抚戴凤翔，高举大印，弃官离任。吴晗的好友、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读了这个稿本，认为剧本只写了海瑞的一件大事，并非写海瑞一生，剧名《海瑞》，不够贴切，鉴于剧本结尾，便大笔一挥，在封面上“海瑞”旁边添上了“罢官”两字。蔡希陶做梦也没有想到，“罢官”二字竟成了剧本的“要害”。海瑞不能同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相类比。吴晗也从未想到以海瑞影射彭德怀。硬把吴晗写《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在一起，完全是出于政治诬陷的需要。

历史剧《海瑞罢官》被打入“死囚牢”，作者吴晗惨遭

迫害，家破人亡。曾经在舞台上演过海瑞的，编过其他海瑞戏的，也被牵连，甚至株连家属。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主演的《海瑞上疏》的遭遇，就是一例。《海瑞上疏》是周信芳向国庆10周年的献礼节目，早在庐山会议之前，1959年8月就上演了，比吴晗的《海瑞罢官》早两年。它与1961年的所谓“包产到户”、“单干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可是，就因为这个戏的主角也是海瑞，海瑞当面严厉指责嘉靖皇帝的过失，也被江青、张春桥一伙视为“大毒草”，把它和《海瑞罢官》扯在一起，胡说什么一“骂”、一“罢”，相互配合，向党猖狂进攻。不仅姚文元在文章中指名道姓地攻击了《海瑞上疏》，而且还由他的同伙化名丁学雷、方泽生先后写了《〈海瑞上疏〉为谁效劳？》和《〈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两文，诬陷《海瑞上疏》“是一棵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把周信芳等几位同志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国著名的麒派京剧艺术创始人、共产党员周信芳从此长时间遭受批斗、监禁，最后被折磨致死。

“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炮制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找到国防部长林彪，谈“文艺革命”问题，江青要借部队名义开一个文艺座谈会。林彪欣然同意，第二天，就给军委总政治部作了如下指示：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①。

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4个人，召开了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看电影13次，看戏3次，看了21部影片。名为座谈，实为江青一言堂。会后搞了一个《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由江青和并未参加座谈会的陈伯达、张春桥加工、整理成文。3月19日，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同意，江青将《纪要》送给林彪。3月21日，林彪把《纪要》送给中央军委，并给军委常委写了一封信^②，全文如下：

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反复研究，又经过中央领导的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① 引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② 引自朱仲丽著：《女皇梦——江青外传》，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61—262页。

十六年来，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合乎部队中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使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此致敬礼！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不久，林彪以中央军委名义将《纪要》报送中共中央。4月10日，党中央批转了这个《纪要》。

所谓“部队文艺工作”、“部队文艺座谈会”都是假借名义。后来，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了事实真相。她说：

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

所以《纪要》主要不是谈什么部队文艺问题。它的矛头是对

着整个中国文化思想界的，是对着所谓“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借用部队名义，不过是借用部队的震慑威力。通过谈文艺的方式，经过中央军委来迫使党中央不得不接受，这正是毛泽东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而采用的“迂回战术”，并通过《纪要》“委婉曲折地指责中央”^①。

《纪要》说，建国后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这就是著名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纪要》说，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有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所以，“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

《纪要》说，“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

^① 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前言》，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①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

《纪要》说，对于外国的修正主义文艺，“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

《纪要》把所谓“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有代表性的论点”，概括为八种：“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即所谓“文艺黑八论”。

《纪要》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由此可见，《纪要》不仅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党领导的文艺事业，而且全盘否定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巨大成

① 《中国电影发展史》程季华主编，1963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共2卷，介绍自1896年至1949年中国电影发展情况。《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共3辑，1959年4月—1963年4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编辑委员会由田汉、欧阳予倩、夏衍、阳翰笙、阿英、张庚、李伯钊、陈白尘8人组成。本书所收文章反映我国早期戏剧运动、革命根据地话剧运动、抗日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根据地 and 国统区共产党领导的戏剧运动的情况。《京剧剧目初探》，陶君起编著，1933年3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本书收有1300多个传统京剧剧目和解放前、后新编剧目的剧情说明，对某些剧目的艺术特点、主要角色、表演上的不同流派作了简略说明。这三部分都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化史、文学史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书。

就，排斥了一切中外文学艺术遗产。30多年的中国新文艺是一条黑线，这就彻底践踏了“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荣传统，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对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斗争的指导作用。

这个《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的严重估计和他准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这次座谈会也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头子互相勾结的一步重骤。江青要利用人民军队的力量进行篡党夺权。林彪则要利用江青的特殊身分和权势。同时，他知道夺取政权要有“两杆子”。光有枪杆子还不行，还要有笔杆子。他需要与江青拉帮结伙的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的“笔杆子”为他制造舆论。《纪要》把林彪吹捧江青“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的话载入正式文件，江青有了资本，因此后来被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封为“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在《纪要》中也吹捧林彪，说他“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两个反革命集团头子互相利用，互相吹捧。

江青、张春桥还炮制了一个文件：《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说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提出要对文艺队伍实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党中央将此报告批转全国（196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66号）。后来，《纪要》首创的“黑线专政”论从文艺扩展到教育、出版、体育、卫生、公安等各条战线，说这

些战线都有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黑线，都要进行铲除黑线的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3月26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向党中央写了一个请示报告，建议撤销这个《纪要》。请示报告指出：

十几年来《纪要》的贯彻推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林彪、“四人帮”把《纪要》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专政，打击迫害革命同志的合法理论根据。他们任意把香花说成毒草，把艺术问题、思想问题说成政治问题，把人民内部矛盾说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任意点名宣判文艺作品为“大毒草”，任意诬蔑、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揪斗所谓“黑线人物”。上海座谈会以后，按照林彪、江青的指令在北京召开的全军创作工作会议上，仿照江青的办法，“看电影，找黑线”，对60多部影片加上了各式各样的罪名，受到打击迫害和株连的同志数以千计。会议期间，林彪还下令对所谓“攻击《纪要》”的同志进行“反击”，把一些对《纪要》提了意见，有过不满、怀疑，或在讨论时稍有微词的文艺工作者，扣上“反《纪要》”、“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对他们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66年4月10日，《纪要》作为中央文件批转之后，各军区、各部门以及许多地方单位，也召开过类似会议，贯彻《纪要》，错误地揪斗或批判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造成了大量的冤案、错案、假案。贯彻《纪

要》的结果，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完全没有了。文艺创作在思想上陷入了僵化和虚假的绝境，在艺术上日趋贫乏、单调和模式化，把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引进了一条死胡同，实际上取消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①。

“文革”启幕的紧锣密鼓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毒透了人们的思想。“中央文革五人小组”（成立于1964年，由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康生五人组成）于1966年2月3日召开会议，就批判吴晗的情况和继续开展学术批判问题进行了讨论，拟订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二月提纲》阐述了当前学术批判中的一些根本问题（学术批判的形势、任务、方针、队伍等），指出以批判《海瑞罢官》、“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等为内容的大辩论，是意识形态领域内两种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坚持“放”的方针，同时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在报刊上公开点名要“慎重”，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二月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151页。

提纲》试图对当时《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有所限制。

但是，这些原则规定恰恰不符合毛泽东的意图，因为江青一伙批判吴晗，根本不是进行学术讨论。

1966年3月19日，江青把经过毛泽东修改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送给林彪。3月1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3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说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4月初，北京市委传达了中央精神，要公开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和用“吴南星”^①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

4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林彪报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前线》杂志、《北京日报》的编者按。

4月18日，《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全面公布了《纪

^① 吴南星，即吴晗、马南邨（邓拓的笔名）、紫星（廖沫沙的笔名）三人的合名。

要》的基本观点和内容，号召批判“文艺黑线”。4月19日《人民日报》和第6期《红旗》转载了这篇社论。

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社论说：

当前在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大论战，绝不仅仅是几篇文章、几个剧本、几部电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学术之争，而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又长期的斗争。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5月8日，《解放军报》刊出江青的“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光明日报》刊出何明（即关锋）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这两篇文章都是批判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

高炬的文章说：“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现把持《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文章说，邓拓一伙，“对党和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他们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对我们伟大的党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竭力为罢了官的右倾

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我们一定要抓住它，识破它，戳穿它，剥掉它的画皮”；“不仅《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要铲除掉，《海瑞罢官》、《李慧娘》、《谢瑶环》，以及《长短录》中的毒草，等等，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一一铲除，毫不例外。”文章最后说：

我们要正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这篇文章以至高无上的口吻，宣判了邓拓、吴晗、廖沫沙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政治上的死刑。

何明的文章污蔑《前线》、《北京日报》搞“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是资产阶级的阵地”，“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5月8日这一天，《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同时刊登了林杰等人摘编并加了批判按语的资料性文章：《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隔了两天，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了姚文元的长达23000字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新华社当天转发，第二天全国报纸转载。这篇文章竭尽穿凿附会之能事，宣称：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与

《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进攻，为企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服务。

文章最后气势汹汹地宣告：

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

5月11日出版的《红旗》第7期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诬陷不实之词耸人听闻。这些文章交织成一片密集的火力网，集中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前线》杂志、《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实际上矛头对准中共北京市委。邓拓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是北京市委副书记，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姚文元一伙人说，吴晗是“急先锋”，廖沫沙是“执鞭”的“兄弟”，邓拓是真正的“主将”，“将上有帅”，帅是谁？不言而喻，是指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姚文元文章中说的，不管“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不管多么有名，多么

有地位”，这“有名”“有地位”的“什么人”是谁呢？不言而喻，是指彭真。

这些文章批判的对象都是新闻媒介和文艺作品——报纸、杂志、散文集，都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但是它们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它们是配合着党中央领导集体内部的斗争。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通过《五·一六通知》，撤销《二月提纲》；林彪发表了大谈“政变经”和“天才论”的“五·一八”讲话。

《五·一六通知》罗织十条罪状，逐条批驳《二月提纲》，提出一整套“左”的理论、方针、政策；要求各级党委夺取文化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通知》用强词夺理，以势压人的口吻说，多年来，一切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

《通知》号召：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

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五·一六通知》一笔抹杀了建国16年来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成就，进一步发挥了“黑线专政”论，即认为文化学术“五界”、“二个方面”，所有这些文化领域，各种文艺形式，无一例外地都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都是黑线统治，都是毒草丛生，坏人当道。要清洗“各界里”的领导人物，不能让他们“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首先是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因为其中有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人。同时，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以及所属各单位的领导，有反动思想的，统统都要揭露出来，清洗他们，彻底批判。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十分决绝地说，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并且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接着，6月2日至5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4篇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

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这些社论，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和林彪“五·一八”讲话的某些内容捅向全国。

在惊心动魄的紧锣密鼓声中，“文化大革命”的帷幕全面拉开。

结束语——泛论“大批判”

本书以上章节，从文艺、哲学、史学、经济学和教育工作等各个方面，大致上勾画了60年代前期政治大批判的概况。

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文化思想界错误的政治批判怎样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从这里，人们也可以明白，60年代中期发动的那场政治大动乱之所以名为“文化大革命”，就因为它是如此这般地从文化方面打开缺口的。

当年的“大批判”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成了历史陈迹。但是，“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记取。

说到总结历史教训，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以这场“大批判”作为导火线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方面造成的恶果。

对我国各族人民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同时，也是一场大规模地破坏文化、毁灭文化的空前浩劫。

“造反有理”、“‘破’字当头”的所谓“破四旧”，

凡是“古的”、“旧的”、“洋的”、“老的”，不问有无价值。一律打翻、砸烂。无数不可计价的珍贵文物、古迹、典籍、图书、文献、资料付之一炬，毁于一旦。

学校关门，学生停课，而后成千上万知识青年放下书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教师被批挨斗，然后到农场或“干校”劳动改造。科研机构被撤销，实验室贴上了封条，科研项目下马，科研人员停职或下放。

在“批判文艺黑八论”、“铲除文艺黑线”的大棒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和建国17年以来产生的各种优秀文艺作品，被摧残殆尽，文艺园地一片荒芜，只剩下八个“样板戏”。

知识分子被指责为“挖社会主义墙脚的精神贵族”，名列“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被斥为“臭老九”，斯文扫地。“知识越多越反动”，考试交白卷的成了荣耀一时的英雄人物。

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即对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采取强制的残酷无情的“武器的批判”。因此，对某种观点、某一作品、某个戏曲、某部影片，一旦被认为有问题，就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和这些作品的作者都当做阶级敌人、革命对象，对他们实行专政，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

据阳翰笙在1980年10月举行的第四次文代会所作的《中国文联会务工作报告》中所说的，文艺工作者遭受林彪、“四

人帮”的迫害和摧残是惊人的，特别是中外知名、久经考验的作家、艺术家，几乎通通被打成“黑帮”、“特务”、“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关进“大庙”或“牛棚”，轮番受到揪斗和“示众”，有些同志被无辜投入监狱。到1978年文联恢复活动时为止，文联224名全委，已故者76名，其中大多数是“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

又据谭宗极的《〈五·一六通知〉剖析》一文（见《十年后的评说》一书）中说，《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提出“彻底揭露和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学术权威”，这个口号的严重后果，不仅把从旧社会过来的一些知名的专家、作家、学者、教授打倒了，甚至我们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卓有成就的老同志，也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权威，不能幸免。文艺界人士大批被迫害，仅文化部直属单位受害的就有2600多人，著名的作家、艺术家老舍、赵树理、周信芳、盖叫天、潘天寿等90多人被整死；据17个省、市的不完全统计，教育界的干部、教师受害的达142000多人，致死的7682人；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第七机械工业部两个研究院和17个省市，共有53000多名科技人员遭迫害，一批著名的科学家被折磨致死，仅卫生部直属14所高等医药院校，共有教授、副教授674人，受害者556人，其中致死的36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为800多名科研人员和干部恢复名誉，1979年7月14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则消息。报道说，“文革”期间，康生、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

等人，先后插手干扰和破坏社科院，肆意对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党、政干部进行摧残和迫害。当时只有两千多人的学部，立案审查的达556人，加上在清查运动中受过审查的486人，两项合计约占总人数的50%，其中有的被迫害致死，还有44位同志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再一次遭到残酷迫害。

仅仅上面三个材料，便可见“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达到了何等骇人听闻的地步。

宪法、法律、党章成了一纸空文。各种必要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废弃。极度膨胀的派性斗争和无政府主义狂热，使整个国家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各种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乘机篡党夺权，为所欲为。

少年儿童失学，文盲大量增加，个人迷信猖獗，新中国提倡的并蔚然成风的敬老爱幼、尊师爱生、爱护公物、礼貌谦让，勤奋好学、助人为乐、互相帮助、互相信任、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等等精神文明和传统美德，逐渐被冷漠、猜疑、对立、粗鲁、野蛮、自私、谩骂、打、砸、抢，即所谓“斗、斗、斗”的斗争哲学所代替。

文明倒退，信仰危机，在这场浩劫中，中国人民心灵深处受到伤害的，不止一代人，而是两代人甚至三代人。

总之，这场破坏文化、毁灭文化的浩劫，没有任何成绩可言。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文化大革命”及其发生的原因，难道还不值得认真反思吗？

人们都还记得，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叫做“大批判开路”。60年代前期的“大批判”为“文革”这场大动乱鸣锣开道、扫清道路。“文革”的全过程，以“大批判”作为主要手段。“文革”之所以持续10年之久，使发动者欲罢不能，就因为林彪、“四人帮”用“大批判”不断地为它“开路”。今天，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那么，作为它的开路先锋和主要手段的“大批判”也应当彻底否定。

“大批判”和“批判”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它们的意义却全然不同。

“批判”是一种理论上的斗争，它的显著特点是说理，即用正确的道理，驳倒错误的道理，使真理战胜谬误，以理服人。尽管它是一种斗争，但并不包含粗暴的意思，如鲁迅所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就是批判的、革命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科学的批判精神。批判永远是需要的。我们要经常使用批判的武器，抨击谬论，张扬真理，揭露丑恶现象，清除思想污垢。

可是“大批判”则不同，它的特点是不讲理，以权压人，以势压人，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置人于死地。

“大批判”是“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它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左”倾错误长期孕育的结果。建国之初，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批判，就有过火斗争的表现，把思想认识问题、学术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甚至把被批判者一下子打成“反革命

集团”。这种作法都为后来的“大批判”准备了条件。至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年代的“两条道路大辩论”，在知识分子中“拔白旗”，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实际上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大批判”那种不讲道理的基本特点。“文化大革命”中的横扫一切的“大批判”，则是“左”倾过火斗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大批判”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的思想。“大批判”的发展过程，也是这个指导思想逐步发展的过程。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但是当时并不认为它有错误，反而把它当做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加以总结，而且根据这个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新的论断。

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刚刚过去，毛泽东就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总结反右派斗争的经验。他认为这场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①。1957年3月以前，毛泽东曾经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或者说，“已经基本上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1页。

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然而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他改变了自己原来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还要继续进行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与此相关的，毛泽东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这个概念。1958年11月21日，他在武昌会议上说，“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它吊着，不忙宣布为好。”他又说，“经济上消灭阶级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消灭阶级。”“作为政治上思想上的地主阶级跟资产阶级，这个东西还存在。”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换句话说，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划分阶级的标准，就是用“政治思想”来划分阶级。

毛泽东的这两个新的提法（观点、论断）正确不正确呢？

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政治战线上的革命，通常是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在我国，在三大改革基本完成以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要推翻哪个阶级呢？问题就出在这里。

那么，思想战线上有没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呢？这里首先牵涉到对“革命”这个概念的理解。“革命”这个概念有两种含义，它有本义和转义两种意思。它的本义就是政治革命，就是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它的转义、广义、引申义，例

如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思想革命、革命精神等，这些意义的革命，是改革、革新、改造、积极进取的意思，都不是指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这些意义上的革命无疑都是必要的。但是，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本来意义上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斗争。推翻什么阶级呢？他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这个概念。这就使“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有了前提。其实，“政治思想上的阶级”这个提法，从理论上说和从实践上看都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只能从经济地位上加以区别。列宁说，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一个人的阶级成分，指他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离开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离开经济地位，离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单从政治思想上划阶级，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因此，“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论断也就失去了前提。

“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观点是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的基础，也是60年代前期开展“大批判”的理论基础。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重新肯定“八大”以前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八大二次会议先后都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主要矛盾提法的改变，是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提法互相关联的。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主要表现在哪里呢？主要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而不是经济上、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这个关系全局的理论上的错误，不能不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

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我国存在两个劳动阶级和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八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报告解释说：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一个是工人阶级，这是我国人民中的最先进的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划入了剥削阶级，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政治思想，用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1957年，毛泽东根据世界观的表现，认为我国500万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占总数的80%—90%）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还要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谁呢？就是这“两个剥削阶级”，即右

派和其他反动派，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曾经计算过：“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他把知识分子和资本家加在一起，包括他们的家属，都属于剥削阶级。这就主观地制造了庞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人为地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无怪乎有人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失误是从错误对待知识分子开始的。

1959年庐山会议，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引向党内，就是把党内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这同“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观点有直接关系。拥护“三面红旗”，唱“左”倾高调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无产阶级；对“三面红旗”有意见，对公社化、“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提出批评的，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资产阶级。这么一划分，就把彭德怀等同志说成是“资产阶级民主派”。1962年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阶级斗争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和绝对化。十中全会后，在国际上继续反修批修，在国内开展“社教”（“四清”运动），毛泽东因此赞叹“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并且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60年代前期在文化思想领域开展的“大批判”，就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和这种阶级斗争氛围中开展起来的。

一位长期从事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同志，在总结胡风事件的历史教训时说：

对于思想领域中的认识分歧和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应当采取学术讨论、思想论争、批评与反批评的方式去解决，而不能采用群众批判的方式。解放以来，我党结合实际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是有成效的，但历次开展的群众性的思想批判运动结果都并不好，不仅没有真正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而且往往使学术性的问题上纲成为政治问题，以至产生了严重的恶果^①。

那么，为什么理论界和文艺界总是搞不清理论问题同政治问题（或文艺问题同政治问题，或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的关系，而“往往使学术性的问题上纲成为政治问题”呢？这个问题从“大批判”的指导思想里可以找到答案。

毛泽东提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他把思想战线同政治战线相提并论，把思想问题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认为资本主义复辟是从意识形态上开始的，所以思想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治问题，因此采取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用群众阶级斗争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党曾经多次提出如何正确对待思想理论论争的方针和意见。毛泽东总结了解放后历次思想批判运动的经验教训，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我国繁荣艺术和发展文化科学的方针。他在1957年又对这个方针作了精

^① 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辟的论述。他说：

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①。

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②

1962年1月，鉴于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不充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三不主义”，保证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同年，周恩来对文艺批评中的“五子登科”（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现象提出了批评。但是，在1978年以前的长时期内，这些正确方针和意见始终不能很好地得到贯彻。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同样可以从“大批判”的指导思想中找到答案。

“大批判”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所谓上层建筑，简单地说，就是政治和文化。“专政”，按照列宁的说法，它“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

①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8、388页。

专政是一种强制手段，它通常是指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在政治斗争中为解决敌我矛盾所采取的一种极端的政治措施。谁对谁实行专政，这只能是政治领域里的事。对于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只能用批判的武器，以理服人，而不能以权压人，以势压人。可是，认为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在文化思想领域实行专政，这就出现了不讲道理，以权压人、以势压人的“大批判”，许多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观点被当作错误加以批判，思想认识、学术观点的争论被说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学术问题完全等同于政治问题，学术观点被扣上政治罪名，许多坚持真理的忠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被戴上“修正主义”、“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三不主义”的保证统统作废，“五子登科”的现象变本加厉，“双百”方针也以不适用于敌我矛盾为借口而被取消。

《五·一六通知》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段话看起来很讲辩证法，但它实际上片面地强调了“破”，为“大批判”提供了理论根据。当时的“大批判”就是一味地“破”，根本不讲什么道理。“破”的形式之一，就是给许多文艺作品和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理论观点、学术观点，扣上种种政治罪名，什么“阶级调和论”、“资产阶级人性论”、“地主资产阶级历史观”、“资产阶级利润挂帅”、“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修正主义观点”、“同马列主义唱反调”、“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向地主资产阶级投降”、“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战线上的反映”等等，扣上了这一类政治大帽子，就封住了对方的嘴，甚至因此把对方打翻在地，剥夺了他们答辩、解释、反驳的权利。所谓“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就是说，破等于立，破就包含着立，破就是一切。这不仅为“大批判”者的蛮横无理辩解，而且使“造反有理”、“否定一切”的极左行为受到鼓励。

当时的“大批判”，普遍采取一种极不诚实的态度和极为恶劣的手法，即断章取义，穿凿附会，捕风捉影，捏造事实，信口雌黄，甚至罗织罪名，进行政治陷害。还有一种现象，中央报刊一点名，举国上下便闻风而动，口诛笔伐，谁的言词尖锐，谁的批判就越深刻；谁上纲越高，谁的路线觉悟就越高。这种作法不仅助长了恶劣的学风和文风，而且诱导或迫使不少人放弃原则，他们为了“紧跟革命路线”，表白自己同“错误观点”划清界限，摆脱某种株连，便随波逐流，违心地说假话。至于少数投机分子、阴谋分子更是有机可乘。他们丧失人格，出卖灵魂，却因此一鸣惊人，出人头地，大出风头。戚本禹、姚文元之流就是靠“大批判”起家，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

实事求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毛泽东教导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但是当年的“大批判”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败坏了党的优良作风。在“大批判”的声势下，一些人挥舞整人的大棒，

根本不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且只许诬陷者无中生有，不许被诬者有任何申辩的权利，因此制造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必须提倡和发扬实事求是精神，鼓励讲真话，讲实话，鄙弃阴谋陷害的卑劣伎俩，使心术不正之徒无所施其技，使造谣中伤者自食其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重新肯定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和人才受到尊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贯彻，不再在文化思想领域搞那种群众运动式的政治大批判，当年遭到错误批判的人物、作品和学术观点一一得到平反，被歪曲了的历史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社会主义文化科学事业正逐步地繁荣起来。

[General Information]

SS号=10176793